

期四第 卷三第

印度的悲劇

巴基斯坦建國一年

巴基斯坦·印度與美國

越南民族問題

巴基斯坦·V三柏里

本刊新德里特約記者

周熾夏

本刊越南特約記者

十六百年來中暹之舊誼

暹羅華僑人口的新估計

暹羅的現實與華僑

南暹羅的風雲

暹羅排華之回顧與前瞻

克刺地岬

讀橫田喜三郎的「天皇退位論」後

張羣訪日

日本臨時國會解散問題的關鍵

堪察加半島

鄭鶴聲

何啟拔

潘公昭

朱正明

朱作民

張禮千

趙南柔

本刊資料室

本刊東京特約記者

黃君曉

讀者·作者·編者

山鹿泰治先生來信

承惠亞洲世紀第三卷第一期，已收到。謝謝！所需「平民新聞」，今後當遵命。每期寄呈。能印名貴的及刊長期交換，真是覺得光榮！茲寄上「平民新聞」第八〇、八一、八二期及以上各期的世界語目次，請即查收！

鄙人曾於民國十七年担任上海江灣國立勞動大學世界語教師，是承該校聘請的。這事我認爲學生的榮譽。當時的許多同學，是否安泰，常常在紀念中。特別是在今次的貴刊上看到了菲律賓總督爲林氏兄弟書社以後，我想請求貴刊註譯社代爲調查一件事，如蒙附允，真是感激不盡。

我在此次大戰中，被日本軍閥所強制，派至菲律賓海軍服務，正在作一個印刷工人的時候，即因日本投降而遭遣返軍命令退職。當時以偶然的機會，被資國印刷業者黃光顯先生所救，在這位先生同情與援助下，好容易才逃脫了軍閥的爪牙，得以生還。以後我曾再三再四寫信給黃先生，表示謝意並報告脫險，可是都無一辦法投遞。而被退了回來。記得黃光顯先生當時的住所爲 No. 871 Cantara, Manila。他的家屬，有太太、小姐、和少爺明堂先生，明堂先生，明禮先生。關於黃先生的

經濟關係的方面，則有在他附近的義成紙廠 Philippine Red Co. Sales, T. O.。黃先生的橡皮印刷廠在馬尼刺郊外的 Grace Park (Anilab) 鞋廠對面的街口。

在棉的對面，也有其他中國人的印刷廠，所以雖然已忘記 Grace Park 的號數，我想還是可以馬上判明的。我雖向上面的三個地址都寄了信去，但都被退了回來。因此我對這個曾受其大恩的一家，格外懷念而日夜不能忘懷。能不能請貴社特別幫忙，特請林氏書社調查一下黃光顯先生的平安與否？雖然覺得十分冒昧，還是寄下了這信請求貴刊轉達，尚祈 鑒諒！

日本京都市左京區崎崎北御所町三六
山鹿泰治敬上

★余振常先生來信

逕啓者：素仰 貴刊爲研究亞洲事情之權威雜誌，易盼欽佩！鄙人茲有問題一則，擬懇 貴編輯先生費神一爲答覆，不勝感荷！問：鄙人渴望向日本國內郵購各種日文書籍，但因刻下我日兩國國交尚未恢復，郵購以匯兌不通，致無法函購，素仰 貴社精於日本事情，對於戰後日本名著，頗有透譯，故擬轉託 貴社向日本書店函購，未悉可能否？問：鄙人熟諳日文，此後仍擬從事透譯日文書籍，貴社能介紹或委託一些譯件否？報酬多寡不論。

以上兩點，務乞 貴社諸位先生不吝見告，真感激之至。 上海·余振常謹啓

★答余振常先生

振常先生：承詢兩項問題，茲解答如下：(一)直接訂購日本書籍，現在的困難很多。如能委託居留日本之友人代辦，最爲理想。不久本社將小額經售日本各項書刊，一俟專人送到即行公佈書刊名稱及價格，歡迎訂購。(二)本社需要透譯之件甚多，歡迎 先生協助。有暇，請于上午過來面洽爲盼。至稿費一項，本社自有一定標準，略表微忱，實未敢言酬也。

★方伯希先生來信

社長先生：啓者敝校僻處邊遠，訂閱書刊至感困難，茲閱報端 先生主辦亞洲世紀在滬發行，敝校擬訂閱充實圖書，敬乞賜搜最近期之樣本一份，以資參閱而便預訂。特此即頌 撰安！

四川屏山，方伯希啓

★答方伯希先生

伯希先生：來函拜悉，謹囑郵寄亞洲世紀近期樣本一冊，希 鑒收。本社歡迎邊遠之學校圖書館訂閱，概以八折優待，出版之書亦同。又本刊半年原價一元八角，全年原價三元六角，半年另加掛號郵費七分，全年另加掛號郵費一角四分。歡迎 貴校及同好直接向本社訂閱爲荷！

★侯慶祥先生來信

編者先生：頃接貴社來信，盡悉諸先生體念敝人恩高德重，尤敝人永存心勿忘也。敝人定閱 貴刊半年之數，均按期收到，所獲甚多。關於 貴社來信囑續定

，令敝人完全失去續讀之機會矣。因敝人在青充當上等傳令兵，每月薪給柒百四拾萬元，合金圓兩元多，如此微數，尙數何用？只好中斷，奈何奈何。敝人此次中斷不且自違諸先生之厚望，亦違天命也！每念及此，不禁淚下。謹修此書謝謝 諸位先生之好意！ 青島·侯慶祥九、二〇。

★答侯慶祥先生

慶祥先生：讀來書，感慨萬千。本社對 台端之求知與進取，深表敬佩！本社爲酬答諸讀者之求知，歡迎平價訂閱本刊；如半價實屬尙感吃力，希望 台端寄些郵票來，本社當斟酌情形，將參讀後的雜誌，用平郵寄上。如何盼覆！

★台北·陸雄鵬先生鑒

雄鵬先生：大作「日本天皇制存廢論」已刊本誌前期，稿費照寄台北台灣大學，原函退回多日，請即示明確之通信地址，以便補寄稿費！

編輯部啓

「亞洲世紀」二卷合訂本出版

本刊第二卷精裝合訂本業已出版，美觀大方，售價金圓券三圓，歡迎讀者直接向上海（五）深陽路一七七號本社訂購，存書無多，欲購從速！又本刊第一卷精裝本，已再版出售，售價金圓券三元三角，凡未購閱或需補購之讀者，均煩從速訂購爲荷。

業務部謹啓



亞洲世紀

第三卷第四期目錄

三十七年十月十日出版

★專論★

千六百年來中暹二國之舊誼

鄭鶴聲 (一)

暹羅華僑人口的新估計

何啓拔 (一一)

暹羅的現實與華僑

潘公昭 (一三)

印度的悲劇

巴基斯坦·A·三柏里 (一五)

★討論★

讀橫田喜三郎的「天皇退位論」後

趙南柔 (一七)

★譯文★

巴基斯坦·印度與美國

New Yorker 周熾夏譯 (二〇)

蘇聯的中東政策

Ladlas Farooq 彬之譯 (二一)

南暹羅的風雲

Bartha Whittington-Jones 正明譯 (二五)

漫畫之頁 (二幅)

(二七)

人物：真納——巴基斯坦的靈魂

蔡金聲 (二九)

地刺地岬

張禮千 (三〇)

誌堪察加半島

黃君曉 (三一)

亞洲 巴基斯坦建國一年 (新德里通訊)

(三四)

通訊 日本臨時國會解散問題的關鍵 (東京通訊)

(三五)

越南民族問題 (越南通訊)

(三六)

★資料★

張羣訪日

本刊資料室 (三七)

日本觀感

張羣 (四〇)

暹羅排華運動之回顧與前瞻

朱作民 (四四)

亞洲世紀月刊

出版者：亞東協業社
上海(5)漢陽路一七七號
電話：四二三八〇

主編人：方秋
發行所：上海(5)漢陽路一七七號

發行所：亞東協業社
上海(5)漢陽路一七七號

東京總經售：日本東京都三區區會地會
日本大阪府西區區會地會
日本大板市西區區會地會

大板總經售：中華日報社
Lun. Pros 238 Soter St.
Manila, Philippines.

菲律賓總經售：林氏兄弟書社
Manila, Philippines.

台灣總經售：亞東協業社
台北市廣州街二十五號

南京總經售：南京市中區中山路一七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南京分社

天津總經售：天津河北三經路吉德里八號
北方服務社

湘鄂總經售：衡陽清泰街二號
亞東協業社湘鄂專社

長沙總經售：長沙中國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三四弄四號

上海代銷處：中國圖書總經銷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三九弄一二號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定價			
郵費	郵費	郵費	郵費
每月一册	三角	六角	一元八角
半年六册	一元八角	三元六角	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册	三元六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零售	一分	七分	一角四分
平	免	一分	二分

◆本期售價美金圓三角◆
◆外售價美金一角二◆



專論



千六百年來中暹兩國之舊誼

鄭鶴聲

暹羅為亞洲南部惟一之獨立國家，其在魏晉，號曰扶南，隨唐之際，名為赤土，崇奉佛教。歷晉宋齊梁隋唐，屢通貢獻。後分為暹羅斛二國，暹土瘠不宜稼穡，羅斛地勢平衍，耕種多種，暹仰給之。元時暹羅強，併有暹地，遂稱暹羅斛國。明太祖洪武十年（西元一三三七），世子來朝，賜之敕印，文曰「暹羅國王之印」，自是其國運朝命，始稱暹羅。（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羅傳）實民國紀元前三百三十五年間事也。至其交通中國，則遠在三國孫吳之時，距今已千六百餘年矣。

中暹兩國之舊誼，為和平而有禮。英人奚爾恩 John I. Heeren 嘗論中暹間之關係云：「暹羅史中雖絕無受中國侵略略帝治之記載，然暹羅對於中國文化，則常存敬畏之心，屢遣使納貢，奉表稱臣，與半島中之他國正同。暹羅對於中國之所以常持恭服態度者，蓋服其受中國文化之恩潤，故與中國親善也。且有時暹羅王之得位不正者，則恒求中國詔印以正其名分，如索羅那烈，(Phra Narai) 敗緬甸人登王位時，即遣使至中國奉表請印，明廷予之（明穆宗隆慶間事），其一例也。暹羅不以與中國貢使往還為恥，中國亦不要求華人之居暹羅者應享何種特權，此可謂為兩國間和平而有禮儀之邦交」。（遠東史第十三章）可謂允當。中暹兩國之關係，無論在文化政治上，皆保持東亞固有睦鄰善國之態度，而鄰邦之禮統，在種族上則暹羅又不曾為中國之一支脈。至兩國舊誼之維繫，暹羅與其他朝貢國，皆以南洋產物貢獻中國，而中國則恒賜其王幣帛，以為還報。茲就「朝貢」與「敕封」兩項事蹟，略述如次：

甲 朝貢與內屬

(一) 孫吳時代 暹羅在扶南立國時代，即朝貢於中國。扶南之先，相

傳為女王，名葉柳，（南史作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時有外國人混填者，征服其地，納葉柳為妃，生七子，分王七邑。傳至混盤况，統一國內。盤况殂，子盤盤立，委任大將范曼以國事。盤盤殂，曼自立，勇健有權略，以兵威服屬旁國，自稱扶南大王，是為扶南有國號之始。曼之晚年，國內亂，大將范尋自立。吳遣中郎康乘等至其國。晉武帝泰始初（西元二六五），始遣使貢獻。太康中（西元二八〇至二八九），累遣使貢獻。（晉書卷九十五扶南傳）實民國紀元前一千六百三十二年至一千六百二十三年間事也。

(二) 東晉南朝時代 東晉穆帝升平元年（西元三五七），其王竺提摩奉表獻馴象。詔曰：此物勞費不少，朕令勿送。

東晉之季，有橋陳如者，以天然婆羅門王其國，輸入印度文化。橋陳如殂，後王持梨隨跋摩於朱文帝元嘉中（西元四二四至四五三）奉表獻方物。齊武帝永明中（西元四八三至四九三），其王闍邪跋摩遣使貢獻。梁武帝天監二年（西元五〇三），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曰：扶南王橋陳如闍邪跋摩介居海表，世慕南服，厥誠遠著，重譯貢琛，宜蒙酬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

天監十年（西元五一二），十三年（西元五一四）累遣使貢獻。其年跋摩死，庶子留隨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西元五一七），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西元五一九），復遣使送天然佛瑞像，婆羅樹葉，并獻大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西元五二〇），中大通二年（西元五三〇），大同元年（西元五三五），累遣使獻方物。五年（西元五三九），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南史作釋曇寶）隨使往迎之。（梁書卷五十四扶南傳）

(三) 隋唐時代 扶南在隋唐之際，又曰赤土，以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也。隋煬帝遣常駿等使赤土，其王遣世子那邪迦隨賈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饋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大業六年(西元六一〇)與曠謁帝於弘農，帝大悅，官賞各有差。(隋書卷八十二赤土傳) 唐初有扶南王姓古龍者，治特牧城，俄爲真臘所併，益南徙那那城。唐高祖武德(西元六一八至六二六)太宗貞觀(西元六二七至六四九)時再入朝。又獻白頭人二。白頭者，直扶南西人，皆素首，膚理如脂，居山穴，四面峭絕，人莫得至。(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扶南傳)

(四) 元代 隋唐而後，分爲暹羅解兩國，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西元一二八九)羅解遣使入貢。(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二暹羅傳) 元成宗元貞元年(西元一二九五)暹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賜來使紫金符佩之。其使急追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子兒舊相讎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暹人勿傷麻里子兒，以殘兩言。大德三年(西元一二九九)暹王上言其父在位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及金僕衣，乞循舊例以賜，帝以丞相，完澤答刺言，彼小國而賜以馬，恐其隣折都聲議議朝廷，仍賜金僕衣，不賜以馬。(元史卷二百十暹羅傳) 元英宗至治三年(西元一三二三)暹復入貢元惠宗至正(西元一三四一至一三六七)間，始降於羅解云。(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二暹羅傳)

(五) 明代 明太祖洪武三年(西元一三七〇)，命使臣呂宗俊等齎詔諭其國。四年(西元一三七二)，其王參烈昭毗牙遣使奉表，與宗俊等偕來，貢馴象、六足龜，及方物。詔賜其王錦綺，及使者幣帛有差。已復遣使賀明年正旦，詔賜大統曆及綵帛。五年(西元一三七二)貢黑熊白猿，及方物。明年復來貢，其王之姊參烈思南別遣使進金葉表，貢方物於中宮，却之。已而其姊復遣使來貢，帝仍却之，而實資其使。時其王懼而不武，國人推其伯父參烈實昆邪哩哩囉囉主國事，遣使來告，貢方物，實資如制。已而新王遣使來貢謝恩，其使者亦有獻，帝不納。已遣使賀明年正旦，貢方物，且獻本國地圖。(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羅傳)

七年(西元一三七四)三月癸巳，使臣沙里拔來朝，貢方物。自言去年八月舟次烏諸洋，遭風壞舟，飄至海南，賴本處官司救護，尚存軀餘免羅縶，降香，蘇木植物，進獻。廣東省臣以奏，帝怪其無表狀，詭言舟覆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必爲番商，命却之。諭中書及禮部臣曰：

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欲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誠、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淳泥、三佛齊、暹羅解、真臘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頻，煩勞太甚，朕不欲也。令遵古典而行，不必頻煩，其移文諸國知之。(明太祖實錄卷八十八)

然而來者不止。其世子蘇門那王昭祿亦遣使上箋於皇太子，貢方物，命引其使朝東宮，宴資遣之。八年(西元一三七五)再入貢。其舊明臺王世子昭祿亦遣使奉表朝貢，遣資如王使。十年(西元一三七七)昭祿奉其父命來朝。帝喜，命禮部員外郎王恒等齎詔及印賜之，文曰暹羅國王之印，并賜世子衣幣及道里費，自是其國遵朝命，始稱暹羅。比年一貢，或一年兩貢，至正統後，或數年一貢云。二十年(西元一三八七)貢胡椒一萬斤，蘇木一萬斤，帝遣官厚報之，(殊域周咨錄作貢胡椒萬斤，蘇木十萬斤)時溫州民有市其沉香諸物者，所司坐以通番，當棄市，帝曰：「溫州乃暹羅必經之地，因其往來而市之，非通番也。」乃獲宥。二十一年(西元一三八八)貢象三十，番奴六十。二十二年(西元一三八九)世子昭祿奉其父命遣使來貢。二十三年(西元一三九〇)貢蘇木胡椒降香十七萬斤。二十八年(西元一三九五)昭祿奉其父命遣使朝貢，且告父喪，命申官趙建等往祭，勅世子嗣王位，賜資有加。明成祖永樂元年(西元一四〇三)，賜其王昭祿奉其父命遣使朝貢，結之，乃暹羅與琉球通好者，所司藉其貨以開。帝曰：「二國修好，乃其美事，不幸遭風，正宜憐惜，豈可因以爲利。所司其治舟給粟，俟風便遣赴琉球。」是月，其王以帝降璽，書勞賜，遣使來謝貢方物，賜資有加。并賜列女傳百冊，使者請頒是術，爲風水式，從之。(殊域周咨錄列入永樂四年) 七年(西元一四〇九)使來祭仁孝皇后，命申官告之凡筵。(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羅傳) 八年(西元一四一〇)貢馬及方物，送中國流移人還，賜勅帶之。十年(西元一四一二)復貢。(殊域周咨錄卷八暹羅)

十四年(西元一四一六)五子三額波羅摩刺刺的額遣使告父之喪，命申官郭文往祭，隨遣使謝恩。十七年(西元一四一九)，命申官楊敏等護歸。(殊域周咨錄列入十八年)以暹羅使滿刺加，遣使資令輯睦。王復遣使謝罪。(殊域周咨錄，十九年，王遣宗懷等六十八人入貢，謝使滿刺加國之罪，賜

鈔幣有差) (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羅傳) 二十一年(西元一四二三) 又買, 賞賜使臣及通事雜管客人蕃伴衣服紵絲棉布靴履金銀紗縐物有差。詔定其例, 使臣人等進買物貨, 俱須抽分, 給與價銀, 給賞畢日, 許于會同館開市, 除書籍及玄黃紫皂大花西番蓮段并一應違禁之物, 不許收買, 其餘雜貨易二次。使臣歸來, 回至廣東, 本政司復案。明仁宗洪熙(西元一四二五) 宣宗宣德(西元一四二六至一四三五) 間, 至如常期, 賜王及妃各減永樂十五年之半。明英宗正統(西元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 代宗景泰(西元一四五〇至一四五六) 間, 買或不常, 賜復舊例。(殊域周咨錄卷八暹羅)

宣德八年(西元一四三三), 王悉里麻哈頓遣使朝貢。初其國陪臣泰三錫等買舟次占城新州港, 盡爲其國人所掠, 正統元年(西元一四三六) 泰三錫酒附小舟來京, 訴占城劫掠狀, 帝召占城使者與相質, 使者無以對, 乃赦占城王令盡還所掠人物。已占城移咨禮部, 言本國前歲遣使往須文達那, 亦爲暹羅賊人掠去, 必暹羅先還所掠, 本國不敢不還。三年(西元一四三八) 暹羅買使又至, 賜教曉以此意, 令亟還占城人物。十一年(西元一四四六) 王恩利波羅麻那惹智刺遣使入貢。明英宗天順元年(西元一四五七), 賜其買使銀花金帶。六年(西元一四六二), 王宇刺羅羅者直波智遣使朝貢。明憲宗成化九年(西元一四七三) 買使言天順元年所頒勘合, 爲蟲所蝕, 乞改給, 從之。十七年(西元一四八一), 買使還至中途, 竊買子女, 且多載私鹽, 命遣官戒諭諸番。先是汀州人謝文彬以販鹽下海, 竊入其國, 仕至坤岳, 猶中國學士也。後充使來朝, 貿易禁物, 事覺下吏。(殊域周咨錄) 成化十三年(西元一四七七) 主遣使葉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買方物, 美亞本福建汀州士人謝文彬也, 昔年因販鹽下海, 爲大風飄入暹羅, 遂仕其國, 官至岳坤。(當作坤岳) 岳坤, 猶華言學士之類, 至南京, 其從子瑣相遇, 識之, 爲織殊色花樣段疋貿易養貨, 事覺下吏, 始吐實焉。十八年(西元一四八二), 遣使朝貢, 且告父喪, 遣使冊封。明孝宗弘治十年(西元一四九七) 入貢, 時四夷館無暹羅譯字官, 閣臣徐溥等請移牒廣東訪取能通彼國言語文字者赴京備用, 從之。明武宗正德四年(西元一五〇九), 暹羅船有顯至廣東者, 市舶中官廉宣與守臣議稅其物供軍需, 事聞, 詔斥宣妄攬事柄, 撤還南京。十年(西元一五一五) 進金葉表朝貢, 館中無識其字者, 閣臣梁備等請選留其一二人入館肄習。(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羅傳) 其疏曰:

據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沈冬魁等呈, 該國回館教習主簿王祥等呈, 切照

本館專一譯寫回字, 凡遇海中諸國如占城暹羅等處進買來文, 亦附本館帶譯, 但各國言語土字, 與回回不同, 審譯之際, 全憑通事講說, 及至降勅回賜等項, 俱用回回字, 今又有暹羅國王差人來京進買金葉表文, 無人認識, 節次審譯不便。及查得近年八百大甸等處夷字失傳, 該內閣員題暫留差來頭目藍者歌在館教習, 成效合無比照, 藍者歌事例, 於暹羅國來夷人內選留一二名在館, 並選各館官下世業子弟數名送館, 令其教習, 待有成之日, 將本夷照例送回本土等因, 實爲便益。據此, 臣等看得習譯夷字, 以通朝貢, 係是重事。今暹羅夷字, 委的缺人教習, 相應處置, 令無著禮部行令大通事并主簿五祥等將本國差來通曉夷字人加審譯, 暫留一二名在館教習, 待教有成效, 奏請照例送回, 庶日後審譯不致差誤。

從之。明世宗嘉靖元年(西元一五二二), 暹羅及占城等海船番貨至廣東, 未行報稅, 市舶司太監牛榮與家人蔣義山黃麟等私收蘇木胡椒并乳香白臘等貨裝至南京, 又匿稅盤出送官, 南京刑部尚書趙鑑等擬問蔣義山等違禁私販番貨, 例該入官, 蘇木共三十九萬九千五百八十九斤, 胡椒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五斤, 可值銀三萬餘兩, 解內府收貯公用。牛榮實緣內儲, 得旨, 這販賣商貨給主。刑部尚書林俊復疏謂:

查得見行條例, 通番下海買賣劫掠, 有正犯處死, 全家邊衛充軍之條, 買蘇木胡椒千斤以上, 有邊衛充軍貨物入官之條, 所以嚴華夷之辯, 謹職亂之萌。今蔣義山等倚恃威權, 多買番貨, 天幸匿稅事發, 將牛榮等參奏。陛下方俞正法之請, 驟啓用侍之門, 忽又有旨給主, 明主愛一顧一笑, 故特以待有功者, 今三萬餘兩之物, 果一敵特比, 給還罪人, 果賜有功比, 皆臣等所未喻也。伏望大奮乾剛, 立斷是獄, 將代爲營救, 并請討之人, 下之法司, 明正其罪。

乃詔贖物照舊入官。三十二年(西元一五五三) 其王遣使坤離等貢白象及方物, 白象已斃, 遺象牙一枝, 長八尺, 牙首鑲金石榴子十顆, 中鑲珍珠十顆, 寶石四顆, 尾置金剛錘二根, 又金盒內貯白象尾爲證。帝嘉其意, 厚遺之。(殊域周咨錄卷八暹羅) 三十七年(西元一五五七), 其王勃略坤息利尤池牙遣使黃金葉表來朝。明年, 從使使請, 特還抽稅佐修船費。(皇明集) 青錄四暹羅) 明穆宗隆慶初(西元一五六七), 其隣國緬甸(明史作東蠻) 求婚不得慚怒, 大發兵攻破其國王自經, 據其世子及明廷所賜印以歸。次

子(即李羅那烈)嗣位，奉表請印予之。(東西洋考：隆慶初年，東蠻牛求婚暹羅，暹羅拒之峻，東蠻牛甚甚，統沙外兵圍暹羅破之，王自經死，虜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奉表請印曰：「暹羅部領數十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上命給予。時鄭汝璧為禮部郎，白內閣，不知印文云何，閣臣曰：「第鑄暹羅國王印予之可耳」，鄭曰：「國初受封，未必即稱王，且篆文尺寸，或有未合，於彼不便。彼所存，公移舊印文圖在也，宜據粵東撫臣往取。循以給之。」內閣曰「然」，嗣取印文至，則都總使印也。備考諸書，國王印是永樂所賜，而耳目刺謬若此，豈先朝伴為駕馭之術耶？抑邇來在事者因更給而故殺其權耶？存之以俟知者。自是為緬甸所制，嗣王勵志復仇，明神宗萬曆初(西元一五七三)，敵兵復至，王暨兵奮擊，大破之，殺其子，餘衆宵遁，暹羅由是雄海上。移兵攻破真臘，降其王，從此歲歲用兵，遂霸諸國。六年(西元一五七八)遣使入貢。(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羅傳)七年(西元一五七九)，復遣使具金葉表文來貢。(皇明象胥錄四暹羅)二十年(西元一五九二)日本破朝鮮，暹羅請潛師直搗日本牽其後，中樞石星議從之，兩廣督臣蕭彥持不可乃已。(東西洋考：比倭寇朝鮮，部議遣材官諭諸屬國，率夷兵攻倭，暹羅願領所部前驅，自効，經略都御史宋應昌以聞，會倭酋死，遂去，不果行焉)。其後率貢不替。明思宗崇禎十六年(西元一六四三)猶入貢。(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羅傳)

(六)清代 清世祖順治九年(西元一六五二)十二月，暹羅遣使請貢，并換給印勅勘合，從之。自是朝貢不絕。(皇清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七暹羅)清聖祖康熙二年(西元一六六三)暹羅正貢船行至七洲海面，遇風飄失獲買船一，至虎門，仍令駛回。三年(西元一六六四)七月，平南王尚可喜奏暹羅來餽禮物，却不受。其年議准在暹羅進貢正貢船二艘，買役二十名，補買船一艘，員役六名，來京，並允貿易一次。(清史稿屬國傳三暹羅)四年(西元一六六五)二月，壬寅國王森列柏臘照古龍拍臘馬噶坤司由提呀菩埃遣陪巨攝坤司咨喇耶邁低禮等齎金葉表文，航海入貢。其文曰：

暹羅國王臣森列柏臘照古龍拍臘馬噶坤司由提呀菩埃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奏大清皇帝陛下：伏以新君御世，普照中天，四海沾祈憐之德，萬方被教化之恩，卑國久荷天朝恩澤，未傾葵藿之心，今特躬誠照例朝貢，敢效輸款，敬差正貢使攝坤司咨喇耶邁低禮，副貢使攝坤司勿香瓦替，三貢使攝坤司啟博瓦納，大通事攝坤司典辦事等臣，梯航渡海，齎

捧金葉表文，方物，譯書一道，前至廣省，差官伴送京師進獻，用伸拜舞之誠，恪盡遠臣之職。恭祝皇圖鞏固，帝壽遐昌，伏冀俯垂寬宥不恭，微臣瞻天仰聖，曷勝屏營之至，謹具表稱奏以聞。

上嘉之，命從優賞賚。(清聖祖實錄卷十四)七年(西元一六六八)十一月，遣陪巨攝坤司咨喇耶邁低禮等來貢，時部議以所貢物與會典不符，應令後次補貢，得旨：「暹羅小國，貢物有產自他國者，與會典難以相符。所少貢物，免其補進，以後俱以伊國所有者進貢」。十一年(西元一六七四)三月，復遣使來貢，得旨：「貢使所攜貨物，願至京師貿易，則聽其自運，或願在廣東貿易，督撫委官監視」。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五)二月貢使攝坤司咨喇耶邁低禮等至，具表請封，四月，封森列柏臘照古龍拍臘馬噶坤司由提呀菩埃為暹羅國王。(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七暹羅)二十三年(西元一六八四)六月，王遣正貢使坤宇述列瓦提等齎金葉表文入貢。其表曰：

啓奏大清國皇帝陛下：伏以聖明垂統，禮天立極，無為而治，德教孚施萬國，不動而化，風雅澤及諸彝，巍巍莫則，瀟瀟難名。卑國世荷皇恩，久沾德化，微臣繼襲踐祚，身屬遐方：莫能印瞻天顏，幸遇貢期，敢效輸款，願遣正貢使坤宇述列瓦提，二貢使臣坤巴實提瓦打，三貢使臣坤司咨塔瓦查，正通事坤恩咨塔披彩，辦事文披述塔新禮噶等梯航渡海，齎捧金葉表文，方物譯書，前至廣省，差官伴送京師，朝貢進獻，代伸拜舞之誠，恪盡臣子之職。恭祝皇圖鞏固，帝壽遐昌。伏冀俯垂寬宥，庶存懷遠之義。微臣瞻天仰望，不勝屏營之至。(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四暹羅表)

父疏言：「貢船到虎跳門，地方官阻滯日久，迫進至河下，又將貨物入店封鎖，候部文到時，方准貿易，每至毀壞，乞敕諭廣省地方官，嗣後貢船到虎跳門，具報之後，即放入河下，俾貨物早得登岸貿易。又本國採辦器用，乞諭地方官給照置辦，勿致攔阻。又貢使進貢先遣買船回國，次年再差船來廣省迎接聖敕歸國」。得旨：「覽王奏，航海遠來進貢方物，具見悃誠可嘉，餘著議奏。」尋部議，應如該國王所請，從之。(清聖祖實錄卷一百十五)二十四年(西元一六八五)議定暹羅國王厚賞銀三十四，今加十六，共表裏五十。(清史稿屬國傳三暹羅)四十七年(西元一七〇八)六月，遣使入貢，得旨：「貢使所帶貨物聽隨便貿易，免其徵稅」。六十一年(西元一七二二)四月，遣使來貢，賜其國王及王妃紗段，諭令運米二十萬石，於順建廣

東寧波等處糧價，並諭大學士等曰：

暹羅國人嘗其地米甚饒裕，銀二三錢，可買稻米一石，朕諭令分運米石至福建等處，於地方甚有裨益。此三十萬石係官運，不必收稅。

清世宗雍正二年(西元一七二四)十月，買稻種果樹。賜國王鑲綴玉磁等器。其船楫目九十六人，本係漢人，求免回籍。得旨：「暹羅不憚險遠進獻稻種果樹，恭順可嘉，其通來米石，令地方官以時宜售賣，毋許行戶低昂。隨帶貨物，概免征稅。楫目九十六人，居住該國，歷經數代實難勒令歸還，應免回籍，以示寬大之典。」(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七暹羅)六年(西元一七二八)帝諭暹羅商船運來米穀永遠免稅。七年(西元一七二九)賞買內有速香安息香架絨布疋等，帝以無必須之物，免其入貢，著為例。時貢使呈稱京師為萬國景仰，國王欲令觀光上國，遍覽名勝，歸國陳述，以廣見聞。帝命賢能司員帶領遊覽，並賞銀一千兩，遇所喜物購買。使臣復稱本國產馬甚小，國王命購駿匹帶歸，允之。命馬價向內庫支給。復賜國王御書「天南樂園」扁額，綬二十五，玉羅八，琉璃器一，松花石硯二，玻璃器二，瓷器十四，賞使赴廣採買京弓銅鏡等物，復詔賞給。(清史稿暹羅傳三暹羅)清高宗乾隆元年(西元一七三六)六月，國王森列拍照廣拍馬噶陸坤司內提雅普埃以嗣立故，遣陪臣朗三立哇提等齎香燭及方物例貢象一隻，因航海故增一以備。並咨禮部言：「往時領賜蟒龍大袍，藏承恩亭上，歷世久遠，難保無虞，懇再恩賜一二。每年造福送寺，需用銅斤求暫開禁例，赴粵採買」。部議不可。得旨：「暹羅遠處海洋，抒誠納貢，除照定例賞給外，可特賞蟒假四尺，至採買銅斤一節，國王稱係造福送寺之用，加恩賞給八百兩，後不為例」。八年(西元一七四三)九月奉旨：「暹羅國商人運米至閩，源源而來，其加恩之處，自當著為常例，嗣後外洋貨船帶來米萬石以上者，免船貨稅銀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稅十之三」。十一年(西元一七四六)九月，暹羅商載米進泊閩海，或四千三百石，或祇三千八百有零，餘皆蘇木鉛錫等貨。福建將軍新柱奏：「番船載米，不足五千之數，所有船貨額征米便援例寬免」。帝以該國航海遠來，仍加恩免其船貨稅銀十分之二。次年閩撫陳大受奏言：「閩商前赴暹羅販米，其國木料甚賤，應聽造船運回，給照查驗」。報可。自是其地商船益便往來。十四年(西元一七四九)七月，遣陪臣朗阿派提等入貢，御書「炎服屏藩」扁額賜之。十八年(西元一七五三)二月，遣使入貢，并懇賜人舊纓牛良馬象牙并通微規儀內監，部議不可。

并飭使臣於歸國後曉諭國王，恪守規制，益勵敬恭。得旨：「方物照例收受，其雜費賞資，著加恩，照上次例行，並加賜人舊」。二十二年(西元一七五七)二十七年(西元一七六二)三十年(西元一七六五)三十一年(西元一七六六)並遣使入貢，仍照例加賞。先是乾隆元年(西元一七三六)暹羅貢使呈請國王乞賜蟒龍大袍一二襲，奉旨特賜蟒緞四端。十四年(西元一七四九)入貢，特加賜蟒緞片金粧緞閃緞各一疋，錦四疋，緞八疋，玉器六件，琉璃器二件，琉璃器四件，松花石硯二方，玻璃器十件，磁器一百四十六件。又因續進黑熊白猿等物，加賞國王庫緞二十疋。十八年特賜人舊四船，緞錦共二十疋，玉器四件，琉璃器二件，磁器六件，銅燧硯二方，玻璃器十件，磁器一百四十件。二十二年入貢，特賜國王鑲綴錦緞各二疋，閃緞片金各一疋，八絲緞四疋，玉器琉璃器各一件，松花石硯二方，琉璃器十三件，磁器一百四十件。二十七年三十一一年特賜物件俱與二十二年同。(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七暹羅)四十年(西元一七七五)九月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等奏，船商陳萬勝帶投暹羅國鄭昭文稟一件，稱平定打馬部落，人象投歸，內有滇省兵丁趙成章等十九名，附商船運回，並情願合擊緝匪，乞賞給破破位等因一摺。該督等以訊據各兵，係上年八月緝匪攻破打馬，隨同奔至暹羅等語，與鄭昭來文云因青緝為其所平，打馬部落，奉乘來降之語，其情詞不無粉飾，但現將內地兵丁，搭船送回，尚屬小心恭順，其所請破破位等項。李侍堯以破位不便准給，其疏破破位等物，查照上年請買數目，准行之處，所奏甚是。自應如此辦理。至所云緝匪於鄰國諸國，多遭殘害，自必志切同仇，果能糾約合舉，直抵阿瓦，擒其渠魁，上為天朝立功，下為兩主雪恥，大皇帝鑒爾忠貞，必是非常勳典等語，立賞殊不得體。中國當此全盛之時，如果欲征勦緬甸，何必借助於海外小邦，况撫順外夷，亦自有道，若藉其力驅滅叛蠻，彼必恃功而驕，久且效尤滋甚，更難駕馭，此乃一定之理。李侍堯等蓋未見及此也。現令軍機大臣代擬稿稿發去。再閱奏摺內稱請賞破破位，並稱破破位礙難准行之語。及閱鈔錄鄭昭原稟，係乞破破位，所云破破位，似即內地之破破子，而非破破位，是否鈔稟舛誤，抑係敘摺偶誤，並著查明具奏。現在所擬稿稿，即照破破位立旨，並著李侍堯查對原文，再行繕寫發給。(清高宗實錄卷九百九十九)粵督李侍堯接奉諭旨後，即照軍機大臣所擬原稿繕發。其擬稿云：

本閣部堂接閱來稟，並開列名單，送回滇省兵丁十九名，具見小心恭順

，所請鐵錢仔，前經駁飭，今除錢仔一項，關係軍器，定例不准出洋，未便給發外，其需用硫磺鐵錫，准照上年請買之數，聽爾買回，以示獎勵。至所稱若以緬匪兇頑，罪在不赦，欲加天討，昭顯率兵合擊，但昭統播初安，軍需缺乏，冒乞恩賜鐵錢仔，並懇據情呈奏等語，所言已悉，但天朝統馭寰宇，中外一家，國富兵強，勢當全盛，前此平定準噶爾回部，西北拓地二萬餘里，今因兩金川狼狽為奸，負恩抗拒，官兵征勦，現已肅其巢穴，大功指日告成，懣俘行賞，甘棄生成之外，慶安全，德威所布，遐邇莫不震懾。至緬匪頑蠢負隅，甘棄生成之外，實為覆轍所不容，亦屬負盈所自取。邇年因申討金川，遂將滇兵暫撤，今策動在邇，或閱一二年，稍息士卒之力，再行厚集兵力，將緬匪一舉蕩平，此時自難豫定。若果欲掃除緬匪，則以百戰百勝之王師，奮勇直前，所向無敵，視攻搆阿瓦，不啻摧枯拉朽，何藉爾海外彈丸。乘衆合擊或爾欲報故主以仇，糾約青羅紅沙諸鄰境，悉力陳兵，盡除花肚，亦聽爾自為之。設或爾志得伸，據實稟報，本閣部堂覆覈無異，自當代為奏聞，大皇帝為天下共主，亦必鑒爾忠誠，予之嘉獎。至於中國之欲平緬匪與否，聖主自有權衡，因非我守土之臣所敢料，亦非爾之所當請問也。(同上)

四十六年(西元一七八一)鄭昭遣使期不彩悉呢霞握撫突等入貢，奏稱暹羅自遭緬亂，復主報仇，國人以昭裔無人，推昭為長，遵例貢獻。帝嘉之，實使臣於山高水長。所貢方物，收象一頭，犀角一石，餘物准在廣東出售，與他貨皆免稅，特賜國王綉緞珍物如舊制。四十七年(西元一七八二)昭卒，子鄭華嗣立，五十一年(西元一七八六)，華遣使入貢，御前方物龍涎香、金鋼鑽、沉香、冰片、犀角、孔雀尾、翠羽、西洋氈、西洋紅布、象牙、樟腦、降真香、白膠香、大楓子、烏木、白豆蔻、薯蓣、檀香、甘密皮、桂皮、藤黃、蘇木、馴象二，中官前不買象，餘減半。並具表請封。乃封鄭華為暹羅國王。是年粵督穆爾察定暹羅正副貢船各一，免稅，餘船按貨征確，以杜奸商取巧。五十四年(西元一七八九)入貢，因慶祝萬壽，加進壽燭、沉香、紫膠、香冰片、燕窩、犀角、象牙、通大海、哆囉呢九種，帝亦加賜國王御筆匾字。六十年(西元一七九五)暹羅破東南寨，取阿可耳及破丁蓬二地。(著史稿屬國三暹羅)

物，正月，命使臣與寧壽宮千叟宴，賜正使聖制千叟宴詩一章。二年(西元一七九七)遣使賀歸政及登極，貢龍涎香冰片等二十四種。帝奉太上皇帝命賜鄭華勅。三年(西元一七九八)召暹羅使臣宴重華宮。五年(西元一八〇〇)國王遣使齎祭文儀物詣高宗純皇帝前進香，並獻方物，廣東巡撫導旨令使臣毋庸來京，悉將方物贖回。六年(西元一八〇一)副貢使怕窩們孫呼哆呵叭病歿廣東，諭地方官妥為照料，賞銀三百兩，先行回國。十年(西元一八〇五)暹羅貢表，言與緬甸戰獲捷，有詔和解之。十二年(西元一八〇七)九月，帝諭鄭華不許違例用中國人駕船代運貨物往來，以免奸商隱匿，致啓訟端，倘有違背，奸商治罪，國王亦難辭其咎，特申禁令，以嚴險越之防。爾國王其速遵毋忽。十四年(西元一八〇九)遣使祝嘏，加賞正副使錢重華宮。秋鄭華卒，世子鄭佛繼立，遣使入貢，請封。暹風沉失貢物九種。帝諭不必補進。十五年(西元一八一〇)封鄭佛為暹羅王，給誥命詔紐鍍金銀印，交使贖回。十八年(西元一八一三)冬粵督蔣汝鏡奏暹羅正貢船在洋焚毀，僅副貢船抵粵，副使仰按察哪丕汝知突有疾，聞正貢船遭焚驚懼益劇不能即赴都，帝命副使留粵調治，所存貢物十種，派員送京，失物毋庸補備。且諭曰：「暹羅國王抒誠納貢，沿海申虔即與到京實呈無異。例貢物件及敕書交兵部，發交兩廣總督領給」。明年(西元一八一三)暹羅王聞貢船焚毀，補備方物入貢，遇颶風船漂散。二十年(西元一八一四)秋，正副貢船先後抵粵，蔣汝鏡以聞，仁宗嘉其恭順。諭曰：「暹羅向係三年一貢，明年又屆入貢之期，此須方物，可作二十一年例貢」。暹羅王復表請准用內地水手駕駛，部議駁之。(同上)

清宣宗道光三年(西元一八二三)遣使入貢，賀萬壽。四年(西元一八三四)鄭佛在位十五年，傳位其子，鄭福，明年遣使入貢，請封，舟毀，貢物沉沒，命免補進，仍封鄭福為暹羅王，朝貢益謹。十九年(西元一八三九)三月，宣宗以暹羅服事之勤，諭：暹羅三年一貢，改為四年。(同上)

清文宗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鄭福華，弟蒙格克托繼立，中國稱曰鄭明者是也。明奉孝和皇后宣宗皇帝遺詔，遣使進香，並齎暹表文方物，慶賀登極。又因例貢屆期，請將貢物一併呈進，帝命兩廣總督徐廣楨傳知使臣，毋庸來京，儀物方物，悉令贖回，至應進例貢，現當國制二十七日之內，不受朝賀，並停止進宴，俟嗣王請封時，再行呈遞。二年(西元一八五二)徐廣楨暹羅國王遣使補進例貢，並請敕封，現已行抵粵東，帝命於封印前伴送

廣仁宗嘉慶元年(西元一七九六)暹羅遣使進太上皇帝漢番字金葉表文並方

來京，應給國王壽命，俟使抵都，發給書回。適太平軍興，買使竟不能至。暹羅入貢中國，亦於此止。鄭明通佛學，善英語，用歐人改制度，行新政，國治日隆，復與英法諸國訂約通使，分駐各國，於是暹羅遂為自主之國矣。(清史稿暹羅三暹羅)

乙 勅封與遣使

(一) 孫吳時代 自漢武帝元鼎中(西元前一六至一一)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海南諸國，相率朝貢。後漢桓帝時(西元一四七至一六七)大秦天竺，皆由交州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西元二二二至二五二)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廉奉使於扶南，時大將范尋當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之曰：「國中實佳，但人囊囊可怪耳！」尋始全國內男子著橫幅，大家裁錦為之，貧者乃用布。(梁書卷五十四扶南傳)是為中國遣使暹羅之始。其出使紀錄，朱應有扶南異物志一卷(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史部)應泰則有吳時外國傳(太平御覽卷三五九卷七六九卷七七二)等書。

(二) 隋唐時代 隋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西元六〇七)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賻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史稱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至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十艘來迎，吹簫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鑲以觀駿船。月餘至其都，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鑪，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樂，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上閣，王以下皆坐。宜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疎薄，願為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騎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蓆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蟹猪鴨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鐘置酒，女樂迭奏，禮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賈方物，令婆羅門以香花奏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手上。浮海

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趾。駿以六年(西元六一〇)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乘義尉。(隋書卷八十二赤土傳)

(三) 明代 明初，名暹羅解國，太祖洪武初(西元一三六八)遣大理少卿聞良翰往諭之。(殊域周咨錄卷八暹羅)三年(西元一三七〇)又命使臣呂宗俊等賈詔諭其國。其王參烈昭毗牙遂遣使入貢。(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羅傳)十年(西元一三七七)九月，其王遣其世子昭祿率金葉表文貢象及胡椒蘇木之屬，帝命禮部員外郎王恒，中書省宜使蔡時敏往賜之印。詔曰：

君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居士之鴻恩，曷能若是，華夷雜處，樂天之樂，率土皆然，若為人上能體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神，則祿及子孫，世世無間矣。爾參烈昭毗牙哩哩自嗣王位以來，內修齊家之道，外造睦鄰之方，况數遣使稱臣入貢，以方今蒼生之望，可謂賢德矣。豈不名播諸蕃哉！今年秋貢象入朝，朕遣使往諭，特賜暹羅國王之印及表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

恒等與昭祿率賈陸辭。賜文綺衣服並道里費。(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十五)十六年(西元一三八三)賜勸合文冊及文綺磁器與真臘等。(明史卷二百二十四暹羅傳)二十八年(西元一三九五)十二月戊午詔遣中使趙達朱福等祭其故王參烈昭毗牙哩哩，賜賜王昭祿率賈文綺四疋，羅四疋，縐絲布四疋，王妃文綺四疋，羅四疋，縐絲布十二疋，勸諭之曰：

朕自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維諸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屢聞于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較之於今，暹羅為最近。暹者使至，知爾先王已逝，王詔先王之緒，有違于邦家，臣民歡憐。茲特遣人祭已故者，慶王詔位有道，勸至，王其罔失法度，罔淫于樂，以光前烈，其敬之哉。(明太祖實錄二百四十三)

三十年(西元一三九七)禮官以諸蕃久缺貢奏聞，帝曰：「洪武初，諸蕃貢使不絕，暹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浣泥、彭亨、百花、蘇門答刺、西洋等三十國，以胡惟庸作亂，三佛齊乃生間諜，治我使臣百餘，爪哇王聞知，遣人戒飭，禮送還朝，由是商旅阻遏，諸國之意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朝貢如故，大琉球且遣子弟入學，凡諸番國，使臣來者，皆以禮待之，我視諸國不薄，未知諸國心若何？」

今欲遣使爪哇，恐三佛齊中途阻之。聞三佛齊本爪哇屬國，可達朕意，移咨暹羅，俾轉達爪哇。於是部臣移膝曰：

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中國四書之防，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蕃，莫不來享，豈惟胡惟庸謀亂，三佛齊遂生異心，相我僭使，肆行巧詐，我聖天子一以仁義待諸蕃，何諸蕃敢背大恩，失君臣之禮。倘天子震怒，遣一偏將，將十萬之師，恭行天罰，易如覆手，爾諸蕃何不思之甚？我聖天子嘗曰：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皆修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聖教，彼以蕞爾之國，敢偏強不服，自取滅亡，爾暹羅恪守臣節，天朝眷禮有加，可轉達爪哇，今以大義告諭三佛齊，誠能省愆從善，則禮待如初。（明史卷三百二十四三佛齊傳）

成祖即位，詔諭其國，永樂元年（西元一四〇三）六月，以上高皇帝尊號，遣官頒詔有賜。八月，復命給事中王哲，行人成務賜其王錦綺。九月，命官李興等勸勞賜其王，其文武諸臣並有賜。先是占城貢使返風，顯其舟至彭亨，暹羅索取其使，羈留不遣，蘇門答刺及滿刺加又訴暹羅恃強發兵奪天朝所賜印詔，（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羅傳）五年（西元一四〇七）帝降勅責之曰：

占城、蘇門答刺、滿刺加與爾俱受朝命，比肩而立，爾安得恃強，拘其朝使，奪其印！天有顯道，福善禍淫，安南黎賊父子，覆轍在前，可鑒矣。其即還占城使者，還蘇門答刺滿刺加所受印詔。自今安分守禮，睦鄰保境，庶幾永享太平。（明太宗實錄卷五十三）

時暹羅所遣貢使夾風飄至安南，盡為黎民所殺，止餘李黑一人，後官軍征安南獲之以歸，帝問之，六年（西元一四〇八）八月，命官張原送還暹羅，賜王幣帛，令厚恤被殺者之家。九月，中官鄭和使其國，其王遣使貢方物謝前罪。（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羅傳）和之出使，屢至暹羅隨從太倉費信（公曉），詠暹羅詩云：

海內暹羅國，山形似壘城，三春花草盛，九夏稻禾榮。竟日男安坐，移時婦決行，簪羅羅布白，腰下束花青。失序人倫亂，無條禮法輕，富貴酋長貴，豪俠庶民橫。香翠通商販，海賊如鈔行，蠻戎欲帝德，金表貢神京。（星槎勝覽前集暹羅）

明史暹羅傳稱「其國有三寶廟，祀中官鄭和」。（明史三百二十四暹羅傳）高僧問張燮（紹和）撰東西洋考，載鄭和在暹羅之紀念物有四：一曰錫門，

云華人出入必經之處，鄭和為建車輿，扁曰天竺國。二曰禮拜寺，云永樂間鄭和所建，寺甚宏麗。佛高與屋齊。三曰三寶廟，云在第二關，祀太監鄭和。四曰西塔，云其塔無合尖，聞其人初建塔功成，鄭和令削去之，後屢緝不能就。（東西洋考卷二暹羅）

七年（西元一四〇九）奸民何八觀等逃入暹羅，帝命使者，還告其王，納贖逃，其王即奉命遣使貢馬及方物，并送八觀等還，命張原勸幣獎之，十年（西元一四一二）命中官洪保等往賜幣。十四年（西元一四一六）王子三頓波羅摩刺割的頓遣使告其父之喪，命中官郭文性祭。別遣官賈詡，封為王，賜以素錦素羅，隨遣使謝恩。十五年（西元一四一七）賜王錦四疋，紡絲羅各十疋，賜王祀紡絲紗羅各六疋。（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羅傳）十七年（西元一四一九）十月癸未，滿刺加以受暹羅侵略，訴於朝，遣使救諭之，令與滿刺加平，（馬歡瀝涯勝覽滿刺加國條云：「此處舊不稱國，無國王，止有頭目掌管。此地屬暹羅所轄，歲輸金四十兩，否則差人征伐，永樂七年已丑，上命太監鄭和等統寶詔勅，賜頭目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滿刺加國。是後暹羅莫敢侵擾。其頭目蒙恩為王，娶妻子赴京朝謝，貢進方物」。則滿刺加本為暹羅屬地，明廷扶之獨立。）勅曰：

朕祇膺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為治，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職奉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者滿刺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兵相對，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滿刺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為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為所惑，轉睦鄰國，無相侵越，並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明太宗實錄卷一百十四）

十八年（西元一四二〇）又貢，遣中官楊敏等護貢使歸國，仍厚賞其王。（殊域周咨錄卷八暹羅）明宣宗宣德六年（西元一四三一）二月，滿刺加頭目巫寶赤納等至京言國王欲躬來朝貢，但為暹羅國王所阻，暹羅索欲侵奪本國，本國欲奏，無能言者，今王令臣三人潛附蘇門答刺貢舟，來京乞朝廷遣人諭暹羅王無肆欺凌，不勝感恩之至。上命行在禮部賜寶巫寶赤納等，遣附太監鄭和舟還國，令和勸諭暹羅國王曰：

朕主率天下，一視同仁，爾能恭視朝廷，屢遣使朝貢，朕用爾嘉，比聞滿刺加國王欲恭來朝，而阻於國王，以朕度之，必非王意，皆王左右之人，不能深思遠慮，阻絕道路，與鄰邦起釁，斯豈長保富貴之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鄰通好，省諭下人，勿肆侵侮，則見王能敬天事大，保國安民，和睦鄰境，以副朕同仁之心。

禮部言：「諸番貢使，例賜予，巫賈赤納非有貢物，給賞無例」。上曰：「遠人數萬里外來訴不平，豈可不賞」，遂賜給絲製衣綵幣表裏絹布及金織襲衣有差。(明宣宗實錄卷七十六)明代宗景泰四年(西元一四五三)給事中劉榮，行人劉泰往祭暹羅故王波羅摩刺刺的額，封其嗣子把羅蘭米孫刺為王。明憲宗成化十八年，(西元一四八二)遣使朝貢，且告父喪，命給事中林霽，行人姚隆往封其子國隆勅刺略坤息刺尤地為王。(殊域周咨錄：成化十七年(西元一四八一)遣行人姚隆往冊封其王)(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羅傳)明孝宗弘治中(西元一四八八至一五〇五)給事中林恒復奉使行冊封禮，刑部傳郎屠勳送林黃門詩曰：

八月星樓萬里行，載將恩雨過蠻城，更驚每用占朝暮，土色還應識地名，陸賈有才堪使粵，班生無處不登瀛，誰云此去滄溟遠，飛夢時常到玉京。

大學士楊一海贈林黃門詩曰：

百年文軌萬方同，地盡羅羅古未通，封建屢崇昭代禮，檢揚兼仗使臣功。天連島嶼煙塵靜，日射滄溟瘴雨空，聞道越裳王化在，幾多重譯頌聲中。(殊域周咨錄卷八暹羅)

(四)清代 其在清世，暹羅雖屢經敕封，然所賜敕諭，往往令其使臣齎回，或交兩廣總督頒給，未嘗遣派使臣前往封賞。清聖祖康熙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五)暹羅貢使提坤司咨喇耶邁低禮等至，具表請封，四月丁巳冊封森烈拍臘照古籍拍臘馬噶坤司由提呀苦埃為暹羅國王，賜誥命及駝紐鍍金銀印，令使臣齎回。其誥曰：

來王來享，要荒昭事大之誠，悉主悉臣，國家著柔遠之義。朕續承鴻緒，期德教暨於遐陬，旣撫多方，使屏翰躋於康人。彝章具在，渙號宜頒。爾暹羅國森烈拍臘照古籍拍臘馬噶坤司由提呀苦埃秉志忠誠，服躬禮義，既傾心以向化，乃航海而請封。嶺山帶河，克荷維藩之寄，制節謹度，無忘執玉之心。念爾惻忱，朕甚嘉焉，今封爾為暹羅國王，錫

之誥命。爾其益矢忠貞，廣宣聲教，膺茲榮耀，輯乃封圻。於戲！保民社而王，集休聲於舊服，守共球之職，懋嘉績於侯封爾其欽哉，無替朕命。(清聖祖實錄卷四十二)

清高宗乾隆中葉，緬甸攻暹羅，攻圍其國都阿由提亞，三月陷之，殺其王，暹羅遂亡。緬酋憤慨既破暹羅，特強侵略邊境，清廷遣將軍明瑞，大學士傅恒，將軍阿桂阿里賽等征之。緬甸調征暹羅軍自敗。當阿由提亞之陷也，暹羅守長鄭昭方率軍有事東浦寨，聞都城陷，旋師赴援疊與緬戰，構兵數年，既以緬困於中國，昭乘其疲敵既破之，其國始復。鄭昭故中國廣東人，父買於暹羅，生昭，長有才略，仕於暹羅。既破緬軍，國人推昭為主，遷都盤谷，鎮撫緬緬，國以殷富。乾隆四十六年(西元一七八一)昭遣使入貢，帝嘉之。其子鄭華，亦材武，屢破緬軍，緬酋孟限不能敵，東徙居豐得。(清史稿屬國傳三暹羅)五十一年(西元一七八六)華遣使入貢。十二月戊午，封華為暹羅國王，如康熙十二年之例。制曰：

我國家誕膺天眷，統御萬方，聲教覃敷，遐邇率服。爾暹羅國地隔重洋，向修職貢，自暹羅匪破滅之後，人民土地悉就摧殘，實堪憫惻。前攝國長事鄭昭當舉國被兵之後，收合餘燼，保有一方，不墮朝貢。其嗣鄭華，克承父志，遣使航海遠來，具見忱悃。朕撫綏方夏，罔有內外，悉主悉臣，記暹羅舊王後嗣尚存，自當擇其嫡派，俾守世封。茲聞鄭華皆因兵革淪亡，鄭氏攝國長事，既聞再世，用能保其土宇，輯和人民，該國臣庶，共所推戴。用是特頒朝命，封爾鄭華為暹羅國王，錫之浩印。該國王尙其恪修職事，慎字藩封，撫輯番民，勿替前業，以副朕懷柔海邦，與廢繼絕之至意。(清高宗實錄卷一千二百七十一)

先是緬甸憐內附後，屢為暹羅所敗，乾隆五十三年(西元一七八八)來貢，乞諭暹羅罷兵。五十四年(西元一七八九)正月甲戌勅諭鄭華曰：

朕准自古帝王功隆丕冒，典重懷柔，凡航海梯山重澤而至者，無不悉歸涵育，咸被恩膏。爾暹羅國王鄭華遠處海隅，其受封藩職，遣使怕使滑里運通亞挑那赤突等恭貢方物，謝恩入貢，具昭忱悃，良可褒嘉。朕復念爾與緬甸境壤毗連，後前情敵釁角牙相繼無算，侵陵爾國，與師構怨，匪爾之由，今緬甸孟限新掌國事，悔罪抒誠願求內附，已於該使臣回國時，諭令孟限與爾國睦隣修好，毋尋干戈。爾國亦宜盡釋前嫌，永消兵釁，彼此和好，以期息事寧人，同作藩封，共承恩膏。茲特賜爾王綵

帶等物，尙其感受嘉命，倍篤忠忱，仰副眷懷，長膺寵錫，欽哉。(清高宗實錄卷一千三百二十一)

明年，鄭華者稱「乾隆三十一年烏肚(即花肚)構兵，國破君亡，其父鄭昭，光復故物，十僅五六。舊有丹著氏麻叻，塗懷之城，仍被占據，懇諭烏肚歸還，以復國土之舊」。兩廣總督郭世勳以聞，帝念暹羅所稱之烏肚番，即緬甸，前緬甸與暹羅詔氏構兵，係已故緬酋傳駁，非今王孟限之事，丹著氏等三城，亦係詔氏在國時被緬甸侵占，非鄭氏國土，相安年久，自應各守疆界。今暹羅已經易世，暹羅又係異姓繼立為王，更不當爭論詔氏舊失疆土，命軍機大臣代世勳擬檄諭止之。清仁宗嘉慶二年(西元一七九七)遣使賀慶及登極，(清稿屬國傳三暹羅)是年正月戊辰，帝奉太上皇帝命賜鄭華敕曰：

九服承風，建極耆會歸之義，之加錫命，樂天廣恒冒之仁，舊典為昭，新綸用沛。爾暹羅國王鄭華，屢供王會，久列藩封，茲於嘉慶二年，復遣使臣奉表入貢，鑒其忱悃，久荷褒揚。至以天朝，禮慶重疊，倍呈方物，具見國王輸誠效順，弗懈益虔，實屬可嘉。國家厚往薄來，字小柔遠，自有定制。更念兩國僻處海陬，棟航遠涉，業經備物進呈，若從揄御，勞費轉多。是以特飭所司，將此次所進貢物，俱行收受，加賜國王文綺等件。爾後祇須照常進呈一分，毋庸增添。如國王仍前備進兩分，即飭廣東督撫發還一分，以昭定制而示體恤。王其祇承眷顧，益懋忠純，永膺蕃庶之惠，長隸職方之掌。欽哉。特諭。(清仁宗實錄卷十三)

鄭華卒，鄭佛嗣立，十五年(西元一八一〇)封鄭佛為暹羅王，給誥命鈐紐金銀印，交使齎回。鄭佛傳位其子鄭福，清宣宗道光五年(西元一八二五)封鄭福為暹羅王。(清史稿屬國傳三暹羅)諭云：「暹羅國世子鄭福應行承襲，見在暹理國政，因值例貢之期，虔備方物，遣使入貢，並懇請敕封，該使臣在洋遭風，擊散船隻，淹斃水手多名，深堪憫惻。自應優加撫恤，即令在粵休息調養，毋庸遽道來京。應領賚敕，著該衙門照例擬擬，俟領到粵，即交該使臣齎奉回國。」(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三暹羅)清文宗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鄭福卒弟鄭明立，二年(西元一八五二)遣使補進例貢並請敕封。(清史稿屬國傳三暹羅)三年(西元一八五三)諭徐廣稱等云：「暹羅國王遣使補進例貢，並謝敕封，具見恭順之忱。該貢使抵粵，著即派員伴送，於本年封印前抵京。該嗣王鄭明請封，應行該衙門擬擬

，交詔使齎回，」尋為暹使所苦，遂不至。(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四暹羅)

綜上所述，中國與暹羅之關係，約可分為前後時期，自孫吳晉宋以迄隋唐，是為前期，而以隋時為尤盛。自元明以迄於清，是為後期，而以明世為最隆。在此時期中，中國為亞洲之盟國，四裔諸邦，視為宗主，號稱「天朝」，而中國亦以此自居。暹羅與中國之關係，其一例也，近世以來，其勢大變。中國國勢既不自振，歐西諸國代之而起，舊時交誼，於是中斷。暹羅自道光始與英人締約，各國繼之，羣認其獨立，暹人亦思自振勵，朝貢之典禮遂缺。及咸豐改元，太平軍起，東南披靡，風聲所播，及於南洋，西人又加煽惑，暹人信之，欲乘此脫離屬國名義。清穆宗同治八年(西元一八六九)遣使上書，請廢貢賦之禮，贈獻方物，授受儀式，當與西洋諸國同。清廷拒之。清德宗光緒四年(西元一八七八)、會紀澤使英，途遇暹京，諭令照舊入貢，暹不允。但請立商約，又拒之。五年(西元一八七九)三月，暹廷忽得駐暹英領事轉遞中國備貨札文，蓋英官以戰船假中國旗號，偽云實貢之師，以脅暹人，使之求助於彼也。暹王知之，向臣下具道所以歷年欠貢之故，因貢表內前用跪具字樣，近已改用西禮，不無窒礙，然卒莫為代達於中國者，故不能不與英人倍加親密云。先是暹王久拉即古蘭格羅以勢派意情，下令改朝易服，禁蓄奴，興教育，闢道路，定法律，更幣制，整頓林業，皆效法西俗，國勢類以稍充。然介於英法兩大之間，法既以交趾支那東京為屬地，以東清寨，及南部越南為保護國，又有暹羅以湄公河東一帶為法屬地，暹羅百方拒之不得，許以所索之地，並償金五百萬法郎克以和，時光緒十九年(西元一八九三)事也。法既伸張勢力於暹羅，英以屬土與暹毗連，恐法大侵入緬甸，及於次年(西元一八九四)與法人訂立互不侵佔暹羅片土之約，至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〇四)，雙方在倫敦簽押宣言，確定英法兩國在暹政治上之地位，並保證其獨立。(清史記事本末卷六十一)

暹羅自經宣布獨立後，政治法律，教育軍備，及工商實業，俱有顯著之進步。東西各國，皆派駐暹使臣，以平等相遇。清廷亦特諭外務部及出使大臣楊士琦考察暹商情形，是否能仿他國派駐暹出使大臣或領事，以維商務而善鄰交。光緒三十四年(西元一九〇八)三月，楊氏奏上核議暹羅訂約通使事宜，略謂：「暹羅立國南徵，互市之利，始自隋唐，流寓之人，多係閩粵，梯航通道，久被華風，係我朝屬國。近歲銳意圖強，儼然獨立，與各國

通商，冠蓋四出，西人咸目為東方比利時國，不以弱小而輕之。其全國戶口不滿千萬，而華僑乃三百萬人，人數之衆，過於爪哇，商業之盛，過於西貢，惟我國尚未派有使臣，領事之保護，勢孤氣餒，外人未免相輕。臣在暹時，商民等環訴籲求，殷殷仰望。竊以世界大勢，趨重商戰，因國際貿易之交通發達，而國際之交涉，由是而生，故兩國通商，即互有締結條約，派遣使

暹羅華僑人口的新估計

何啟拔

(一)
暹羅在十四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是二個國家：一為以華富里(Layavut)為都的羅斛國；一為于一二五七年建國于速古臺(Sukotai)之暹國。據汪大淵島夷志略暹國條謂：「至正己丑夏五月，降于羅斛」。自是一般學者遂認暹羅國名始于此時。汪大淵謂「降于羅斛」，殆為大城(Ayudhya)崛起之訛。一直至一三七七年二國始併而為一，該年明太祖賜給「暹羅國王」印，自是以後，暹羅一名始見于我國史籍。

暹羅的國名見于我國史籍雖為十四世紀末期的事，可是二者的歷史關係却遠在十四世紀以前。我國暹民移殖暹羅開始于何時即難稽考。以暹羅的推理論，約開始于十三世紀以前，但當時人數不多，暹民運動並不踴躍。暹民運動比較潮湧，恐在十七世紀中葉後的事。國人之遷移暹羅，我國史籍記載最早的，恐為一三〇〇年暹王敢木丁(Ramkhanong)第一次來朝中國時帶去我國瓷匠多人為鎗矢。著名的暹羅桑甲洛陶器(Sawanakalok Potteries)即為他們的成績。此後遷入暹羅的逐漸加多，而記載華僑的我國文獻亦隨之俱增。

(二)
華僑人口數字最為紛歧，謎最不易知道的，首推暹羅。因為：(一)正如黃衷在海語中所說：「華人駐此，娶番女。」「國無姓氏，華人流寓者，始從本姓，一再傳亦亡矣。」數百年前的情形已如此，目今更不贅而論了。(二)華僑的概念，我國與暹羅政府的看法，大相逕庭。(三)暹羅政府以教育來陶化，法律來約束，婚姻來引誘，而有意加予贖贖。此外，一部份華僑為種種便利起見，在暹人社會自認暹人，亦真不影響。

臣之權利，初不以大小強弱為殊。况暹羅近居東亞，地接滇南，屢以疆域界務與英法相交涉，尤隱繫中國邊防，固國保商，均關緊要，據請飭下外務部核辦情形，相機辦理，以示朝廷惠保商民懷柔遠人之至意。奉旨：「外務部知道。」(戊申四月初九日時報)於是中暹兩國之關係，乃入一新階段云。

暹羅于一九〇四年開始人口普查，原來只預定調查十二州，後來因為實際的需要，才擴大到全國，而于一九〇九年才普查完竣。據該次的普查結果，全國總人口有八、二六六、四六六人，內中有華僑一七〇、九九〇人。正在其時，曼谷亦公佈其人口普查的結果，說我僑在該地有一九七、九一〇人。暹羅全國華僑人口比首府曼谷一地竟少了二六、九二〇人，至為無稽。政府所發表的十七多萬華僑人數，如果說是從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九的六個年頭的中國暹民的淨移入人數，還可勉強說得過去。又據暹羅政府于一九二九年舉行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在全國一一、五〇六、二〇七總人口的統計中，華僑人口僅有四四五、二七四人。這一點我們單從暹羅王國統計年鑑(Statistical Year Book of the Kingdom of Siam)所載歷年華僑從曼谷一地移入與移出的移民統計看起來，也覺得暹羅政府的荒謬與幼稚了。據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的九個年頭中，我國暹民從曼谷一地(南部國境及其他地方移入者不在內)移入的人數有八四一、〇五三人，移出的有五一八、四六二人，兩相比較，我國暹民移入暹羅的淨數即為三二二、五九一人。在短短的九年中，首府曼谷我國暹民淨移入人數已有三十二萬多，若將南部以及其他各地移入的計算在內當超出四十萬了。如此暹羅公佈全國華僑人口的數目，似又與華僑移入淨數不謀而合，足見其普查公佈數字的不可靠。

暹羅政府最近公佈華僑人口數僅為六十多萬。這一個統計數字，再從移民出入口方面觀察，同樣的也不能使我們置信。據暹羅王國統計年鑑載，單就自曼谷一地論，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八年，我僑遷入暹羅的計三十萬多人，移出的計二十九萬多人，淨入暹人數則將近十萬。這僅指曼谷一地而言，若把其他各地一併算入，恐將近十三萬之數。再加上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的

華僑淨移入的人口當在五十萬，然後再自一九三九年甚至一九四一年的淨移入計算在內當在六十萬以上，而暹羅政府最近公佈華僑人口數僅六十多萬，怎令我們置信？可見暹羅政府之有意加予隱瞞了。

(三)

暹羅政府發表關於我僑人口的統計數字，既已不能給我們知道我暹羅華僑人口的實際總數，我們只好從事估計，估計的人很多，除筆者在海外華僑人口商榷一文（載新中華）所提者作一般的估計外，對暹羅華僑人口的估計，比較重要的作者則為J. B. Pattegorik, M. G. Reuter, Richards, M. Moseoff, W. Credner, H. R. Mill, B. Lasher, 陳序經、高事恒、項康元、姚枋，何啓拔等。關於暹羅華僑人口的估計，最早而最有權威的要算為居住在暹羅多年的暹羅問題研究專家柏爾剛主教（J. B. Pattegorik）。他于一八五四年估計暹羅全國人口數為六百萬，其中汝族人一百九十七萬，中國人一百五十萬，老撾人二百萬，馬來人一百萬，柬埔寨人五十萬，其他人種十萬。一八九〇年左右魯帝亞（M. G. Reuter）估計暹羅有一千萬人口，中國人占三分之一（見H. S. Hallett: A Thousand Miles on the Elephant in the Than State）。密爾（H. R. Mill）于一九一五年在所著國際地理（International Geography）估計為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夏之時神父（Richards）于一九〇八年出版之中國簡明地理（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說有一百五十萬。奧蘭那（W. Credner）在所著暹羅·其土地與人民（Siam: Das Land der Tai）一書的估計為二百萬，其中純中國移民有八十萬。拉斯（B. Lasher）在其太平洋問題中的估計為一百一十萬。陳序經先生于一九四一年左右在新經濟半月刊第四期發表的「暹羅人口與華僑」一文的估計為三百萬至五百萬，最近在所著南洋與中國一書，又從新的估計一遍，說有七百萬，至少有三至五百萬。項康元先生在其南洋考察報告中謂有六百萬，筆者在東方雜誌第四十一卷第五號發表的「南洋華僑人口的分析」一文的估計即謂至少有三百萬。姚枋先生在所著中南半島史綱要一書謂有五百萬，其中純血統的華僑也有二百萬人左右。

上列各家的估計差次很大，孰是孰非，在未獲得充分事實之前，難下斷語。事實是最好的證人，亦是最有利的反駁者，所以只好待諸來日讓事實去答復了。不過，在上列各位先生的估計中，比較用科學方法去推算的，要算為陳、姚、何三位先生。陳先生用的是增加比率法，即據總人口的增加，以

及中汝二族人口的比率去推斷，並益以人口遷移的史實與專家的意見。其方法至為精密，並有獨具隻眼之處。姚先生用的是類比加倍增加法，即以馬來亞荷印華僑人口加倍年數作為推論暹羅華僑人口的依據，亦有可取之處。何先生即從人口遷移的實際統計，作為估計的根據，且以中汝人口比率為之旁證。據此，我們認為陳姚二位先生的估計，或為稍大。蓋七百萬，甚至五百萬的華僑人口數等于一九三七年暹羅全國人口的一半，等一九四一年暹羅總人口（一五、七二八、三〇〇）百分之四十四人。又等最近一千八百萬左右的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九弱。但以柏爾剛主教的估計（一般均認柏氏的估計相當可靠）為準，華僑人口為暹羅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那麼目前華僑人口總不會超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因為暹羅近年人口增加主要的途徑為自然增加（即出生減死亡），移民的淨增是居次要地位。這即是說，暹羅人口的增加還是比我僑人口的增加為快。不過，我僑向受「多子多孫與無後為大」的人文思想的影響與支配，其生育率必是驚人的，至于其死亡率，即因華僑經濟狀況較優，則不會太高。自是，我僑人口的增加率即不會和汝族的差得太遠。換言之，以柏氏的估計論，我僑人口雖不能超出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亦不會距四分之一太遠。由此可見七百萬，甚至五百萬的估計似乎過高，而在三百萬以下的估計則未免過低了。依此而論，我僑人口約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之間。所以在最近的一千八百萬左右的總人口中，我僑即約有三百六十萬至四百五十萬，其中數即為四萬強。再從移民統計推論，其所得結果，亦不謀而合。

據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 Vol. 1 的統計，一八七六至一九〇一年從汕頭到暹羅的華僑有二五二、二二六人。這僅指汕頭一地而言，至于其他各地如香港、漢口、廈門、廣州、星洲、越南、緬甸等地移入的尚未在內，而其數目必亦相當可觀，其淨移民數以四十萬來說，每年平均一萬餘人，並不為多。一八五四至一八七六年移民統計雖缺，我們若以同樣方法推算，恐亦近四十萬。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據 Great Britain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Annual Series No. 2468 的統計，自汕頭至曼谷的中國移民有一四三、九五七人，從曼谷回汕頭的計一一〇、五二五人；自海口到曼谷的計二七、八〇九人，從曼谷回海口的計二一九七〇人。據上我們知道三年內自汕頭海口二地到曼谷的淨移民人數為三九、二七一人。若把其他各地遷入者計算在內，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華僑人口淨數至少尚有六萬。

九一四至一九二二年的淨移入人數，若以平均每年二萬計，當在十四萬左右；一九〇一至一九二二年即約為二十二萬了。將一八五四至一九二一年的估計加起來約為二百二十萬。這個數目加上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一年的六十多萬，以及近年的復負人數將近一百八十多萬。再和柏氏的估計加起來即為三百三四十萬了。此外，再以歷年的自然增加計算進去，當在四百萬強。總而言之，暹羅華僑人口至少有四百萬了。

所以從人口數量的觀點論，在一千多萬的海外華僑人口中，要以南洋華

暹羅的現實與華僑

潘公昭

「無風三尺浪」的暹羅政情，自從東南亞整個局勢逆轉和惡化以來，就更加陷入驚風駭浪之中，一方面是國外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集團勢力對暹羅的進攻，縱橫捭闔地製造事變以圖私利，把暹羅作為爭取東南亞霸權的基地和根據地；另一方面是暹羅國內的反民主反革命集團，援引外力，以爭權奪利，因此內部的紛爭日趨嚴重。在這內外兩重壓力交攻之下，暹羅最廣大的人民，特別是在一千八百萬總人口中佔有三百多萬的華僑，便首先在各種各樣的形式之下，遭受到慘絕人寰的迫害。

首先，我們要了解暹羅的政情，那就不得不瞭解清楚暹羅在戰後的國際關係。大家都知道，暹羅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也就是在今天變被波政權的統治之下，它緊跟着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背後，一面做日寇的爪牙，為侵略東南亞的主要幫兇之一，一面仗着日寇聲威，對內壓榨聚斂，對外掠奪鄰國；而尤以殘忍刻毒的排華政策為它的重要罪行之一。日寇大勢將去之時，才由日寇與變被波協商之下，推出一個面目較不十分猙獰的政客乃寬上台，準備應變。當日寇投降之後，又由三朝元老之變巴立向國際和在國內多方活動，利用了各強國在對暹羅關係上的各有私心的矛盾，居然轉危為安，沒有被作為敵性國加以清算，依舊保持其「獨立」的國格，暹羅的當局，不能不說是東南亞許多反動統治階層中的幸運者。

暹羅在戰前本是英帝國主義者變相的殖民地，從貿易、產業、金融一直到政治軍事外交，大權都在倫敦的壟斷集團手裏。在戰爭爆發前後，才開始

僑人日為絕對多數，尤以南洋之暹羅首屈一指。可見華僑是以南洋為中心，尤以暹羅為中心了。然而按諸實際，南洋尤以暹羅（馬來亞亦如此）亦是以華僑為中心的。不過，在變被波統治下的暹羅，以政治、經濟、教育的三管齊下的種種排華下，暹羅以華僑為中心的特色將變為歷史上的陳迹了。而現在目前的，正是這四百萬華僑面臨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局面。不但這四百萬華僑的境況是如此，即是倚靠這四百萬為活的許多四百萬的華僑地區的同胞亦正遭着同樣的厄運，而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這一點，望當局與國人加以注意。

出現美日兩個新的競爭者，他們各自在暹羅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和爪牙之流。不過美國的行動比較隱蔽些，日本的行動比較露骨化和更加操切些，所以它的爪牙和代理人變被波及其夥計們，操縱了政權便走上法西斯的兇暴不法的邪道。戰爭中間，中英美各國都會在暹羅進行地下活動，那時老政客變巴立等即秘密成立「自由泰」集團，進行了比較聰明的投機，所以在戰後初期政權，雖然走馬燈的來我去一年數易內閣，但是實際上是由變巴立立在那裏支配的。他的政治路線還是利用國際矛盾以圖僥倖。英國在大戰中元氣斷喪，所以方圖從別國獲得補償，除了加強對殖民地的控制之外，自然還力圖恢復對暹的支配。因而提出了二十一條件。然而美國在戰後的勢趨更盛，不僅在對暹貿易金融方面急求與英國競爭，而且鑒於暹羅在東南亞所處戰略地位的重要，亟謀承繼過去英國日本而支配及於政治與軍事。這種競爭，更助長了暹羅統治階層的投機冒險的政治路線。

同時必須指出，由於戰時日寇及親日的統治階級瘋狂的壓榨和掠奪，由於法西斯統治軍事擴張政策所引起的財政經濟上的困難，以及由於長期的帝國主義經濟支配所造成的產業與貿易的僵枯現象，戰後暹羅少數豪富與廣大羣眾赤貧化的對立更加尖銳化了，因此反映到政治上人民革命情緒的普遍高漲和派系衝突日甚一日。三年以來暹羅政情的觀感不安，政潮迭起，而且愈演愈烈，國王暗殺事件不久，又有去年「一一八」政變發生，而政變後的乃寬過渡內閣不久就由變被波正式重掌政權，恢復行使戰時法西斯政策而以排

華為第一步。

今天的內外局勢，畢竟已非三年前可比，在國際上儘管英美看法盡力在東南亞重新建立新的殖民地制度，但殖民地體系畢竟已開始走上崩潰之路；中國抗戰革命，民主勢力的成功；越南印尼民族解放運動的進展和民主獨立政府的成就；乃至印度緬甸菲律賓的宗主國不得不放棄其舊的殖民地統治形式，而馬來亞人民的革命鬥爭這一切不可能不影響到暹羅廣大被迫害的羣衆；而實際上三年來暹羅人民政治的覺醒也開始提高了，雖然他們一般的遠慮落於華僑之後，但是城市工人尤其是米糧業職工等在好幾次改善生活的鬥爭中表現了他們的確已覺醒，他們開始認識和善於運用自己的團結力量了。這一切形勢使變政政權驚惶萬狀，而不得不千方百計的利用國際矛盾，製造排華事件藉以轉移人民革命的對象，緩和內部政治鬥爭，而鞏固自己的政權

變政政權本身的統治基礎是很脆弱的，他雖然以大地主貴族官僚買辦資本家的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可是其他以同一階級基礎而活動的政治派系如變巴立、豐食隆派，及以變巴立這個政客為偶像的海軍派，始終在和變政政權進行着鬥爭。而曾經一再做變政政權的替身的乃宜亞拜環一派，也已不斷地進行反對活動。特別是變巴立（即乃比里）一派，近來更加傾向於英國，變巴立自己逃避在新加坡，在英國的某種支持之下，繼續策動其國內及國際潛勢力，以圖恢復政權。英國自然也會把這一派當作重要的棋子以圖恢復自己在暹羅的地位。變政政權曾在美國的暗示之下，盡力拉攏這個政客，組織「聯合政府」，消弭內部糾紛，曾經宣稱只要變巴立返國參加政府，就可把業已被封的變巴立的大金銀機關大城銀行等處交還。可是變巴立沒有受騙，因此又不惜加以恫嚇，而從事前王被殺案的澈查，說變巴立有弑君的罪嫌，以圖消滅他在王族貴族封建地主方面的政治勢力。但是這當然更加激化了內政上的矛盾。

軍人方面，陸海空軍之間的衝突也日益尖銳化了，一向擁護變巴立的海軍系，對於以變政政權為首腦的陸軍系，一直進行着鬥爭。海軍系始終沒有真誠地和現政權合作，並且盡力進行煽動叛變和破壞工作。不但陸海空軍間如此矛盾，就是在陸軍內部，也以在朝在野之分而進行着爭權奪利的鬥爭，其慘烈程度遠出一般人的想像。甚至同為陸軍系的在朝派，也由於這個會為法西斯戰犯由他們以非法舉行上台以後的行爲，竟然過江抽板，而驅離新的分化及叛亂，不久以前即有一個政變時變政政權自己最得力的幹部某陸軍少將被捕，這被認為變政政權「肅軍」「清君側」的開端，因而更加激化了軍界內部的分化。當然，變政政權和海軍派也有了新的結合，於是局勢日益嚴重。

今年八月中旬以來暹羅羅「新政變」的傳說和變政政權寬至下令全國軍警戒嚴，並在八月十五日發表廣播演說恫嚇反對派，這種緊急狀態的國內政治背景，就是從上述內部矛盾日益尖銳化這一點上出發的。爲了緩和內部的矛盾，爲了把目標轉移別的地方去，因此，排華運動便成爲現政權挽回危機鞏固地位的重要策略。

不過，在目前環境下要像太平洋戰爭前後那樣公然的實行排華，顯然是不可行了。因爲第一，中國的國際地位，至少在名義上，靠了長期抗戰千百萬人民的犧牲，已和當時大不相同了。狂妄的露骨的排華是會激起國際公論的抨擊。第二，公然的單純的排華，對於國內數量巨大的華僑，必然激化其團結與鬥爭，將使暹羅經濟仍至政治上蒙受不可抗拒的損害。第三，暹羅現政權的反對黨——特別是保持着中國人血統的大政客變巴立等將和中國實力派及華僑合作，造成現政權致命的威脅。特別是在最近中美關係一天緊密一天而美國對東南亞勢力一天擴張一天的時候，同樣以親美而獲得並繼續自己政權的變政政權一派，當然不會不考慮及此的。

可是，變政政權是和暹羅其他大政客一樣善於投機的。他在這時找到了千載一時的機會，即是：（一）美國正在努力擴展對東南亞及整個遠東的支配勢力，而以擴張馬歇爾計劃至遠東爲基本方針，以東亞反共防蘇聯合陣線爲中心號召；在這一新趨向中，暹羅在東南亞反共陣線的戰略與政治地位是很重要的。美國方面不斷的傳出「蘇聯以暹羅使館爲赤化東南亞的大本營」，不斷宣傳「中國共產黨大批活動份子以暹羅策劃緬甸各地的叛亂」，這一切自然都是有利於暹羅排華的。（二）英國雖然盡力支持變巴立及其他反對派以與變政政權爲難，反映出英美在暹羅的衝突，然而英國工黨政府的外交政策早已走上美國路線，在歐洲參加了馬歇爾計劃，在遠東的爭持也就沒有什麼力量；特別是對於馬來亞的人民叛亂，英國已不得不求助於美國，至少在反共立場上是完全一致的了；所以變政政權最近一再表示與馬來亞英當局通力合作圍剿暹馬邊境匪共，以圖在這一點上獲得英國的讚揚與合作。（三）中國的剿共軍事日益擴大，這也使變政政權獲得機會，他宣傳「暹羅共黨叛亂」，而這些「叛亂者」是受中共指揮及大部份是中共份子，這樣一來，不僅他的排華可以受到中國當局的默許，甚且在最近幾個月的事實所表現，他還可

能得到有力的幫助。

最近幾個月來的排華運動，就在「反共」的煙幕下慘酷地演出了。在雙披汶之流是非常高彩烈的，因為這是「反共」，不僅可以欺騙天下，避免國外輿論的攻擊，不僅可以搪塞中國方面的抗議；並且可以防止華僑羣起而反攻以致影響大局。在積極的方面，對於雙披汶政權更有意義的，是可以和太平洋戰爭前後一樣，來一次政治和外交上的大投機大冒險；對內，他再度盡力宣傳反共排華，好像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都由於「共黨」的叛亂，而共黨又都是華僑，這樣就可以把國內人民對政府的情憤，轉移到華僑身上；用對華僑的攻擊，消除國內的革命危機。對外；更重要的是以「正統」的東南亞反共中心自居，盡力誇張自己的排華是「反共」，盡力表示自己有

印度的悲劇

巴基斯坦的天氣陰沉了，偉大創造回教國家的領導者，為巴基斯坦人民膜拜的真納先生，於本年九月十日深夜長逝了，享年七十一歲。無疑的，這是繼印度甘地先生逝世之後又一顆巨星的隕落！值得注意的，是兩大巨人逝世於印回分治之後，印回民族極端不安之際。我以為這是印回的損失，并且是全印度悲劇的開始。

甘地先生同真納先生，生前各有抱負，對於印度分治的問題，各領其門人備徒而表示各不相同的主張。甘地主張印回合作，真納主張印回分治，兩人的主張扞格甚大，可是兩人的私誼，並不算惡劣。甘地從不批評真納的頑固，而真納亦從未怨言甘地。甘地遇刺身死，真納曾沐浴齋戒，為他的老友灑下同情的眼淚。真納同尼赫魯的情感很不睦，他認為尼赫魯過於誇大和輕率，他認為尼赫魯的民族優越感強烈；自然在一個宗教家看來，是很不顧眼的。尼赫魯自認是個社會主義者，並且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自然厭棄頑固與偏頗，反對冷峻與嚴肅，所以在尼赫魯眼中的真納，祇不過是一個孤獨偏強的朽木罷了。甘地死後，真納同尼赫魯從無過往，為了喀什米爾的爭奪，印巴兩民族火併一場，真納同尼赫魯竟惡聲相向：一個暗中批評敵對「幼稚」「輕浮」，一個暗中批評敵對「沒落」「腐敗」。其實，真納尼赫魯兩人，印巴兩方，同為政治意識的病患者，不健康的人。

力量在東南亞組織起士著的反共力量，他最近的公然聲明與英國合作堵斷馬來亞的緬甸的共軍，公然遣派軍事使團訪問越南法軍佔領區，表示可以協助法軍及越僑軍進攻越南共和國。這樣既可以使緩和以英美矛盾為背景的内部反對黨的攻擊，又可以獲得英美法國進一步的支持，鞏固其政權，並乘機向外擴張，有如雙披汶在日寇時代所做的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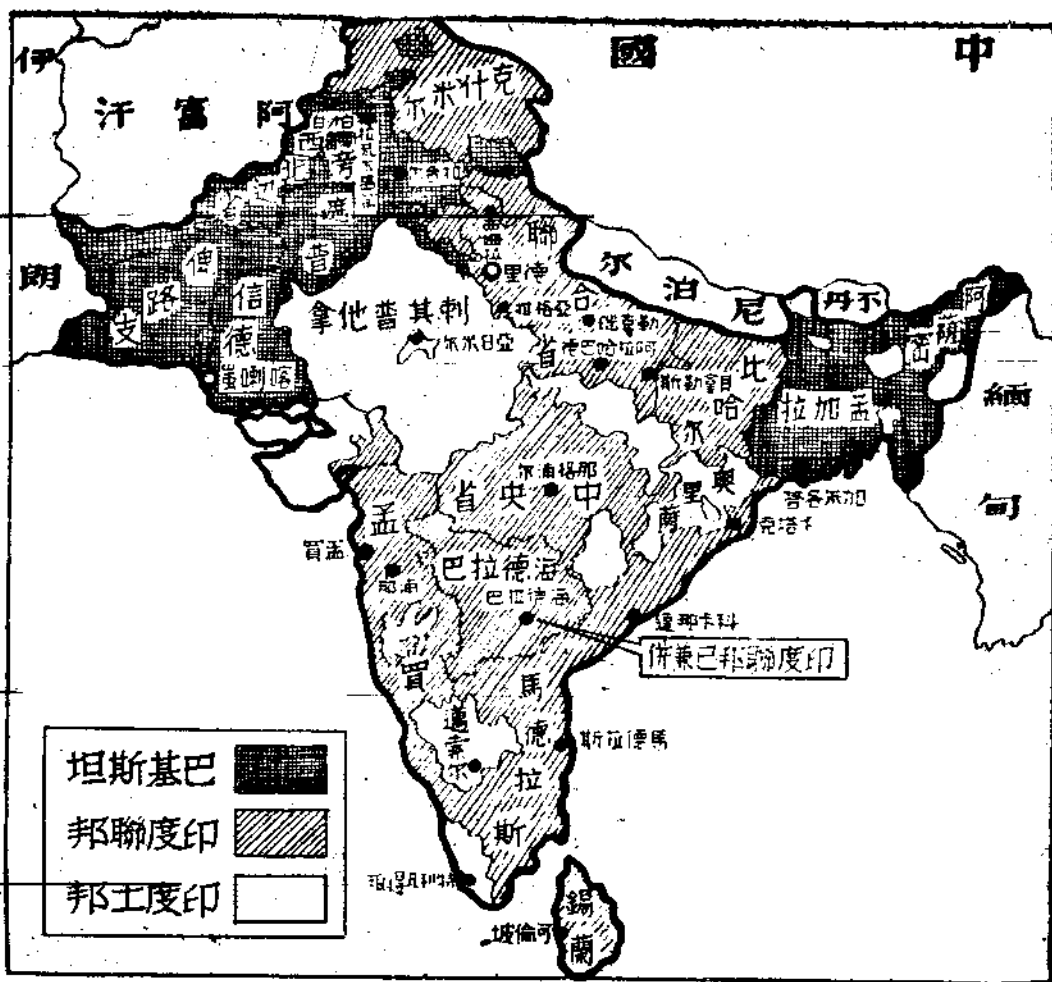
暹羅局勢動亂的現實和華僑處境危殆的嚴重性，就是如此。我們極目南國，對於三百多萬暹羅僑胞的命運，真是不勝心痛！而不意在這僑之中尚有具備特殊身份的人在為虎作倀推波助瀾，藉以遂其報復私怨乘機劫掠之險謀，說起來更是令人切齒。其實，這種現象又美止暹羅一地為然！

巴基斯坦·A·B·柏里

喀什米爾在地理上，是應該歸屬巴基斯坦的，原先雙方也有這種諒解。可是印度要以兵戎相見，尼赫魯理想著實現印度聯邦的大一統，他竟不顧回族的死活。在兵力對比上，巴基斯坦可能敵對不過印度，可是巴基斯坦是有國際朋友的國家，真納會說：「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國家，」它有回教集團的支持，和宗教偏仰的一致，巴基斯坦決非孤立的。回族的教義是悲天憫人，唯不忍願見一場大屠殺，立即在分治後的兄弟之邦來表演了。除此以外，巴基斯坦是沒有理由，於建國之初即容忍至此。

真納長逝後，巴基斯坦內部動盪不安，想不到印度竟乘人之危，大舉進攻海德拉巴邦。海邦原為印回分治前的獨立邦，藩王領袖們在一年來抗拒尼赫魯的壓迫，不願歸屬於印度聯邦。自然，巴基斯坦也無力量誘致海邦人民投票加入巴基斯坦。可是，回教人民生活在海邦的，以及巴國在海邦的權益，是很重大的。巴基斯坦尊重海邦的獨立，而不威脅海邦的獨立性，料想不到真納逝世之後，印度閃電般的兼併了海邦。尼赫魯使用了權謀，在我們一個宗教徒看來，他够陰狠了。儘管他的政治理由，是如何堂皇，但在海邦人民和海邦的朋友，是痛恨在心的。

尼赫魯武力鎮平了海邦，大一步，他可能大規模進攻喀什米爾的。印軍攻海邦，國際反映很黯然，更增加尼赫魯的大膽與雄心，聯合國安理會對調



解喀什米爾問題的軟弱無能，印度可能不願國際的調解或干涉，進而擊取喀什米爾這塊寶丸之地的。假如到了這境地，印巴兩族真正的大戰便開始了，爭奪以戰，殺人盈野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

印度大陸在血泊中，喀什米爾人爲了自由的出路，他寧願就死也不屈服，巴基斯坦是必然傾全力阻撓尼赫魯的征服之夢的。巴基斯坦人被迫出此，爲了抵抗侵略，爲了打擊印度往後對巴兼併的意圖。

總而言之，這是印度歷史上一件事，對於印巴兩族合諧共存，繁榮共

存的前途，尤爲一件悲哀的事。我入讀印度四千年的歷史，殊覺滿懷悽涼，面對現實，展望來茲，真是感慨萬千。

一部印度史，是一部小朝廷史，以分爲常，以合爲暫，歷史上可稱統一者僅有四次：一次爲阿育王之時，一爲回富汗最盛之時，一爲蒙兀兒最盛之時，最後則爲英印統治。可是，統一之時頗暫，且向無統一而堅固穩定之中央政府，而形成各自分裂。現在的印回分治，是印度一次大分裂，而這次分裂的後果，將爲不可想像之未來。我會以印回宜合不宜分之理由，於一九四〇年面陳真納先生，不納。而印度國大會黨的優越性及其專斷作風，亦構成真納及其門徒，不能接受合作之重大原因。

古印度之人，在外力統治下，受千年的苦刑，未嘗不復思國，亦非敢不勇猛。如查特人、拉基普特人、馬拉塔人、錫克教人，其武勇壯烈，可驚天地而泣鬼神，惜各邦各族地域觀念太重，遭遇外族的迫害，僅知各自爲戰，而不求共存，這次海邦之易手，正是這個命運。印度歷史說明了：千年來不亡於民族之不勇，而亡於國人的不團結。印回分治儼成兩個國家，形式上仍爲英帝國之殖民地，印巴兩族之不團結，充分表徵不健康的民族傳統，仍牢固的堅實的支配着印回兩國政府和人民。這是印巴兩民族的悲哀。

印巴兩國的歷史悲哀，又豈時現在始？巴基斯坦分治運動崛起之時，即已造成印巴之悲哀，民族之分裂了。印度大陸，無理由可劃分爲不能啣接之兩塊，地理上的悲哀，祇要看巴基斯坦的地圖便可曉知。地圖上的眼淚，是一個民族的仇恨，嫉妬產生的造因；現在的印回兩國，同往這個錯誤的道路上走，喀什米爾問題和海邦問題更表現它們正往民族失敗的道路上行進。要之，這個錯誤的造因，英帝國要負完全的責任，這是第一；印回政治家缺乏遠見，或持民族優越感以欺人，要負民族屠殺失敗的責任，這是第二；印巴兩族人民在千年苦刑下，貧病最充滿了每一角落，因而貧苦無告的人民，政治覺悟性太不夠，不能團結起而爭取獨立與自由，這是第三。

爲了拯救印回兩族人民，免于戰爭的脅迫，免于僞民主主義的壓榨，唯有自動自覺起來，共同奮鬥，外求獨立，內求團結，扭轉歷史的錯誤，這樣是印回兩族人民真正的道路！不如此，不能拯救印度！

真納死了，他的門徒應有遠識，不要固執于狹隘的民族觀念中。甘地死了，留下了尼赫魯這位英雄，他黃金閃爍似的英雄夢，如不打破，我實不敢爲他的資產感到慶幸。睿智的政治家醒覺吧！（九月廿二日就寄于英倫劍橋）



讀橫田喜三郎的「天皇退位論」後

趙南柔

關於日皇退位論傳的發生，據筆者所知，第一次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旬，即五月十日火奴魯魯電訊，說：「據東京報道，日本外務省方面謂天皇或將於最近退位。」又據同日中央社東京電訊，也說：「由十日之情形判斷，日本天皇極有讓位可能，天皇恐將於六月三日開始審理主要戰犯以前讓位；天皇原擬於舉行和會後讓位，但因今次戰犯審訊時，被召喚至法庭作證之可能性極濃，故將在審訊以前讓位。」第二次是在今年遠東法庭審訊甲級戰犯工作於四月十六日宣告結束以後，一時盛傳日皇將於東條等被宣判之日退位，對於這次的謠傳，日本國內外紛紛加以評論，有主張日皇退位的，也有主張不必退位的，雖然這些議論已因盟總的聲明，即：「日皇最近仍居於日人最高崇敬之地位，故從未考慮日皇退位問題，外間所傳日皇退位之謠言，係共產黨員或超國家主義者之宣傳，就日本國民及聯合國之最大利益着眼，應保留日皇長期在位。」而已呈斂迹，可是這些議論本身在以太皇問題為中心的日本戰後歷史上多少會留下痕跡，固不必說，即使對於日本人民乃至國際人士，也會引起很大的反響，而且這種心理的反響，不會因盟總的聲明而歸於消滅，在以後天皇問題再度成為問題而被提出時，這種反響是極可能成為日本國內外對這問題所

取態度因素的。在這個意味上，對此次關於日皇退位問題的議論。特別是日本有地位的人士的議論，因其所給日本國內外的影響特別大，加以檢討，應當是並非沒有意義的事。

一

自從日本甲級戰犯審訊工作結束，迄於盟總的聲明，日本方面關於日皇退位的議論，報紙固不必說，即使是有地位的個人，也發表得很多。例如前被稱為京都學派的首領，與已故的美濃部達吉同被目為日本的權威的憲法學者佐佐木惣一；現在日本最高法院院長三淵忠彥，以及著名的評論家長谷川如是閑這三人在五月十六日出版一本雜誌上發表的關於退位問題的座談會的紀錄；日本著名的社會運動者，曾任戰前日本勞農黨黨首的大山郁夫在八月號「中央公論」上發表的論文；日本著名的法律哲學家，現任大阪商科大學校長的慎藤恭在八月十五日的「讀賣新聞」上發表的論文；以及橫田喜三郎在八月二十六日的「讀賣新聞」上發表的論文「天皇退位論」（九月八日大公報有譯文）等等，雖然牠們表現形態有直截與吞吐之分，但在主張日皇應該退位的一點上，不妨視為共通的。尤其是因為其餘的言論或文字大多只從另外的觀點——例如修改憲法或道義的觀點等——而附帶地論及退位，而橫田氏的論文，則始終從戰爭責任的觀點論述日皇必須

退位，這是特別令人注意之點，橫田氏不但是日本的著名的公法學者，其言論對日本國內外會給與相當大的影響，更因為橫田氏為中國文化界所熟知的反對軍國主義的自由主義者，特別是在九一八以後，日本政府預備退出國聯之際，橫田氏的對日本當局指摘的文字，曾為中國知識界傳誦一時，認為是日本軍閥把持下難得的正義感的學者，正因如此，他的這篇論文，對中國人民特別有喚起注意的力量。為此，筆者願意特別把這個日本的「識者中的識者」（橫田氏語）所著的可視為日本一切主張日皇退位論的代表作，拿來作為檢討的對象。

二

橫田氏的「天皇退位論」，共分五節。第一節「最近的退位問題」，說明日皇退位問題所以在近來特別成為問題的原因。他說：「戰爭結束後到現在恰巧三年了。對九一八事變以來長期間侵略戰爭有着重要責任的一些人，已從公職、教職、和重要經濟的地位，悉數被放逐了。有特殊重要責任的人們，已被當作重大戰犯受着遠東法庭的審判，這審判也已告終，只等宣判了。日本的侵略戰爭的最後審判，將被宣告了。當此之時，最高責任者天皇的退位，理所當然的要成為問題。」這裏，他確認日皇對侵略戰爭的責任，不止是「重要」，也不止是「特殊重要」，而是屬於「最高」的，他覺得責任「

最近退位問題」，說明日皇退位問題所以在近來特別成為問題的原因。他說：「戰爭結束後到現在恰巧三年了。對九一八事變以來長期間侵略戰爭有着重要責任的一些人，已從公職、教職、和重要經濟的地位，悉數被放逐了。有特殊重要責任的人們，已被當作重大戰犯受着遠東法庭的審判，這審判也已告終，只等宣判了。日本的侵略戰爭的最後審判，將被宣告了。當此之時，最高責任者天皇的退位，理所當然的要成為問題。」這裏，他確認日皇對侵略戰爭的責任，不止是「重要」，也不止是「特殊重要」，而是屬於「最高」的，他覺得責任「

「重要」的既被放逐，責任「特殊重要」的既被當作重大戰犯而受審，則責任「最高」的日皇也應當加以處置，這從論理上說來是很自然的。但是關於處置日皇，退位是否即係「理所當然」的方法，則不令人懷疑，且叫人起論理的飛躍之感。因為責任較輕的人們被放逐及作為戰犯，而責任「最高」的却祇須自動地一走了事，至少在民主主義的觀點看來，無論如何是「理所當然」的。

第二節「天皇是最高戰爭責任者」，他從理論及事實二方面論證日皇是侵略戰爭的最高責任者。在理論上，他說：「天皇是日本的元首，總攬統治權，為政治上軍事上的最高權力者，因之，是日本國家行動的最高代表者，同時，應是最高責任者。」在事實上，他說：「從實質方面來看，也是如此，這從東京裁判所發表的木戶日記來看，尤其顯而易見。……關於戰爭政策的計劃和實行，天皇是常保持關係而述說着意見的，如果加以過制，則雖有充分機會，並且是站在能夠予以過制的地位的。……實際上不加以過制，而准許並承認戰爭政策的實行，則實質上也不能不說天皇是應負最高責任了。」其實，日皇應負此次侵略戰爭的最高責任，苟非存心偏袒，則是任何人都肯肯的事，只是橫田的話說得很簡明扼要吧。然而橫田一方面既確定日皇在事實上應負最高責任，一方面却又說下面的話，替他開脫一部分責任，他說：「就個人說來，天皇也許不欲戰爭，或則在內心也會希望加以過制，但在現實上，戰爭的計劃依然是在天皇的承認和准許下進行而終於開始了。這樣看來，天皇作為一個公人，天皇不能免除對戰爭的責任。因為天皇以國家元首的地位，會給了最後的承認，所以應負最高責任。」他說這是「政治的常識，法律的公理。」

看了這些話，叫人想，日皇本人「也許」是一個和「愛好者」，只因既在公的地位上給了最後的承認，不能免除最高責任。然而這是事實嗎？事實是，日皇「如果加以過制，則僅有充分機會」，可是「實際上並不加以過制」，反而是「關於戰爭政策的計劃和實行，天皇是常……述說意見的」，並且「准許並承認戰爭政策的實行」的。總之，只有日皇「欲」戰爭，「不希望」加以過制的事實，却沒有「不欲」和「希望」的證據。因其他的戰爭責任者的被放逐與受審而成了問題的日皇的戰爭責任，不應是政治的或道義的責任，而應是法律上的責任；沒有事實證明的「也許」，應不是「法律的公理」所容許的。據筆者想，他的所以作此曲筆，也許正是他不提日皇應視為戰犯，而只主張他退位的理由吧？

他在第三節「所謂天皇不可侵犯論」中，從下面的兩點論述「天皇神聖不可侵犯，不負一切責任」的主張為「不可容許的時代錯誤」。第一，他說：「這主張不過是神權理論和封建思想的產物。……在二十世紀的民主主義之下，這說法完全錯誤。」第二，他說：「關於侵略戰爭的責任，世界已經不承認元首的不可侵犯。」並且他引證第一次大戰時的德皇被協約國追究「違反國際道義，玷污條約神聖的重大罪行」的責任；第二次大戰中對德國不問其為國家元首與否，只要是侵略戰爭的責任者，均視為戰犯；以及義大利國王不但不退位，連君主制也被廢止等事，作為證明。關於這些話的本身，筆者認為說得很堂皇，可是問題不在這些話本身，却在由這些話所應導致的結論。因為既然承認日皇在二十世紀的民主主義之下是人而非神，沒有理由受到「不可侵犯」的權利，那末為什麼不主張把他當作犯罪的人看待，有如被放逐及被審訊的人那樣？這事多少總還證明着日皇還保留着一部分的「不可侵犯」的「權利」。至少足以證明，認為日皇不能和其他一般日本人同樣看待。這不是在「神權理論和封建思想的產物」現在已到必須予以清算的「二十世紀的民主主義之下」所應有的觀念。並且既然說在侵略戰爭的責任面前不容許國家元首不可侵犯一事存在，而日皇在此次侵略戰爭中應負的責任決不下於第一次大戰時的德皇和此次大戰中的希特勒，為什麼不主張日皇也應和德皇與希特勒一樣被指為戰犯？即使在侵略戰爭責任上，和日皇相較則輕重懸殊的義大利國王，（義大利的侵略戰爭的事實上的最高責任者應是墨索里尼吧），也不但退位而且根本取消了君主制的，那末，橫田氏為什麼不主張根本取消日本的天皇制，而僅主張日皇的退位？

他在第四節「為了新日本的建設」中說：「天皇的退位，不僅為了對過去負責任，也是為了新日本建設。」理由是：新日本必須再建為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國家」之故。誠如橫田所說：「從和平主義來看，必須清算直到如今為止的絕端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因之，迄今為止的軍國的帝國主義最高代表者的退位，與其說是當然，不如說是必然。」並且，「從民主主義來看：明責任，重責任，實在是民主政治的關鍵。果真是如此，那麼在建設新民主國家之際，究明把日本國家和國民陷於今日苦境的重大責任，就一定是最切要的步驟了。」但是我人認為日本軍國的帝國主義的最高代表者，只要是我人認為日本軍國的帝國主義的最高代表者，也是會存在一日的，因此，如果僅僅以裕仁的退位了事而不使所有一切未來的裕仁統統退位，即天皇制的根本廢止，則和平主義的新日本的出現還是不可

論的。所以為建設和平主義的新日本起見，「當然」和「必然」的，不僅在日皇個人的退位，而在整個天皇制的廢除。即使從「實是在民主政治的關鑰」所在的「明責任重責任」的觀點說，為了建設民主主義的新日本起見，也不能僅以日皇的退位為已足。因為日皇既然負有「把日本國家和國民陷於今日苦境的重大責任」，而且這責任有如橫田所說是屬於「最高的」，則站在民主主義的立場說，無論如何不應較戰後日本的被放逐者及被審判的甲級戰犯，乃至第一次大戰時德皇，第二次大戰時希特勒在內的納粹戰犯等，享有特殊的權利，而僅以「引咎自責」的退位了事。不但如此，把日本國家和國民陷於今日苦境的重大責任者，固然是裕仁，但是在天皇制繼續保存之下，又誰能保證沒有把日本國家和國民陷於「明日」的苦境的「重大責任者」會產生？所以日皇退位了事固不夠，把日皇當作戰犯審判也是不夠，必須把整個天皇制度止才是根除日本的軍國的帝國主義，重設和平民主的新日本的「不可缺的條件」。「不實現這條件而欲實現真正的和平國家和健全的民主政治」，這才「實在是夢想」！

但是，從前面所說的看來，日皇裕仁既是侵略戰的最高責任者，應以戰犯論罪，固不應以退位了事；所有一切的日皇，在天皇制的繼續保存下，都可能是製造戰爭的最高責任者，所以應整個地廢止天皇制，也不應以退位了事。這才是愈趨愈趨的理論；否則，縱令在事實上，像橫田那樣的日本知識階級的代表者並不見得沒有「知的能力」，但終不能叫人相信其為「不流於感情」，「不拘於單純的傳統」。如果僅僅是無意識地主張日皇退位，

還不過證明日本的知識階級也如大多數無自覺的日民衆一樣，對於建設和平民主的新日本所必需的條件猶未有真正透澈的認識而已，證明其精神要更進一步的精神革命而已；還不能視為日本民主化的絕對的障礙。反之，如果他們的作此主張是出於意識的，則隱藏在遺事後面的嚴重性，就更不容我人忽視，那就是他們企圖以「天皇退位」作為達到確保天皇制這目的的手段，使日本人民對天皇的「不幸」增加其同情，從而對天皇的「崇敬」加深一層，這樣，便是有意給日本的保守反動的舊支配階層張目，而在日本民主化這一歷史使命的面前築起一道阻撓的防堤。

四

作為「日本天皇論」的餘論，橫田在第五節「知識階級的立場」中說，知識階級「有知的能力，並有不流於感情，也不拘於單純的傳統，尊重理論，理解理論的能力，而且也不是沒有依照其理論而行動的志向。不過，已往的日本知識階級，這種志向比較薄弱，終於缺乏移轉實行的毅力，因而為軍部所乘，遂致惹起今日的不幸。今後的日本知識階級，必須注重毅力，自己儘以為正當，認為是真

(上接第六頁) 洲的日皇，西里伯斯的 Atoria 人和蘇門答臘的 Batak 人，印尼人可能是印度支那半島最初的居民。雖然很原始樸野，但對於侵入者永遠表現出頑強抵抗，中折的部落法國人承認是最後被他們征服的。

越南的華僑共約四十萬人，大多在南部，主要是在河內，除極少數外，華僑都是商人。所有華僑都可以成為越南公民，許多人已經收了越籍。在游擊隊有相當多的華僑。

在越南王的統治下，從來對少數民族沒有任何壓迫。國王徵稅是每年納實的方式，此外沒有干涉。另一方面，法國對於越南所有民族則加以殘酷征服和無情剝削。因為有各種不同的民族，他們就找到了機會來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每一族部各組軍隊，派來鎮壓他族的越僑。於是派 Moia 人去抵抗 Truong Bo 的農民，利用 Kramer 人去壓平 Nam-Bo 的造反。

在過去兩年中法國勢力重新征服越南，曾企圖用分別成立泰族、苗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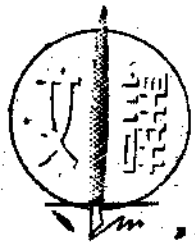
變族約所謂「邦」的辦法，來抵消各少數民族與越南人民的統一及其對胡志明政府的堅決支持，而宣佈設法國有責「保護」這些少數民族。對於法國的阿諛和諾言并無反響。在各不同民族中鼓勵起互相仇恨以及仇恨越盟政府的所有企圖已告失敗。

越盟政府各種族及少數民族的政策，是基於承認一切民族權利平等的原則。所有少數民族都還有代表參加國民大會，各族都已獲得行政自治。現正實施各少數民族的經濟文

化發展廣泛計劃。已在推行改進農業辦法。進行醫藥衛生工作。各種語言文字實施拉丁化，教育中有本族文和越南文。文盲正在迅速肅清。

越盟政府已達成各自由民族的堅強團結，各少數民族的士兵和越南軍隊并肩作戰，粉碎法國帝國主義者的侵奪，并確保自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以來他們所得到的自由和獨立。(九月一日子然寄自越南)

× × ×



巴基斯坦·印度與美國

一個原始的報告

周熾夏

本文述者林第立 (Lindley) 隨美國駐東大西洋及地中海海軍總司令康納立 (Richard L. Conolly) 經行中東各國，作友誼訪問，在後文中，須報告與印度副州新邦——巴基斯坦與印度聯邦——的二位首相問答紀錄，頗饒興趣，原載自九月廿六日新聞週報 (Newsweek) 特譯之以鑒對印度關心之人士。

喀喇蚩——巴基斯坦首都——與巴邦首相李奎阿里汗 (Liaquat Ali Khan) 的會見，是在我們到喀喇蚩的午後他招待我們的一個圓會中舉行，又在兩日後於其官邸中繼續，李奎阿里汗現年五十三，在印度與牛津學法律師，一九三六年回教同盟成立後，即任其納稅費，身材肥胖，在我每次看見他的場合，他總是穿着灰色的裏衣，戶外他老是帶着一頂灰色的蒙古式的帽子，屋內他的光頭老是禿着。

問：六百萬西巴基斯坦的難民是共產主義煽惑的對象嗎？

汗答：他們是回教徒，他們知道共產主義是敵視宗教的。

問：我最近聽說俄國要求在貝爾華 (Peshawar) 近略白要道 (Khyber Pass)，為通往阿富汗要

津(開設大規模的領館，你拒絕這一要求，對嗎？

答：(微笑)：這是真的。

問：此間對巴基斯坦事件甚為激昂，是什麼原因。

其實巴基斯坦離此很遠，巴基斯坦人又非阿拉伯人。

答：這許由于我們相信每一回教人是兄弟。

問：我們聽說巴基斯坦組織回教國家同盟。

答：巴基斯坦是回教國家中人口最多的，他們有很多利益是相同的。回教徒始終不明白為什麼美國要贊助巴基斯坦分治，並承認以色列國，他們覺得如此做法可使俄國得一侵入中東的根據地，此為對回教世界之敵對行為，一旦成事，以色列新國的生存將剝削回教人的利益。我們知道猶太人在世界上是有限的，他們並不需要整個的中東，以作其生存空間，不過我們同時也記得，英國僅以五千人統治印度達一世紀半之久。

問：巴基斯坦為發展其自然財富及新工業，需要政府公債及私人資本，但貴政府最近所宣佈的政策，在若干方面排斥私人資本，並限制外國投資，同時對若干營利事業加以限制。

答：我們現在需要一種為人民所擁護同時能予外國投資家以保證的政策。

問：你是否認為現有的政策是永久的，能使外國資本不再受約束與國家化。

答：三十四年以後的事，沒人敢預料，不論在巴基斯坦、美國或其他國家，我們現在定下一個政策，相信為巴基斯坦之利益打算而能符合全民的要求的，至於國家化問題，實無需畏懼，只限於若干限作公共發展的地區，回教徒是尊重

私有財產的，我們希望美國資本進入巴基斯坦，參與我們所需要的及已有原料的工業的發展。

新德里——與印度總理尼赫魯的會見，是在印度議會尼氏簡單的辦公室中舉行，我們由其私人秘書帶進，儀式較華府尤為相率，尼氏從一不大不小的辦公桌後面立起來，與我們握手，帶我們坐在近窗邊可以望見內庭的安適的沙發上，他穿着簡單的印度裝——狹的長褲，全身穿着貼身衣。

問：是否印度對共黨活種的鎮壓，一方面預示你們政策趨向蘇聯方面，一方面趨向西方的民主？

尼：這些可以由家常的思想來解釋。「當一個國家被打擊時，他必定要反擊的。」我們並不怕宣傳，我們正從事於田地和實業的革新。直到三年前以前，共產黨徒方纔被允許參加國大黨，但我們即將少數他們一併趕出去，他們很嚴厲地批評，但他們的並不是叛徒式的批評。早年前，他們用種種方法來製造混亂，我們在印度就忙著我們自己的問題，力使我們自己的房子(指國家)有一頭緒，因此影響歐洲的問題，却不為我們所關切。

問：但是假如共黨將得到孟買、馬來亞和其餘鄰

印度諸地的接觸權，是否會不即刻牽連到你們呢？

尼：（意味深長地，為他的語氣的開展而注意着）是的，你指的是什麼呢？

問：只有美國的許多人民感覺到印度正嘗試去引導一個介乎蘇聯而非蘇聯民主國家間的中間路線。

尼：一年以前宣布的政策不會影響聯合國的，我們已經嘗試批判每一問題的價值。我們第一注意印度的問題，次之，我們再注意鄰國。舉個例說，我們對於印度尼西亞的自由感到十分的興趣，我們深信荷蘭對維持他的在印尼的法規的不斷嘗試是不會成功的——他們只能引起另外的問題。第三，我們希望世界的和平，我們要避免戰爭。但是如果戰爭要來的話，我們或者不能阻止它，「我承認，印度終究要陷於紛亂。」

問：你是否希望美國幫助你們正在計劃的河床發展？

尼：我們的發展計劃幾乎三十餘種，我們已經有和你們工程師商定的專利，這是專門用以和你們美國之商行訂約的，這些都是多層目的的合作：如食糧統制，力能級數，灌溉事業以及其他。我希望他們能使印度在糧食上自給自足。

問：是否巴勒斯坦的地位問題使你焦慮呢？

尼：是，因為相似的衝突會發生。好像我們要創造一個中間路線的政府一樣，一個印度人被派在聯合國巴勒斯坦調查團中。就一般說，印度人是同情於阿拉伯人的，但是他們並不反對猶太人。他們對猶太人一樣有同情心，認為是歐洲人迫害的罪惡。無論如何，他們有一個感覺就是覺得阿拉伯人像亞細亞人他們不想要用什麼去傷害阿拉伯人，就個人的意見，我很久就覺得巴勒斯坦必定會成功為一個聯邦。

問：什麼原因由你禁止美國欲購買的戰略原料出口呢？（出口物之受限制和禁止的鑛石，如鈾，鎳，鎂，砂，其中都含有鈾，若和鈾連在一起這鑛石能够分裂）

尼：我們正「走向為我們自己保留有價值的鑛物的理想，」我們不需要賣掉屬於國家有利的資源而得一些私人的利益。我們要深信，當我們使這些鑛物出口，必須得回相當價值的物資。因此我們行我們的新政策，所以現在的禁止是暫時的我們有個原子能委員會，我們聽從他的意見。我們要在印度發展原子能。並不是為了造原子彈——這是對我們沒有用的，——而是為了生產的目的。

問：印度獨立後一年，你對他的進步很滿意嗎？

尼：一定不，在我們的年會中，我們已費了許多的唇舌，我們不會有時間做我們要做的事，我們的經濟問題已為我們想避免的發展而增大起來。例如，我們最富饒的一省，旁遮普，已經完全沒有生產。千萬生產者現在都失了業——真是雙重的損失。

問：對於通貨膨脹，你將用多大力量去管制呢？

尼：通貨膨脹是一個大問題，在這次戰後，我們漸漸減去戰時的統制，雖然，特別像食糧和紡織品的統制仍舊繼續着。或者我們的廠去這些統制過於快了一些，所以結果不很滿意，我們重新考慮着這個問題，在一個月以內，我們將有一個決定了。

這短短的綱要不能看出尼赫魯氏的聰慧，敏銳，精神飽滿，和對印度將來的幻想。他使我覺得他是一個驅使他自己向他素所夢想的境界裏跑的人。他表示他對美國的友善，不僅由於這次訪問，更由於這天另外兩件事。他延遲印度國會一小時，俾他和全部議員能够參加國防部長沙達·巴爾特夫。辛夫為柯諾利將軍開的茶會，並在當夜參加了美國代辦何華特·特諾凡為柯諾利將軍設的筵席。

蘇聯的中東政策

Ladislav Farago 著
彬之 譯

去年十一月，聯合國在成功酒開第二屆大會，正在討論巴勒斯坦問題的時候，一個英國的外交官告訴旁邊的新聞記者說：「根據我們所得的情報，蘇聯計劃在中東和蘇彝士運河一帶，有所活動。」其實遠在六十八年以前，帝俄早已注意到中東了。一八七九年，英國首相狄斯賴利（Disraeli）

決定外交政策，轉移目光到中東，那時他在議會中揚言帝俄在中東和中亞的企圖，特別是在波斯，會造成入英帝國的一大威脅。當時這問

題，成爲議會中討論的中心。六十八年來，俄國的擴張主義，好像成爲英國外交政策的魔影。直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東一帶，關於伊朗、伊拉克、埃及和巴勒斯坦，一連串的難題，英國感到有些棘手。最近英美外交界及軍人們，譴責蘇聯在中東的企圖。根據確實的文件，蘇聯軍人想在中東的活動，包括蘇彝士運河和東地中海在內。這一計劃，顯然地有兩重目的，石油和交通，在這兩點來打擊西方民主勢力。分析他們的目的，摧毀英美在中東的石油特權，再切斷他們主要的大陸交通線。

看到那份報告，發現蘇聯把週圍的情形估計錯誤了，致蘇聯的傳統的政策，陷於歧途。就是將那報告放開不讀，過去和現在的許多事，英國因能再加以考慮修正，而能不致陷於不拔的地步。譬如：蘇聯企圖在土耳其和伊朗有一點條約上的根據，於是，莫洛托夫於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柏林表示，若以劃分勢力範圍爲重心，蘇聯是能與德、義、日簽訂四強秘密協約的。這文件由納粹起草的，包括有兩項秘密協議。莫洛托夫帶了草約歸返莫斯科，向史太林請示。至十一月廿五日，德駐蘇大使史修倫堡 (Count von der Schulenburg) 被召進克林姆宮，蘇聯駐德大使鄧克諾索夫 (Dekanzov) 也在場，莫洛托夫有一宗文件交與德大使，這就是蘇聯對中東企圖的要點。現在曉得這文件是由莫洛托夫和鄧克諾索夫會商，並遵照史太林的指示而決定的。

從這可知蘇聯允許參加四強協定，雖是政治合作，而以經濟爲交換條件的。所以他列舉了特殊的四項，並且還說：「今後看來，世界的勢力圈，已由德國外長拘出來了。蘇聯根據區域的原則，要求

修正的，自拔頓 (Batim) 在黑海沿岸) 和巴古 (Baghdad) 在裏海沿岸) 地帶，以迄波斯灣一帶地區。同樣地，和德義秘密協定，對土耳其的達達尼爾海峽和波斯灣羅斯海峽，蘇聯得長期租爲海陸軍根據地。後來土耳其不久加入四強協定，德義蘇尙欲以武力和外交，來進行這一項議定的工作。」

納粹的侵略野心，對於莫洛托夫的要求，最後表示不能接受。從這看來，中東是極東和極西的錯綜地帶，蘇聯企圖在那裏有所行動，不若納粹祇是理想，所以在一九三九年蘇聯和英法的談話中，成了議論的中心了。

蘇聯也覬覦土耳其及伊朗，他們還懷着沙皇時代的擴張政策，他們認爲是古老的、固執的、殘暴的帝俄的合法繼承者，應該繼續完成那開闢波斯灣和韃靼尼爾出海通路的計劃。由於這種傳統的計劃，蘇聯注意到中東的其他部份。一九四一年四月，受納粹支持的伊拉克首相甘倫尼，顛覆了親英的阿海希米政府，建立了他自己的政權，這是蘇聯和德國合作下，所意料不及的。當阿拉伯反抗盟國壓迫而發生叛變時，英美都預料蘇聯會和德國分離，俾在中東有所活動。

事實上，德國的迅速行動，迫使蘇聯在伊拉克冒一次險，當時克林姆宮雖然瘋狂的反對，但有何用呢？德國巴本大使和伊拉克外相克倫，追隨蘇大使維格爾蘭夫至安古拉，竭力游說蘇聯在軍事上及外交上，支持叛亂政府。蘇聯對軍事上的援助是拒絕了，在外交上，克林姆宮可以與甘倫尼 (Rasid Ali Bey Gailani) 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互換使節，蘇聯所以立即承認叛亂政府，這是表示蘇聯在這重要地區，無所企圖。

蘇聯對於中東，有確定的計劃，那是無產的，

不過鼓動革命，而不取軍事行動，顯然是一樣的。蘇聯的估計，歷伏在中東的革命勢力，和一九二〇年巴古會議所決定的，相去不遠了。當時他們認爲除土耳其和波斯外，要選循馬克斯、列寧路線的革命時機還未成熟呢。蘇聯雖冷靜地在旁觀察，但相信對他是有利的。他想現在雖然暫時停止，祇要耐心地等，外交攻勢和軍事上的封鎖，終能贏得極大的效果，把這地區從英美聯合的手中奪過來，有賴於革命，實比軍事更爲有效。蘇聯相信這不是空的希望，他們已進行了許多爭取中東民衆的工作，並且使他們非常滿意。還在煤油帝國中，是無紀錄可查的。目前蘇聯對於當地政府或革命團體，都很冷淡，這是由於條約的限制所致，就是在共黨區域，也並不例外。蘇聯的長期計劃，是依靠共黨秘密組織的活動，這組織龐大得驚人，包括各會社、團體、兄弟會、工會，以及各種原有的組織。這種工作在暗中聯絡支持，使他們傾向於蘇聯，而並無條約的規定。據一九四七年共產黨在倫敦開會的報告，在中東登記的共產黨員有二萬四千四百人，而那裏全部的人口，也不過七千一百萬。但合衆社的估計去年五月間，那裏的共產黨約一萬三千七百人。

我根據共產黨的會員證，選舉報告，印刷品的發行數字，及其他有關的原始數字，在中東活動的共產黨，總在十二萬六千三百人左右，受共黨控制的大企業職工，尚不在內。這一類的人數，在埃及，有四百六十五個工會，會員已超過十五萬人。在伊朗，英伊油公司一家，已有六萬工人，佔工會會員百分之九十五。其他職工團體的會員，統計不下於廿五萬人。

這一個潛伏的政治軍，在那裏掀風作浪。現今在巴勒斯坦，共產黨和準共產黨徒是公開活動的，

在伊朗，社達黨 (Tudeh Party) 由強力的共產黨支持，其他的地區，共產黨被認為非法的，祇能從事於地下活動。表面上，法律阻止了共產主義的勢力，但有人在阿拉伯的村落中，曾發現史太林的畫像。

主要的原因是阿拉伯人的地區，共產黨認定這遼闊的、永久性的、未被確定的 無國家觀念的區域作為他們唯一的目標。漸漸地利用環境，獲取政治上的優勢。伊拉克的共產黨，劇烈的反英派和親德的來喜特 (Ah Reaid) 分離，在埃及，聯絡親英的潘沙 (Nahas Pasha)，來對抗反英的法樂克皇 (King Farouk)，敘利亞原是回教地帶，黎巴嫩的共產黨，保護基督教徒和回教徒作對，引起黎巴嫩的法特實林 (Fuad Qattan) 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三年兩次反抗法國；阿拉伯高級委員會普但里 (Khalil Budeiri)，雖是一個猶太醫師，倒是支持阿拉伯聖聖夫梯的 (Murid)，而巴勒斯坦的共產黨魁富萊漢 (Labib Tuleyan) 公然聯合猶太人來反對墨夫梯。諸如此類的情形，多是產生於領袖人物中，而中東的共產黨領導者，也大部是富有的，可以和中上階級接近。

蘇聯對於這般熱心份子的特殊組織，在中東一帶活動，其情勢是實勝於量。事實上，共產黨在中東的活動，已收到極大的效果；更由於領導人員之努力，尚在繼續發展中，在中東的共產黨領袖，互相瞭解合作，在政治上、財政上、沒有貪污腐化的行為，充分顯示其完整與統一。一個共產黨徒若被任為某一區的領導者，必在四十七歲以上；終身在中東從事於共產主義的滲透工作；這許多領導人員聯合起來，成為極龐大的力量。在莫斯科的計劃下，他們受外事委員會的波蘭頓 (Bolton) 小組的指

導。他們的生活，在貧缺的環境下，既得不到充分的營養，又沒有必需的醫藥衛生設備，還有受苛捐雜稅的壓迫。

一九四六年四月，當伊朗在動盪不定的局面下，蘇聯決定了現有的政策，煽動自發性的革命，比武力支持更來得有效。這方案，巴立欽保 (Polits Eo) 經過了整個夏秋兩季的商討，直到十一月，才決定下來。蘇聯高級官員據於沙皇時代的傳統觀念，一面對德，一面對華的舊式的軍事政策。這舊的計劃完全未變，而再加上了現代軍事認識的成分。

從最近的蘇聯文件中，可看出他們對中東的新軍事計劃。例如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巴勒斯坦的密令，說：「那裏接連蘇聯士運河，是世界交通的總樞紐，歐洲資本主義經營亞、非兩洲殖民地的鎖鑰。……巴勒斯坦位於近東的中心，是帝國主義統治阿拉伯諸國的根基地。英國軍事家進攻的戰略，和英美獨霸的石油事業密切地關聯。」中東問題專家梅耶夫 (Vasili Mayev) 響應這一宗文件，他說：「英國政府是以巴勒斯坦及伊拉克為軍事據點，來保護蘇聯士運河，及阿拉伯地區。」

蘇聯對中東的政策，雖是基於軍事的和政治的，但沒有領土野心，不過不願讓巴勒斯坦及其他中東諸國，轉移於排外者的手中。蘇聯對中東的政策，在困難中決定了，並且在最近一期「軍事思想」譯載披露。

英蘇在中東的對峙，引起極大的反感。最近英國國防大臣亞力山大 (A. V. Alexander) 外相貝文、秘書梅修 (Maj Christopher Paget Mayhaw)，先後發表劇烈的言論，英國要繼續統治那

一地區，作為今後中東政策的重心。英國決定的政策雖不甚清楚，但克林姆官中覺得和蘇聯政策有極明顯的差異。在一九四三年的秋天，巴立欽保會將大批有關埃及、伊拉克、伊朗和巴勒斯坦的資料，送交梅斯基手 (Majsky)；據梅斯基報告，這就是決定中東政策的根據。

梅斯基以蘇聯代表團團長的資格，繼續蘇聯外交訪問團之後，赴中東視察政治、經濟、社會及軍事情形，特別注意於巴勒斯坦。一九四五年五月，駐開羅蘇聯公使領一等秘書蘇爾登諾夫 (Sulden Rahman Sultanov)，為了特種任務，也在巴勒斯坦就擱過一個時期。就在那時候，由克拉沙夫中校 (Karasyov) 率領的蘇聯軍事訪問團也在那裏。一九四六年五月，由於阿拉伯高級委員會的邀請，一羣蘇聯人，在彼得林國 (Petersko) 的率領下，又到了巴勒斯坦。

在梅斯基提出了報告之後，蘇聯人在中東就廣泛的活動。其主要的：(一) 研究人權上、宗教上和蘇聯的關係，作為宣傳的資料；(二) 不論左傾或右傾的政治團體，同情他們對西方各國爭取獨立運動；(三) 直接或間接地宣傳蘇聯的優點；(四) 直接干涉伊朗的革命。

梅斯基再建議蘇聯應做的特殊工作：(一) 建立和埃及的外交關係，任命亞洲問題專家羅維柯夫 (Nikolai U. Novakov) 和蘇聯登諾夫為開羅公使。(二) 承認敘利亞及黎巴嫩兩共和國，組織但美克斯 (Damascus) 和巴格特 (Beirut) 訪問團，由中東問題專家羅特主持 (Daniel Solod)。(三) 請希臘正教主教亞歷克杜斯 (Alexandros III) 來莫斯科觀光，並由全俄主教亞力開伊赴塞巴和敘利亞答訪；(四) 請阿勃拉漢 (Abdur Karekini Abrahamian) 作短期進行，他以伊力文

大學 (Erivan University) 院長，和阿米尼亞 (Armenian) 宗教會議秘書長的雙重資格，拉維維利亞和黎巴嫩的二十萬阿米尼亞人；(五) 在德黑蘭大使館成立一特別機構，專門處理關於中東的事務，由外次開夫塔拉齊 (Sergel J. Kavranze) 主持之；(六) 和阿拉伯高級委員會前主席梯海辛尼 (Jamal Al-Husseini) 成立密約，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共黨支持，發動內亂；(七) 建立共黨團體的新觀念，在中東，以民族解放運動來鼓動武裝叛亂，是最適當的；(八) 幫助共黨滲入各工會組織，特別於伊朗、黎巴嫩和埃及，以發動嚴重政治性的罷工。最大的，是一九四六年夏天英伊油公司五萬工人的大罷工；(九) 組織許多前進的團體，若黎巴嫩的蘇聯之友社，伊拉克的反分治聯盟等；(十) 遣送數千阿米尼亞人返國，並任命賈路德 (Beirut) 公使館的一等秘書，展開那裏的工作；(十一) 保護由伊拉克、伊朗、巴勒斯坦進入蘇聯邊境的革命黨人，雖然他們不是共產份子；(十二) 組織考察團，考察並輔導中東共產黨的活動。

克林姆官看到中東情形的複雜性，於是決定了一個新方案。那新方案包括兩部份，中央一個固定的核心，週圍環繞着許許多小的活動，那核心就是猶太民族運動。這新方案的進行，祇有彭霍林 (Pinhu Ben-Horin) 完全明白。他是蘇聯著名的政論家，是唯一研究猶太問題的人，一九二一年起，在巴勒斯坦辦報。彭霍林關於蘇聯對猶太民族主義的看法，說是：「猶太民族主義，在蘇聯是禁談的；在蘇聯革命期間，猶太復國運動鬧得很劇烈，但在蘇聯文學作品和宣傳文字中，祇認爲是大英帝國的一名隨從罷了。」

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蘇聯政府發動了一個嚴

密及殘酷的反對猶太民族運動，密令高等教育處的各機關，派出了大批宣傳人員，供應一切有關巴勒斯坦的官方資料，內容儘是罵猶太民族運動的。中間會有一段說：「猶太民族運動者自己認爲是猶太人的代表，其實他們的理想、政治理論、行動方式都是反民主的，他們和大多數的猶太人是疏遠的對的。……他們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他們統治的國家，數世紀來，結合從各地來的人，而一方面奴役當地的土人。」史太林曾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是反烏托邦的，這許多來自各地沒有國籍，而不能代表任何一國的僑民而已。

當然蘇聯是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來反抗猶太人的。這政策的執行，由蘇聯共產黨同盟猶太小組葉夫斯萊耶 (Yevseyev) 主持。這反猶太運動，無疑會遭全世界猶太人的反感；但蘇聯相信猶太人中，大都帶有布爾喬亞氣息，很少是真正的勞動階級，所以很難把他們組織起來，而加以共產化的。

蘇聯政策的轉變，很可以看出他的來歷去跡。一九四七年三月，巴立錄保會指示蘇聯駐莫斯科的領事康加洛夫 (Victor Kungalov) 起程了，到五月，康加洛夫 (Victor Kungalov) 起程了。表面上，康加洛夫是調查過去阿拉伯人的反猶太及民族運動。但康加洛夫和阿拉伯高級委員會會談以後，阿海辛尼於五月七日洩漏了秘密，那是克林姆官允許借給阿拉伯人大量的物資，支持反抗猶太人行動。

這新趨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開始的。在德黑蘭會議時，史太林對猶太建國，尙無反對的表示。第一次表示這傾向是在一九四五年。當世界勞工會議在倫敦開會時，蘇聯代表還表示讚同猶太復

國計劃。到十一月底，蘇聯正式提出，這一國家，應該由五強先來做準備工作。

以後的發展是怎樣呢？首先，史太林對政策的轉變，發表兩點理由：猶太人受盡納粹的壓迫，十分表示同情，但他們因此而產生感情的行動，此其一；承認猶太民族是可以解決一部份的政治糾紛，但剩餘的猶太人仍會起而反對的。一九四六年史太林和巴立錄保決定了新政策之後，改變了對中東歷史的觀念，當然那新政策是指整個的中東，不僅是巴勒斯坦一個，一九四七年五月，史太林和貝文諾密會談，將這事證實了。

當埃及把反對英國一案提交聯合國的前夕，突然有人來訪貝文，後來才知蘇聯急切地要討論中東問題，特別是關於埃及的，這是克林姆官通知他的外交秘書的。這位來的蘇聯代表對貝文說，蘇聯對中東，並非和英國競爭，過去英國經營中東，並不直接影響蘇聯。蘇聯能保證和埃及的關係是很確定的，但貝文是始終懷疑蘇聯這一種保證。

一九四七年四月，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蘇聯並不驚異；但巴勒斯坦的共產黨仍堅持過去莫斯科的立場直到四月三十日和五月七日，阿拉伯代表在成功湖宣布，據確實的消息，蘇聯準備以否決權來對付建立猶太國。這事顯然和蘇聯首席代表格羅米柯有關，當廿七日特別大會開會的前夕，蘇聯各邦代表紛紛前去訪他，以其關於巴勒斯坦問題有所指示。當他沒有得到莫斯科訓令前，他表示蘇聯不必表示任何意見。到五月七日、十二日，莫斯科的指示到達後，格羅米柯乃於十三日發表談話，說：「統一和分化，蘇聯都沒有意見；但覺得這一計劃，不但不够真實，反促成阿猶兩族的分離。」

格羅米柯的提議，是配合蘇聯的中東政策，增

強蘇聯在中東的勢力，和英國所支持的阿拉伯相結合。雖然各領袖的競爭連綿，共產主義不能在穩定的中東，激起革命的浪，也不能改變他們西傾的思

想。蘇聯雖不願藉武力以攫取那裏的管轄權，但繼承英美的希望並沒有消滅。許多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軍事問題，把這廣大的地區，成為東西

兩大勢力的鬥智場，雙方都向著那一目標在進行着。(譯自聯合國世界八月號)

南暹羅的風雲

Barbara Whittingham Jones
正明 譯

南暹羅的馬來族邦，為反對已由暹羅政府最近使之嚴酷化起來的新的恐怖政權，向聯合國組織提出呼籲一事，已使對近代學者們以「馬來人浪漫史的小仙境與馬來亞最著名王國」著稱的，這個馬來人的巴塔尼 (Patani) 州邦——再度成為一件活生生的國際爭端了。在聯合國組織已經接到的一連串海底電報中間，巴塔尼的代表們正在要求安全理事會立即調查暹羅「法西斯方式」的行政管理，而且舉行由國際監督的人民投票，來決定此一馬來州邦的未來政府形式。他們已向同道的回教各國如巴基斯坦、阿拉伯同盟諸聯邦與印度西亞共和國，以及印度及緬甸，提出要求援助的呼籲，而就這樣將這個爭端逼成爲公開事件了。

自巴塔尼於一八三二年被暹羅併吞以來，她那回教——馬來居民即滋長起了一種反對此項強迫併入說泰族 (Thai) 語信仰佛教的暹羅中去的潛伏的憤怒。暹羅一百多年以來，始終想要同化巴塔尼的馬來人並使他們忘却本國，但永遠未獲成功。於是隨之而來的就是一連串均遭失敗的起義，而且雖然每一次的企圖，均曾受到盤谷方面嚴酷報復手段的懲罰，但巴塔尼從未停止希望以及盡力奮鬥，從外國統治下解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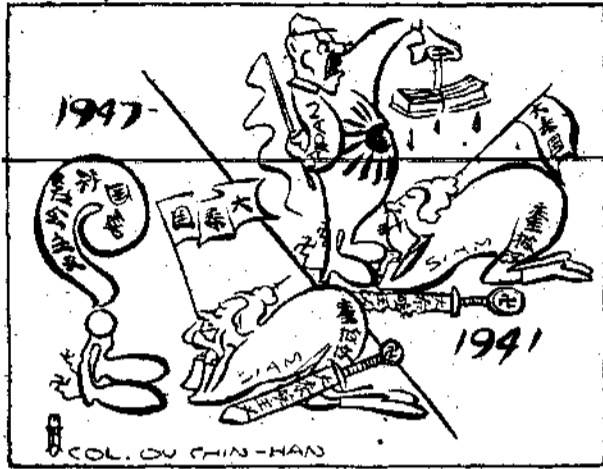
常堅固，而且因爲巴塔尼與外邊世界完全隔離，所以他們反抗那恐怖統治簡直是毫無幫助的。在暹羅人的「鐵幕」後面，對於既存政權的最溫和的批評，他被列爲是「危險論調」，而用死或嚇詐手段鎮壓下去。巴塔尼的馬來人沒有言論或集會自由，沒有報紙，無線電收音機很少，而且也沒有政治團體。在記者訪問該地時，他們表白情緒與社會生活的唯一機關就是回教寺院，而且能被允許存在的唯一領袖們都是哈吉們 (Hajis)，參拜過麥加的回教徒 (Haji Saibong) 被捕以後，甚至連這一處最後的出路也給封閉了，從巴塔尼偷偷走漏出來的最近消息，列舉自今年初以來被暹羅警察殺死的人已有五十五個，被焚的房屋有三十五幢，而被劫的房屋則有八十九所。蘇朗哈吉現在已以叛逆及煽動分裂運動的罪名被起訴，大概因爲怕懼反暹羅人的示威遊行，所以審判未在巴塔尼舉行，而是在暹羅城市納康史列查馬勒茄 (Nakhon Sittamarat) 舉行的。

但最厲害而因此也就是最使他們憤怒的迫害形式，却是禁止馬來教育的禁令。在暹羅的教育法下，初級小學一律只准教暹羅語文，所以馬來的與中國的初級小學概受禁止，雖然在補習學校內，每星期限定少許鐘點，可以教授第二種語文。因爲馬來人拒絕將他們的兒童送到暹羅的「政府」學校中去，以及他們自願忍受此種教育饑餓之苦，也就妨礙了他們全部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我在最近這次訪問期內，一路上所看到的馬來學校，全都關上大門而且闕無一人，并且自一月份以來，甚至連那專教可蘭經的純粹以色列學校，也已均遭封閉了。

另一樁主要的公平事件，就是馬來人——回教徒結婚與承繼律的公佈，它實際的意義就是必須實行一夫一妻制，而財產則不能按照回教律由死者全部子女共同分派，只能遺給死者第一次結婚所生的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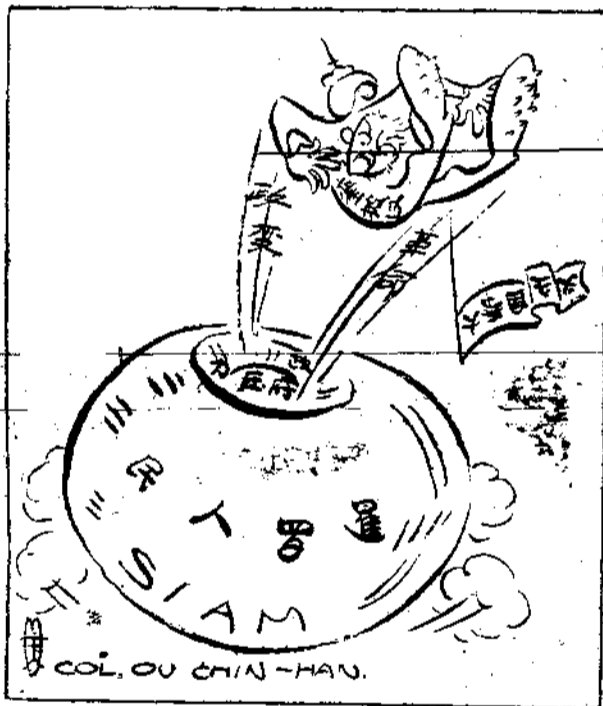
最近有幾隊瓜代的暹羅援軍開抵巴塔尼，擴大了「大巴塔尼」駐防軍的隊伍，這就暗示出當地有大規模暴動的可能性。隨之而起的就是馬來游擊隊與暹羅警察間的衝突驟形增加，暹羅警察仍在進行無數次的逮捕事情。巴塔尼難民紛紛擁入揆達 (Kedah) 與克蘭坦 (Kantana)，馬來亞的一個北部聯邦。現在在揆達的巴塔尼領袖之一埃姆蘭哈吉 (Haji Embong) 最近據料如果暹羅當局不過止他們對馬來人的「宗教迫害」，必將有一次「攤牌」的事件發生。

在近代的地圖上，巴塔尼這個名字其所指就只是一條河流，一帶地帶，一個市鎮以及大約檳榔嶼島一半大小的一個小省。可是當十四世紀末麻刺甲 (Malacca) 王國建立前，巴塔尼幅員最大的時候



作漢錦區 夢舊溫重

作漢錦區 反必極物



事煩麻件一了添又



頁之畫漫



作漢錦區 併吞的彈炸

作漢錦區 哀悲的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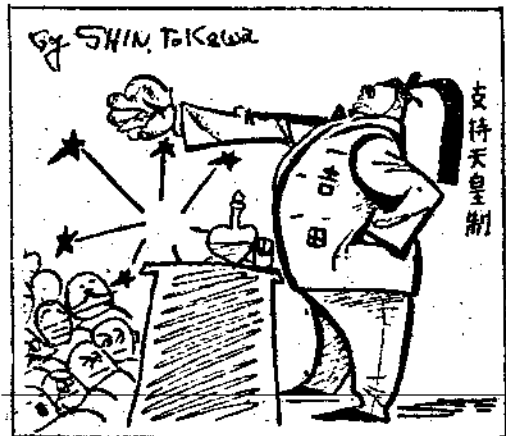
(聞新賣讀，京東)音播的怪奇的場立種種



高勢攻動勞在爲以家大(黨會社)
不想，話說面方者動勞在站會，時之漲
。堤波防的勢攻亂勞對是竟到
(論評由自，京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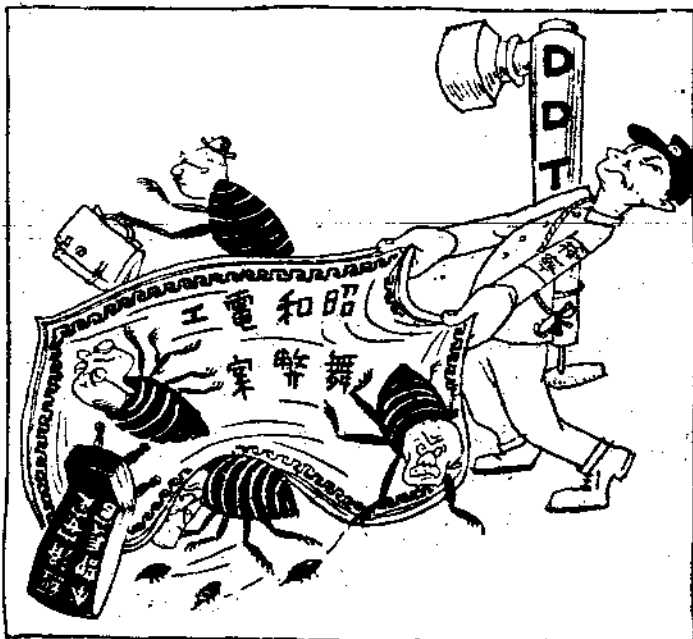


(聞新賣讀，京東) 李行下放不決



「主民」麼什說(黨由自主民)
。富適最「黨制帝」稱是還，「由自

。了現出都蟲臭，子氈開揭



地落機，小最的生早最(黨產共)
可方地種還在就，快別特的長却的久不
。性殊特的本日到看

人物

真納——巴基斯坦的靈魂

蔡金聲



真納

印度的宣告「獨立」，距今不過一年又一個多月，但却喪失了兩位要人，前次甘地遇刺，到了九月十日深夜，巴基斯坦總督——真納，又告病逝，無疑的，這是東南亞的一件重大事件。

真納 (Mahomed Ali Jinnah)，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誕生於印度西北最大港市喀拉蚩，他的父親真納·彭伽，是一位經營樹膠和牛皮的富商。「真納」一詞的原意是「瘦子」，這對於體重一百二十磅以下的真納倒是名符其實的。

真納從小在奢侈生活中長大，家庭對他非常溺愛，在孟買和喀拉蚩讀完中學後，這個穿著令人發笑的黃色長服，瘦長的孩子，就到英國去留學，在林肯法學院攻讀法律，四年畢業後，因為他的父親在商業上遭受失敗，無意在英深造，乃回到孟買，於一八九六年開始執行律師事務。一九〇六年入孟買高等法院服務，三年之後，訴訟勝利，金錢大量湧進，真納又重新恢復過去舒服的日子。

一九一〇年，孟買回教徒選舉三十四歲的真納為印度中央立法會議的議員，這時他已漸露頭角。接著他再回到英國去，一九一三年在倫敦參加了回教聯盟，但仍和國民

大會黨份子接近。在第一次大戰期中，他很明顯地從事印回團結的工作，他的口號是「自由聯合的印度」。大戰以後，甘地地方從南非返印，真納却反對甘地的「不合作運動」，他以為在政治活動中提高宗教情緒，對印度尤其對回教徒是特別不利的，到了一九二一年終於為這一點矛盾，和國民大會正式脫離。自一九二四年起真納就採取極端回教觀點。

真納之所以能「統一使者」一變而為「分治信徒」，這和回教徒最近在印度社會地位之昇高有關，自從英國在印度鞏固了它的地位以來，印度社會的學者，專門職業者，大商人和印度政府的次級人員多是印度教徒，直到最近幾年為止，無論在商業、文化、和政治上，回教徒總是處於弱小和被動的地位，他們多數是小農民和小店主。而印度教的婆羅門却是印度的知識階級，可是除了宗教和社會地位外，回教徒和印度教徒在人種上和言語上並沒有什麼不同。直到一九四〇年以前，很多印度人都在夢想設法調和二者的歧異而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印度來，可是要把這年深日久的鴻溝填補完滿，却不是一件易事。真納提倡印回分治，恰似快刀斬亂麻，至少在一萬萬的回教徒看來，能獨立而免處在二萬五千萬印度教徒的下風，終是值得的。

自與國民大會分裂後，真納曾赴英多年，與日後政治上的對手——克里浦斯爵士等都有接觸。他在一九二八年返印。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國民大會在省選舉中，獲得大勝利以後，他同回教徒攻擊印度人壟斷政府。一九三七年各省立法會議中為回教選民保留的四八五個代表中，回教聯盟僅得到一〇八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國民大會代表為反對參戰而退出各省，是同教聯盟的一大轉機。

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廿三日的拉合爾大會上，真納第一次公開他的「巴基斯坦」計劃，所謂「巴基斯坦」(Pakistan)原意為「精神之國」，而提倡者則指出它的實際意義包含：旁遮普省的P，西北邊省俗名阿富汗省的A，克什米爾的K，信德省的S，和俾路支斯坦的TAN，合成為PAKISTAN，企圖結合這些地方建立回教國家。自從這一顆政治性的炸彈拋出以後，印度獨立和統一問題，就愈趨複雜了。

一部份印度人認為真納之所以改變了他原來的政治主張，是受了他的美麗的愛妻死了的影響。原來真納結婚的時候，已四十二歲，而夫人却是一位十八歲的美貌少女，她是一個熱烈的獨立運動工作者，那時的真納和她是感情投合。不幸的是她和真納結婚後，只生下一個女兒，隨即去世。從此以後，真納就失掉了對於國家主義和獨立運動的熱誠，變成一個古怪和孤獨的人。一位印度女詩人奈都夫人說過：「在真納的心靈上，只能發現很少的熱情了」。她形容真納，說他一絲不苟，難於取悅，而且有點像遺世獨立，舉止傲慢。

後來，真納的唯一女兒，又因為同一位富有的基督教徒結婚，改奉基督教，真納也同她斷絕了父女關係。所以真納晚年，只與其妹同居一處，晚境是頗為寂寞的。

真納是一位奇怪的人物，冷酷、嚴肅、聰明、能幹而又孤獨。他有著超人的自負，意外的驕矜，目空一切，自己的意見就是真理，而且固執到底，決不接受他人的勸告，批評，當然他是不肯向誰妥協的，愈老而愈頑固。「巴基斯坦」的正式建國，正好說明了他的倔強的性格與剛毅的力量。無論如何，真納之死，對於新生的「巴基斯坦」國，確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他現生安臥泥土，已不是巴基斯坦形式上的領袖，而成為巴基斯坦人民敬重的靈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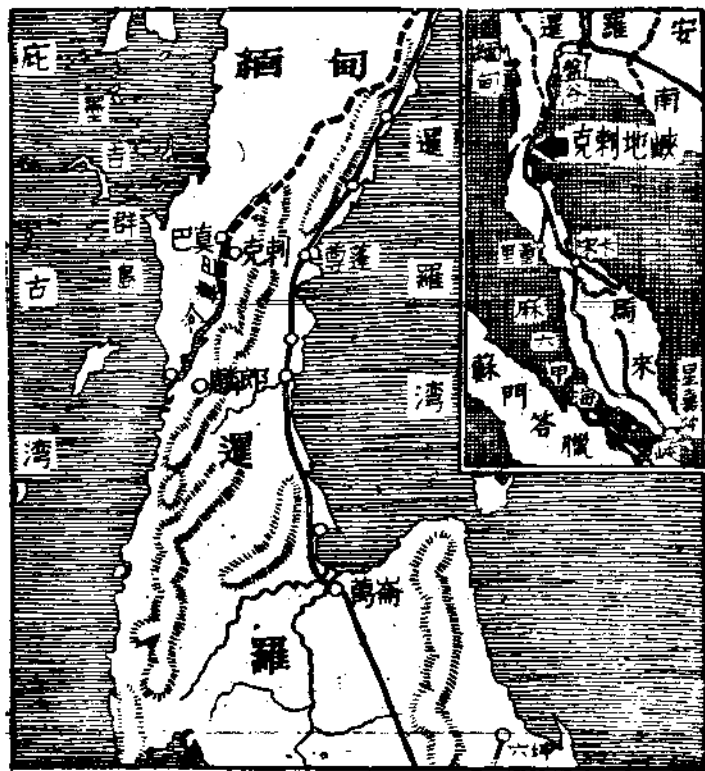
克 刺 地 岬

張 禮 千

十五年前，日人開鑿克刺運河 (Kra Canal) 按前字係暹語，解為蓋印於文書上，由是得轉訓為文書或證書等) 的傳說。風靡全世，致使英人休目驚心，嚴密戒備，因為這條運河如果成功，那末新嘉坡便變成廢地了。目前東南亞的局勢，尚在動盪變遷中，變到如何程度，我不敢預說。而這裏的舊夢重溫，是仍有其可能性的，爰就所知，簡述克刺的史地，藉供讀者參考。

在唐朝賈耽所撰的從廣州到印度的海路行程中，誌有箇羅一名，西方學者，考證其地或為吉打 (Kedah)，或為位於約北緯八度的 Kora (係一微不足道之小村，已不見於一般地圖中)，就對音言，應係 Kō 無疑。據新唐書卷二二二下所載，謂箇羅國有州二十四，每戰以百象為一隊，一象百人，具見該國當時的強盛。數年前我曾嘗有一種主張，謂唐代或唐前的中印交通，不一定繞行馬來半島，尤以馬六甲海峽內海盜橫行的時候為然，若多一次登岸下船，取克刺地岬的陸道行，並可縮短行程約一千公里。而當時所取的陸道，大致有下列幾種：一為克刺至尊達 (Chumphon)，二為董里 (Trang) 至萬崙 (Bandon)，三為太古巴 (Takuba) 至萬崙，四為董里至六坤，五為董里至佛頭廊 (Patalung) 六為吉打至宋卡。其中最短的一條，便是第一線，相距僅二十四英里，此項路線詳載於史密斯著「暹羅五年」一書第二冊中 (Five Years in Siam

係 H. Warrington Smyth 所著，出版於一八九八年) 讀者可以參考。據該書五二面所載，謂所有橫越馬來半島的道路，和緬甸的丹那塞令相毗連者，其中最著名的一路，就是克刺至尊達。著者於一八九六年六月初，離麟郎 (Ranong) 後曾至克刺，該地係一不重要的市鎮，通稱巴真 (Pakchan 此字解為檳榔林，在克刺略北)，有河同名，河長約五十英里，吃水九呎的船可以航行。如果把河口西岸及其上游遊淺後，那末遠洋巨輪也可駛入，這是一條偉大美麗的港口，其中三十英里長的一段，闊有二至三英里。所以事實上，巴真河並非河，可算是一個海灣，從巴真河的唯支流茉莉芬河 (Malivan，此河在緬境) 口以北，則有淺沙，如能加深，巨船可達克刺。據衛爾斯 (N. G. O. Wales) 言。克刺地岬固狹，但不能為古代移民的通道，因為地岬兩岸無合宜的避風泊船所，又無平地可資耕種糧食 (請參閱其所著 Towards Angkor 一書，一九三七年版)，試將此說和上文比對，衛氏所言並無充分理由，至為明顯。余更可以一事為證，上述之麟郎，為暹南產錫之區，其地西濱海，位巴真河口，與北隔河口相對的，為緬屬之維多利亞角，其地為我僑許泗漳所開闢，許氏係漳州龍溪人，一七三六年



年二十五南渡入暹，初至暹雅 (Phananga) 經南，一八四五年始仕麟郎，開草萊，披荆棘，乃日漸繁盛，治其地凡三十七年，居民增至七千，遂為南暹重要市鎮之一。許氏因受暹政府晉封為侯爵 (請參閱南洋雜誌一卷七期，許雲樵著麟郎掌故一文)，當史密斯旅遊至麟郎時，尚與其第六子心美 (Sinh) 相見也。麟郎之重要可知，由此循巴真河北上可抵克刺拾舟向東陸行即達尊達，登舟入暹羅灣可至越南和中國。所以我認定這一條路，是古代中

段交通的孔道之一。到了近代，日本人要運此道以開鑿運河，自有歷史上根據的，我們應該注意。

雲南的山系，經過暹羅和緬東後，伸展到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和爪哇後，又再聳峙。從怒江口起到吉打的一段陸地中，其間有不少隘道，但可能開鑿運河的，只有克刺一處。在克刺以北四十英里的山，其高度達二千二百呎，當受季候風影響而成乾濕季時，克刺地區易遭瘴疾，從五月至十月為雨季，此時克刺的雨量可到一六五英寸以上，其餘的時候雨量稀少。形成克刺地帶的如此狹隘，實由於巴真河口的廣泛，該河流入印度洋，精確言之，流入安達曼海。這河是由山間的溪流而成，發源於克刺以北三十英里，當二月至四月最熱的期間，巴真河可成乾涸。但一到雨季，且在漲潮的時候，則該河蔚為大觀，從河口到克刺，一望無垠，在乾季和低潮時，河闊減成三十呎，深亦不過三呎而已。在克刺以南的數英里，河甚迂曲，迫到茉莉芬河的河口時，河口多石荖暗礁，致水流湍激，不易航行。還有一特別之點，在漲潮時，靠緬甸一面的水，高可達二十五呎，是靠半島邊羅一面的水，高僅三呎，這與我國瓊州海峽的情形，頗為相似。據專家

論調，在克刺開鑿運河，應比開鑿巴拿馬運河為易，可是淺濶沖積淤泥，則多困難。

一八六四年雨季的時候，斐吉上校 (Fyche) 為英暹劃界問題，換言之，就是緬暹劃界問題，曾坐了輪船，溯巴真河親至克刺。但據近年的報告，祇有土人的獨木舟才可航行，從印度洋的深水區到暹羅海岸的深水區，其間有六十五英里的距離是淺水，沿巴真河而上，則由維多利亞至克刺，有十六英里的淺水，自克刺直線行到暹羅海岸最近的一點，則有十九英里淺水，這是開鑿運河時必須注意的。還有，從克刺到暹羅灣的陸路，現在確實知道的最短距離，是二十四英里，此中計有兩條路線，一為從克刺到沙維灣 (Sawi) 可稱南線，一為從克刺到登羅灣，可稱北線，在登羅灣有一短流，名泰陽河 (Talyang)，河口設有燈塔，以為航行目標，其對面便是登羅火車站 (即由曼谷通至新嘉坡的鐵道)。日後開鑿運河最可能的地方，就是這條北線，約在一八四三年的時候，有一英國工程師曾估計過，他說要開鑿一條闊一百英尺的運河，那末從克刺起，到暹羅沿岸的深水區止，並將此線併入，要浚去的泥土，一共有十二萬萬立方碼，而巴真

河的疏導，尚不在其內。所以工程是相當浩大的。總之，建造克刺運河，是有種種困難，但終有一天可以成功。其比較方便易行的辦法，就是疏浚泰陽河巴真河，俾溝通聯繫，那末這運河便完成了。不過時間方面，或許要比開鑿巴拿馬運河長久些罷了。我想將來這條運河開成以後，不但在戰略上要起重大的變化，就是對東南亞間的經濟關係，甚至對遠東和西方間的經濟關係，也一定會受到嚴重的影響，所以我將忽略已久的問題，願此提出，以促讀者注意。

附註：本文寫作時，參考下列四書：

- 1. H. Warrington Smyth 著 Five Years in Siam, 一八九八年出版，共上下兩冊，此書為研究暹羅地理的古典著作，附有詳細的分區地圖九幅
- 2. H. G. Quarter Wales 著 Towards Angkor 1 九三七年出版。
- 3. John LeRoy Christian 編 Modern Burma 1 九四二年出版。
- 4. Virginia Thompson 編 Thailand, 一九四一年出版。

堪察加半島 (Kamchatka Penai)

黃君曉

自然環境

從亞洲大陸的東北角，向西南深深地插進太平洋，並且由它分開白令海與鄂霍次克海的堪察加半島，南北長一千二百浬，東西寬四五〇浬，其總面積約有二十七萬平方浬，日本的九州和本州加到一塊也沒有它大。

半島內部的地理，雖然微小部份尙待查明，然而，就地形的概況說起來，它有一條平行山脈縱貫半島，把全島繪成兩幅不同的風景。瀾羅鄂霍次克海為沼澤性的低地地帶，此低地的兩側與高山 (近于半島之脊) 之間，概為綿延不斷的「香斗勒」性的高臺地，海拔六〇〇米——八〇〇米；與此相

隣全島西邊的山脈，為高達三〇〇〇米的山岳地，由片岩、花崗岩及閃長岩而成，且遍地有遺出的岩漿，它與隔堪察加河谷對峙的東側山脈，在構造上相聯繫。再者，西山脈連東的全地地帶，特別是阿留申羣島 Aleutian Is. 指向此處南邊的部份，呈現著極著名的火山性山脈，現在，除了繼續活動的十七

座火山外，其他比較新的休火山（亦叫間歇火山）也有數十座之多。其中要以克魯齊烏斯加亞 Klyuchevskaya（高四九二〇米）、娃卡 Avacha（三五一二米）、克瑞亞卡 Koriaka（三四六二米）沃留欽斯卡亞 Wiluchinskaya（三三三二米）等為最著名；特別是克魯齊烏斯加亞，恐怕是歐亞大陸上最高的活火山吧。至于半島的雪線，因為氣候寒冷，頗為低下——北緯五十六度左近，海拔一五〇〇米至一七〇〇米——這些活火山以及死火山，幾乎有三分之二為「萬年雪」所籠罩，克魯齊烏斯加亞山和其他的幾個火山，甚至還懸着巨大壯麗的冰河；又因具有這些火山的關係，泥火山、溫泉幾乎到處都有。

從緯度上說，堪察加半島在北緯六十度與五十一度之間，其坐標點與歐亞大陸他端的英倫三島的位置相類似，但是，後者的氣候，顯然地受到墨西哥暖流與從大西洋吹來和煦的偏西風的恩賜；而此地則不然，因為流經沿岸的寒流與季節風的影響，在短暫的夏季，形成了溫度相當高的大陸性氣候，然而在其他季節，氣溫極低，冷得可怕；但，若與白令半島以及西伯利亞大陸很多地域比較，此半島南端海洋環抱的地方頗為溫和。在彼得羅巴夫羅夫斯克實際觀察的結果平均溫度是：二月為零下〇·二度，八月為零下一六·七度。一年的平均溫度為二·一度。此地特殊情形甚多，不能以一班而概括全貌，比如在彼得羅每年平均的雨量在一二〇耗，而在別處則不同。再者，半島的西斜面，從十月到四月之間，有極強勁的西北風帶來猛烈駭人的大風雪，地面盡為積雪深埋，此時期生物的活動，完全成了窒死的狀態；東部地帶的氣候，比西北稍為溫暖。又在堪察加河流域的盆地，因為四週的

山帶常為濃霧與寒風封鎖，氣候並不怎樣適于寒風。

由于終年深坐冷風中，此地的生育界極，僅生到海拔三〇〇米左右為止，其此，山地的大部份，僅生長些萎縮的矮樹和灌木，可是在低地，則有蒼鬱茂密的森林，有落葉松、蝦夷松等針葉樹，此外，像白樺等丈把高的闊葉樹也不少；其別地方則為牧畜草地和廣漠的沼澤地。至于農地，一向只限于堪察加河的沿岸，別處幾乎認為不可耕，可是由近年來調查的結果，有廣大的地域也確認為可耕了。

住民

加達魯族 Kamchadals（彼等自稱為伊特曼族 Italmen），大都卜居半島中部以南，以捕魚、狩獵為生。現在他們俄化的程度相當高，操土語者僅剩百分之三至四十。半島的北部大部份為哥利雅克族。以牧馴畜為生，富有者每人牧千頭以上，中下階級平均還有一百頭。馴鹿的肉可食，乳可飲，皮可做天幕、衣服鞋襪等。除馴鹿外，還有犬，這些都是拖拉唯一交通工具——橇——的動力，此外，貨物的搬運，以及狩獵的幫助，用處也甚大。

蘇聯自從實施幾個五年計劃之後，此地的俄人也急劇地增加了，其人數已超過土人，他們除住彼得羅巴夫羅夫斯克外，主要集中在沿海新設的都市中。此半島所有的居民，連土人合計，也不足六萬人，所以人口的密度，平均一方寸不過〇·二人。

經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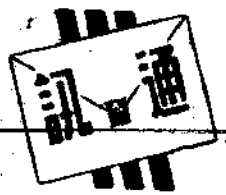
原住的土人迄今仍度着原始的生涯，插足此地的白人，漸漸實行墾殖，奪主開始經營他們自己的文化生活了。起初，此地誘惑西洋人的東西，是棲隱于森林中成羣的黑貂、銀狐等貴重的毛皮獸；十九世紀以來，俄人為獲此

互利，當季節性的往返，後來，漸次定居此地。這些毛皮獸，到現在不失為重要資源之一。但是，此更有經濟價值而且更重要的，是棲集于沿海豐饒的魚族；外人最先注意及此者，是日本老練勇敢的漁夫，他們不辭種種艱險來此地開拓漁場，每年夏季在此捕的魚，常達數千石之多。自一九三〇年以來，看着眼紅的蘇聯人也大規模來此捕捉了——蘇聯政府在此組有堪察加公司，即阿扣公司。（日本入未降前在此捕漁的權利，乃是根據一九〇四——五年日俄戰爭的結果所締的朴茨茅斯條約 Treaty of Portsmouth，但蘇人始終懷恨在心，企圖擊落捕穴一下子把日本人的勢力趕走。）

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漁場的魚族有：鮭、鱈，還有鱈？鱈、鰻等所謂寒帶性的魚族。從五月到十月為漁期，其中以鮭佔全漁獲最大部份；大半裝成罐頭，其餘以鹽漬之輸向各國出售。

沿海的漁場，尤以東海岸為最著名，在東海岸從克羅諾茲克灣 Kronotskaya（北緯五十三度至五十四度五度），到堪察加灣（北緯五十五度至五十六度）；又從彼得羅夫斯基灣 C. Opytorskaya（北緯六十度，東經一百七十度）到歐亞細亞灣 C. Okean（北緯五十八度）的凹形沿海岸為主要區域；在這些沿岸地帶設立很多與漁業有關的罐頭廠和冷藏庫，此地的土人，當然亦從事漁業，然而他們所獲得的除自己食用外，差不多都餵狗給無謂地消耗了。

此外，海獸也是堪察加主要的資源，那靈次克海、白令海都盛產海狗、海象、海獺和鯨等海獸。這世界第一流的漁場，價值極昂，然而，蘇俄人在以前常誤漁期，夏來冬往，于時于物都不經濟，因此，他們遂在此地拓地構屋成為定居，並開墾



巴基斯坦建國一年 ——本刊新德里特約通信

印度自分裂為兩個自治領後，已經過去一年了，八月十五日那天，印度聯邦和巴基斯坦分別舉行「獨立」一週年，最奇怪的是印巴兩國互無禮貌的遺囑表示，他們的仇視，他們的歧見，依然是存在的。祇有英國的心情頂愉快，好像為人類做了一件偉大的工作，培養印度人同族人分別獨立地去治理他們的國家。

在印度獨立的一年，已經有許多值得稱道的成績。這片廣袤大陸上的幾百個藩邦，除了喀什米爾沒有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以外，多數歸附了印度，足見一年多來的印度，並沒有成為幾百個分裂的邦國。雖則在旁遮普發生過可怕的屠殺事件，大體上在這種變化和分裂過程中，並沒有像一般預料的那樣流血。雖則印度聯邦憲法並不能令人滿意，制度上的缺點很多，而他們的人

民也還沒有完全從經濟剝削中得到解放，但是尼赫魯和他的閣僚們在十二個月內的政治成就，已經超過了他們預料中的程度，確為一種新的事實。事實是客觀的明鏡，印度聯邦的一年，確有了顯著的進步，我們關心的巴基斯坦又是怎樣一個狀態呢！

巴基斯坦的情形，外間知悉不多。巴基斯坦是由分割開的西部與東部組成的，互相距離一千二百公里，恕我唐突說一句，這個地理形勢是勉強的形成的。一個國家，它的地位恰居印度的包圍中。巴基斯坦的創造者真納曾誇大說：「巴基斯坦擁有豐富的資源及潛力，」此雖不無過分之處，但無可懷疑的，它的經濟形勢，可能並且已經成為了英帝國的殖民地。它有十萬三千平方哩的面積，比一九三三年的德國大了四分之一，它有七千萬人口，約等於

一九三三年的德國；它有過剩的農產品，能輸出一部分小麥、米以及大量的黃麻，它并有若干數量的油田，鑛鐵礦及潛藏著的水力。但它的工業落後，僅有零星的毛織、水泥、糖、棉工廠，衣料及大部分的製造品均須仰給於國外。全印百分之八十五的黃麻雖均出產於巴基斯坦，但加工製造的工廠却全在加爾各答。煤礦奇缺，夠不上談工業；吞吐的港僅有喀拉蚩一個，實在貧乏極了。全國的教育不發達，識字的人僅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四，比之印度聯邦的百分之十二，相形見拙。

尤其可憂的，巴基斯坦新政府除了真納以外，沒有一輩出類拔萃的政治人物，可以領導巴基斯坦及其建國工程。真納已經是七十以上的高齡，幾月來臥病不起，已經籌策繁重的的工作，他一再告誡部

屬：「我已盡了責任，我把巴基斯坦交給了你們，此後的建國責任，須由你們來負責任。」真納自知病體的沉重，雖有同生之力，據說他已為今後艱苦的巴基斯坦安排了下列諸事：

(一) 巴基斯坦必須兼併喀什米爾，并須保有海邊拉巴的特殊權益（特別是同人的居住權）；
(二) 對印度聯邦維持友好關係，特別是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
(三) 巴基斯坦不能完全擺脫英國的歷史關係；
(四) 忠於回教聯盟，并加強中東伊斯蘭教的關係。

看不起尼赫魯的社會主義；除了他以外，巴基斯坦政府，多是一輩平庸不足道的人物，所以若干行政交通部的主管，仍仰賴英人來担任。教育部長不慣於教育的推行，宗教意識過分濃厚，財政部長和駐美大使是比較有能力的，像這樣的人物，真是屬毛麟角。真納一生為巴基斯坦成功的理想而奮鬥，他未為巴基斯坦培養一輩行政幹才，確為這位回教領袖的缺點。

正如印度報紙所指出的，英國利用在巴基斯坦的地位和它的政府的影響，挑撥着巴印之間的衝突。英國軍界意圖把整個西北邊界地帶置於自己管轄之下，巴基斯坦放縱部屬越過邊界深入喀什米爾，以致引起印度軍對喀什米爾的攻擊，都是英國行政人員鼓勵的，她們不讓喀什米爾藩邦加入印度聯邦。由於印度政府向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控訴的結果，在喀什米爾問題上，印巴武裝衝突的危機是很難避免的。

巴基斯坦西北邊境崛起一支比較進步的力量，他們看清楚印國分裂及獨立巴基斯坦不能解決巴基斯坦的問題，而且會加深印國尖銳對立的關係。這一支力量民族意識重於宗教意識，他們被回教聯盟指為煽動家、反動份子。這支力量——左翼的回教青年，他們主張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伊斯蘭的社會主義 (Islamic Socialism)，把巴基斯坦建設為現代化的國家。他們注視着蘇聯回教區的發展，他們深切反對回教徒重壓英國的圈套，七千萬回教徒受着英美的奴役。

真納和回教聯盟領袖的保守思想，完全拒絕這支力量的主張，政府說：「印度和巴基斯坦快到共產革命的邊線實在太早

，這容易引起世界大戰或
印印于階級戰爭中。」
實則巴基斯坦的進步青年
，并不容易傾向共產，他
們是要求巴基斯坦從封建王
國的解放，走向經濟現代
化民主化，消滅巴基斯坦
農民貧窮與不振而已。巴
基斯坦青年的民族意識很

日本臨時國會解散問題的關鍵

——本刊東京特約通信

新憲法下的日本第三
屆國會，究將是蘆田內閣
的延命湯還是種的催命符
，關鍵完全在社會黨的態
度。如果社會黨在這次國
會中能放棄其黨首片山哲
一再聲明的國會解散論，
則即使有民主自由黨的要
求解散國會的提案，多半
也不致會通過，原因是民
主、國協二黨已明白表示
反對解散，如果再有這目
前的第二大黨社會黨能與
他們合流，其將以過半數
的議席把解散提案輕視擲
遠，是很容易首肯的。國
會不解散，蘆田內閣的壽
命至少在本年年底召開第

四屆國會即通常國會以前
，大概是沒有問題的。但
是社會黨的態度究竟怎樣
，當第二屆國會閉幕後
，社會黨首片山哲在往各
地遊說的途中，曾一再主
張國會必須解散，實行總
選舉，該黨左派是竭力支
持片山的主張的，因為認
為再和無黨實行社會主義
政策的民主黨搞在一起作
支持蘆田保守內閣的與黨
，對社會黨是一種不可挽
救的損失；至於該黨右派
，雖然還戀棧着有名無實
的聯合政權，但鑒於黨內
外的輿論在指摘着社、民

他們的教士。以目前巴基
斯坦的情形說，它比印度
聯邦後復遠，它的前程
如何，或左或右或進步或
保守，繫于真納的健康，
一繫于社會經濟形勢的改
革。（九月八日葉羅莎寄
于新德里）

二黨合作已到了限界，也
不敢則聲，特別是當時右
派的統帥西尾末廣已因受
賄嫌疑案而辭去國務相，
大有「羣龍無首」之感。
可是後來西尾案件說是已
調查明白，絕非受賄，這
樣，他又以右派指導者的
姿態重行發言，說他自己
有這點自信可以說服片山
，叫他放棄解散國會的主
張。這樣，對於未來不以
片山的解散論為然的右派
的人們，不啻是一服最有
效的興奮劑，於是也紛紛
開口了，例如商相水谷長
三郎、黨書記長淺沼稻次
郎等，都打破了過去的沉

默，明白地說出：「原則
上面認為應當解散，但是
時期和方法却還有檢討的
必要。」第一句話是給黨
首以面子，同時也想掩耳
盜鈴把否定黨內意見的對
立；第二句話，則等於說
，解散是可以的，但不要
在這次國會中提出。這是
想從這次國會把解散問題
拖延到下次，國會的延宕
作戰的策略。把這種策略
表現得更直截明顯的是西
尾，他說：「到了十一月
裏，外資導入和主食的增
加配給也可以實現了，那
時正是片山、蘆田兩屆內
閣的施政達到收穫的時期
。而在這兩屆聯合內閣中
，社會黨都會參加的，所
以即使從這點說，社、民
兩黨的提議，也不能認為
已達到了限界，總之就現
狀看來，並未進入必需解
散的階段。」這是明白否
定了在這次國會中即行要
求解散的主張。

但在左右派，則也有
其所堅持解散論的理由，
他們不但主張解散，而且
主張在這次國會中把社會
黨出身的閣僚都從蘆田內
閣撤換，以表示不再與民

主黨繼續合作的決心。其
理由是：這個聯合政權，
社會黨的主張並未採納
，政局的進行已到了半身
不遂的狀態，因此國民對
社會黨的信仰已失去，黨
勢已陷於極度的衰頹，所
以現狀是已達到了必需解
散國會的階段，祇是根據
憲法條文的公務員法的改
正，則在這次國會中必須
解決的，等到問題一解
決，應該立即解散。

反正是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左右兩派都
有理由的。可是社會黨究
將在這次國會採取怎樣的
行動，其決定的關鍵不在
那一方面理由對，而在
那一方面理由大。而所
謂勢力的大小，並非指左
右兩派在全體黨員中所佔
比重的大小，却專指兩派
在中央委員會中所佔的勢
力。原因是，社會黨的政
策與行動，差不多完全由
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而
不必徵求於大會的同意。
因此，在九月八日及十
三日舉行的社會黨中執會
，不妨因為「解散論」或
「解散通過論」那一種主
張戰勝的分水嶺。

在八日下午舉行的中
執會中，首先由委員長片
山關於他在東北、北海道
遊說途中發表的解散論的
原因，加以說明，他說：
「政局的進行已到了無法
進展的地步。在這種時候
，實行解散以打開局面，
這是政黨應有的責任，特
別是，現在的第三黨民主
黨在担任着首相，是很不
自然的現象，所以目前僅
第二黨的社會黨，應該拿
取主體性而主張解散國會
，並且這事對於黨內的團
結也是有利的。」接着，
有伊藤、正木、西村等人

在中執會舉行的前夕
，屬於該黨右派的水谷商
相、永江農相，淺沼書記
長，以及井上、伊藤、細
野、中崎、正木、加藤、
山下、林、前田、菊川、
金野等人舉行集會，討論
應付中執會中關於解散問
題的態度，結果認為片山
委員長所主張的在公務員
法改正後即行解散國會，
其理由並不顯明，並且從
現在的全國情勢看來，實
行總選舉對社會黨是不利
的，因此，大多主張解散
國會應延至明年。

在八日下午舉行的中
執會中，首先由委員長片
山關於他在東北、北海道
遊說途中發表的解散論的
原因，加以說明，他說：
「政局的進行已到了無法
進展的地步。在這種時候
，實行解散以打開局面，
這是政黨應有的責任，特
別是，現在的第三黨民主
黨在担任着首相，是很不
自然的現象，所以目前僅
第二黨的社會黨，應該拿
取主體性而主張解散國會
，並且這事對於黨內的團
結也是有利的。」接着，
有伊藤、正木、西村等人

發言，說「在原則上是贊成解散的，可是問題在時期和方法。」這連水谷商相與後沼書記長的「解散」的稱呼，再後便

是米達、吉川等人的「本屆國會解散論」和鈴木、赤松等人的「開會後退論」。雖然展開了三個鐘頭的論戰，還是「場無結果，結果就是說：對片山委員長關於解散國會的言論，尚不瞭解，不過對於解散的時期、理由，以及關係總撤退的可否，則須在十日舉行的社會黨最高幹部會議，以及十三日的中執會中進行檢討。但是在最高幹部會及十三日的中執會中並沒有得到結論，看模樣，大概要在預定於九月二十五日舉行的全體中央委員會中才能對這個

問題有具體的決定。社會黨中央委員的勢力分野，右派對左派大概是五與三之比，照這右派幹部的主張應該佔優勢的，可是對於這次國會的解散問題，則即使是屬於右派的中央委員也未必完全同意幹部的「週邊論」的主張。據朝日新聞社對各地選出的約二百名的社會黨中央委員的意見調查，認為應該解散本屆國會的佔着絕對多數。這個調查的第一問「應否解散？」其答覆，說「應該解散」的，佔全體地方選出中委的九〇——九五%之多；第二問「如果解散，其時期與理由應怎樣決定？」其答覆，則有一半是贊成片山委員長所主張的社會黨以與黨的空虛去應付解散，

另外一半則贊成鈴木茂三郎等所主張的退出內閣後去應付解散及總選舉，關於解散的時期，則大多數主張在本屆國會中即行解散；第三問「關於解散時期與理由，應以什麼方式作最後決定？」其答覆，說「應由中央委員會決定」的佔九五%左右。這樣看來，如果在全體中委會中決定這問題時，社會黨是選出之於解散本屆國會的一途的。不過社會黨在這次國會中對解散問題的態度究竟怎樣，還不容預斷，因為主張「週邊論」的右派幹部的威脅利誘的手段，乃至盟總的態度等等，都是可能使那些原來主張解散的中央委員以及國會議員動搖的因素。（九月十八日葉森寄自東京）

越南民族問題

本刊越南特約通信

印度支那半島包括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一向是遷徙不同民族的三個移民潮流的匯合點，因此目前

越南有許多不同的種族，每一族都有其不同的風俗習慣，語言，衣服和體質特點。越南人民佔絕大

多數，計在全人口的二千餘萬中，幾乎佔一千九百萬。越南有六個主要的種族，即越族、Khmer族

、泰族、印尼族、馬來亞族和保族。前三個種族，尤其是越族，其文化與文明影響於其他種族，至後三者，其土人部落受隣族的支配，被趕到荒漠不

萬人，大多數是在 Tonkine, Yuhay, Soc-Trang 和 Chau-Doc 省，但在任何區域他們都不佔大多數。Khmer 人源於印度，約在第九世紀到越南，一同帶來的是印度文明佛教和梵文字母。

從前的大可汗 (Chang) 王國，即馬來亞人，現在祇剩有山邊的斷碑碑石，馬來人則在 Pong, Dong 省和 Binh Thuan 省的山谷中。當一四七一年被越族推翻後，可汗王國從中圻的海岸地帶擴展到峴港。在紀元第一世紀中，可汗人已採用了婆羅門文化，文字則仿照 Devanagari 的字母。

在中圻南部和南圻東部的高原上有 Siamese 人，是原始的印度——馬來亞人，沒有文字。他們在越南的人數總共二十五萬多一點，另有同等人數散佈在老撾和柬埔寨。他們是堅強的獨立民族，從未完全被法國人征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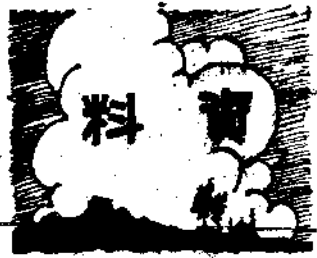
北圻有三族，蠻人、苗人和保族。編織族的保人自耶穌紀元開始即在越南。他們已和泰族、蠻

族混雜，并已被同化到相當程度。從十三世紀起，蠻人從中國的西江和長江的分水山脈向南慢慢擴展，到十七世紀時，他們到了越南北部，和平定居在山谷和叢山之中，山高自三百至九百公尺不等。蠻族人約為七萬五千。

十九世紀中國人的擴張，迫使苗人從雲南和隣近各省移向南方，流落到越南北部，佔據了高達九千至一萬公尺的叢山。越南約有苗人七萬。

泰族有四十萬人以上，在少數民族中是人數最多的，他們住在山的低層可灌溉的山谷中。像泰人侵入其他國家的情形一樣，越南的泰人已吸收了越人的文化，雖然還有不同的泰文，同時混有越人的越字，但不是用泰文的字體。在泰族中包括有芒人 (Mong), 人數六萬，是中泰的混合種，現在更混有越人血統。他們住在黑河和紅河的山谷中。

從北圻到柬埔寨的叢山，散佈有印尼人，他們是極原始的民族，沒有文字。（下接十九頁）



張 羣 訪 日

本刊資料社

中國前任行政院長張羣，於八月二十一日偕夫人及日本問題專家館野赴日視察，於九月十三日返國。此次張氏訪日，曾與麥克阿瑟四度會見，並曾與日本朝野人士會談，及觀摩日本各地，頗為各方重視。茲將張氏赴日後重要言論，日本報紙之反響，以及各方對張氏訪日意義之觀測，輯錄於后。

一 張氏在日重要言論

中日文化協會於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在參議院議長官邸舉行張氏訪日歡迎會，日本方面出席的人，除該會會長安倍能成（曾任幣原內閣的文部大臣）外，有民主自由黨顧問幣原喜重郎，日本銀行總裁一萬田尚登，衆議院議長松岡駒吉，參議院議長松平恒雄，戰爭期內曾任外相的有田八郎等多人。張氏即席演說，其要旨如左：

「不問是從早就與日本有深關係的人，或一連研究着日本的人，總之現在中國人，對於戰後日本的復興，都寄與極大的關心。人類不應同人種、國籍的區別，唯有正確認識事實，才是最重要的事。因為不能正確認識，才會發生不安，才會發生懸揣，才會發生懷疑，而成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間的不幸的基因。在過去的中日關係上，其所以發生不幸，也因為兩國間有誤解之故。我這次到日本，是為了解消過去中日兩國間的誤解，換句話說，是為了解消戰後的日本。外國對我這次訪日，有種種的推測和謠言，但這些全是猜測，而出乎我意想之外的。我是為了盡量多會見一些人，盡量多觀察一些地方，以正確

認識戰後日本的姿態，而來日本的。世界的和平與民族國家的友好合作，必須站在精神的了解上建立；而要達到精神的了解，必須以相互間深知的對方為前提。這種精神的了解，可以成為友愛的基礎。這事在個人、民族、國家間都是一樣的。今後的中日關係，其出發點在兩國間相互正確認識對方。無論為了保障世界的和平安全，或亞洲的和平安全，今後中日兩國相互間正確地認識，還是很重要的。為了這樣的目的，在中國已成立了亞東協會。我是該會的名譽理事長，今後預備和具有同樣的目的與使命的中日文化協會攜手，為中日間的文化交流，友好關係的復活而努力。我在這裏特別想強調的是，明治維新以來成為日本的國策的基礎的，是富國強兵與海外發展這兩種思想。這兩種思想，成了日本的軍國主義的基本，這事給中國人民以不安，同時也成為排日、抗日的理由。戰後中國人民，對日本的復興仍抱着極大的不安與懷疑，但這是對日本的軍國主義的再建所抱的。我特別願意強調日本的心理的再建設，因為這事足以根本掃除軍國主義思想。這事足以成為提早對日媾和的基礎，成為決定日本經濟水準的極大的關鍵。對於不以軍國主義為背景的海外發展，和提高人民的和平生活的「富國」，中國固不反對，即使別國也並不反對。中日兩國今後必須在國家的或民族的了解之上，謀文化的交流，以及愛精神為東亞永久的和平而努力。我願意再說一下，今後中日兩國的民間文化團體，應該為東亞的和平與安全努力，這是這種團體應有的義務。」

張氏於九月十一日，以日語向日本全國人民廣播，全文如左：

「此次本人以個人資格，前來視察戰後日本，承參帥及盟總各地各級主管的誠意協助，以及日本朝野領袖的坦

白報告，及至本人親往日本各地的耳聞目睹，使我對盟總佔領政策及其實施成效，與夫戰後日本各種情況獲得更親切的認識與了解，實感欣慰異常，現在考察告一段落，預定明日返國，特就個人親感所得，略抒所聞，以為區別贈言。

戰爭結束條約已三載，在短短短歲月中，更生的日本，竟已在各種制度和法規上，具備了和平民主的機構，而一般日本國民，也能遵照盟總指示，步步邁進，可說這一切正是說明了參帥和其同僚們的偉大成就，與日本國民奉公守法的優良性格，實值得我們同聲讚賞的，可是民主政治的真諦，不僅是表於制度與法規之改革與建立，同時必須是國民的信仰，而日本政治民主化的艱難，而遙遠的路程，又正如「羅馬非一日可成」，更必須日本的先知先覺與一般國民，具有自主積極的熱誠，與百折不撓的堅忍精神，和衷共濟，攜手並進，始克處於成功。本來日本國民，由於長期間生息於神道的封建的軍國主義壓榨下，久已缺乏自由進取的民主訓練，其原有其好的個性，實已被摧殘殆盡，自戰爭失敗惡夢方醒，在盟總領導下，雖已踏上了再生民主的大道，但因當時時局短暫，還沒有能夠把這目標勇往邁進，這也是無庸諱言的事實，自我到日本以來，我曾接觸過各級各地的盟總官員，和其他盟國代表，也曾聽取過日本各界各地的多數領袖的意見，我也曾親自觀察日本各地民衆的實際生活，與社會生活，我總感覺到有形的制度法規的改造易，而無形的心理思想的改造難。如果日本各界領袖和一般國民，不在教育與文化方面以厚忍積極的努力與熱忱，普遍徹底的去革除消極被動的舊習慣，創造積極自動的新精神，而來配合充實現有的民主規

總，我後擔憂真正的和平民主日本的實現，仍舊會有甚多艱難與荆棘。爲了這我會一再的呼籲，而我現在藉此機會，仍願再度的呼籲日本國民，應該澈底實行思想革命，與心理建設，而這個思想革命與心理建設，不僅是一個和平民主日本的保證，也正是日本與其他民主國家重建心理關係的必需保證，其次是日本的復興，在短促的時日中，發現日本國民很努力也很焦急於本國的經濟復興，尤其關心於鄰國對於日本復興的態度，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很坦白的奉告各位，中國國民同時我相信全世界各國，對於日本復興問題，亦甚關心，正因為這不僅是日本一國事，中日兩國的問題，同時也是和整個遠東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復興與安全有關的問題，回憶戰前，日本的經濟政策，乃軍閥擴張爲好的高度國防經濟，其本質，對內是獨佔的，對外的，對外是排他的，侵略的。這次不幸戰事的發生，其主要原因，即在於此，而今天日本國民與遠東其他國家，尤其中國國民所受的損失與悲慘的生活，正是這個日本軍閥所造成的，現在中國國民正如日本一樣，正在致力於國民生活的安定，與國民經濟的復興，中國在戰事尚且不以日本國民爲戰爭對象，更無理由在戰後置日本國民於餓死狀態而不顧，因此中國國民對於戰後日本國民的同樣的努力，自亦寄予無限的同情，不過中國與論希望日本復興的計劃與努力，應該鑒於戰前的錯誤與失敗的教訓。

第一，正和日本的政治必須和平民主化一樣，日本的復興，亦必須從日本經濟的和平民主化着手，唯有這樣堅定，才不致有新興財閥之再起，而日本一般國民的生活，藉此得一保障，對外基於互惠互助之原則，才能不再損人利己，而相輔並行。

第二，國際和平與世界安全固不可分，而和平與安全所賴以保障的各國的經濟復興，也同樣是不能分的，事實上日本的復興，如果沒有其他國家特別是近鄰的中國合作與援助，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日本的復興早在他計劃的當時就應該不但包括中國的復興，而且積極的必須有助於中國，乃至遠東其他國家的經濟復興。實而言之，日

本的復興計劃，必須同時從遠東其他國家的立場着眼，在何種助日本復興的計劃，也必須從整個遠東的立場上，使遠東各國的經濟復興及其工業化得以達成，平均而平行的發展，有遠東區域經濟復興繁榮，才能實惠於世界整個經濟的復興與繁榮，單單顧日本一國成爲遠東工廠的想法，不僅是不合理不可能，同時也是不能接受的，最後關於中日兩國的未来關係，我想特別來說明一下，在我出國以前，和我到達日本以後，我發覺中日兩國的國民，彼此同樣的關心於中日關係的將來，這當然不僅因爲中日兩國在歷史，地理，文化，經濟，各方面都有密切關係，也因爲兩國國民，由於此次戰爭的慘痛教訓。都希望能從一個新的基礎出發，來樹立兩國約百年大計，未來在目前對日和會，尙未舉行，和約尙未簽訂以前，談不到中日兩國間直接的而正常的國交關係，不過中國的對日根本方針，在戰爭結束當時，固已經可以從蔣主席的「不以怨報怨」的對日聲明看得出來，而這個聲明，也就是中國國民傳統精神的道德的表現，就最近中國的民間輿論而言，正如其他聯合國家一樣，中國國民所期待于日本者，無非就是我在上面講的政治的民主化，與經濟的民主化而已，如果日本能多動行思想革命與心理建設，切實做到上述兩點，我確信中日兩國的關係，必能走上合理正常的途徑，而世界各國，亦必樂於與日本國民攜手合作，至於日本朝野希望早日和約，恢復自主獨立之地位，並得重返國際社會，本人深表同情，並深信中國亦必本其早日召開和會之一貫主張，繼續與有關國家協議，尋求途徑而促其早日實現也。」

九月十一日張氏與日本記者團在東京中國駐日代表團會見時，曾和日本記者作如下的問答：

記者問：今次訪日的結果，覺得日本政治的民主化及經濟民主化，在漸漸結實嗎？

張氏答：政治民主化與經濟民主化，在其制度及規模上，給我的印象是大體已完備了。但若問日本人的頭腦，是否已完全從過去的思想改換爲新的思想？則很遺憾，我覺得還沒有完全改換。例如前

幾天到鎌倉去時，看見在廟裏正在祭賽軍馬和軍大，這是過去的武士道精神的殘滓。

問：和各界要人會見後的印象怎樣？

答：他們都是熱心地向民主化努力着。我們是在訪實着過去的軍閥財閥，而不是在訪實着日本的國民。當然對於日本民主化的速度，我們是不想作無理的要求的。

問：對於日本的經濟民主化的印象怎樣？

答：總括說來，日本經濟的民主化，不應是保障特殊階級的那種經濟復興，而必須是保障日本全體國民的生活的那種經濟。換句話說，必須和其他各國配合。

問：您在行政院長時代，曾聲明過決不考慮不包括蘇聯在內的對日和會，這種態度即使在現在也沒有變嗎？

答：早日舉行對日和會，是中國一貫的主張，理由是在保障遠東的真正的和平安全，和早日使日本復歸於國際社會。如果有關諸國中，有那一國不参加對日和會，則東亞的真正的和平與安全即不能保障。

問：在和會以前，日華兩國在經濟與文化關係謀更進一步的密切關係，這事不可能嗎？

答：在和會以前，日本和外國間的外交關係是不能存在的，不過關於中日間的貿易及文化的交流，則現在也已開了路子，所以中日兩國應以被容許的路線，謀積極地緊密化，這是兩國人民所應努力的。

問：中國人中好像有對於日本的經濟復興抱着不安和戒懼的……？

答：這點是的確有的。但是因爲中國人是在過去五十年來，被日本的軍閥與財閥的帝國主義殘廢

過來的，所以其印象還是在中國人中很深地殘留着的。這點，希望日本人要好地認識。這事正在日本有陳舊的思想殘存着的一樣。我願意特別強調日本的思想革命，如果日本人能一掃軍國主義的思想，則我相信中國民衆對日本的不安和警戒也會一掃而空的。

二 日報對張氏訪日的反響

「國際新聞」是旅日華僑巨子黃居氏所辦，每日發行數萬張，達四十萬份，購讀者當然大部份是日本人，因此牠的言論在日本曾發生相當大的影響。關於此次張氏訪日，該報於八月二十四日以「張軍氏來日的意義」為題，發表社論，茲摘譯其內容概要如左：

「張軍氏是熟知日本的中國政界的重要人物。現在雖已辭官，但總統對他非常信任，因此，張氏自己已聲明此次訪日並無任何公的任務，但中國各界對張氏此次訪日特別寄與期待，即使日本，也因為中國的對日和約的基本方針是在張氏擔任行政院長的期內大體確立了的，而運方針雖是非常嚴格，可是並不主張報復，不反對日本的復興的，所以日本對此次張氏訪日也一定很感激的。」

因為在那個基本方針之下，張氏曾為了打開關於備局的對日媾和問題，而向美蘇交涉，可是因為受複雜的國際情勢的影響，他的努力並未成功。在這個時期內，由於美國的對日政策作極大的轉變，即致力於使日本自立，這事大大地刺激了中國人，結果造成了中國人的對日不安與反美思想，在這樣的情勢中把行政院長讓給了翁文灝而繼續辭職的張氏，親自訪問在佔領下已進入第四年的日本，瞭解日本各種情形，還專對於日本不能不說具有極大意義。

再就中國說，在國內問題堆積如山之際，張軍的訪日，自然也不妨視其為具有某種使命。特別是把中國內戰，

如果將他的重大性作過低的評價，將是對中國的作為未來的亞洲的指導力的這一使命的評價，關於這點，自從美國採取了助日復興的政策後，中國人民尤其其知份子，認為這是無視聯合國一份子的中國，給與戰敗國的優遇，而非常憤恨。這憤恨當然也有理由，可是因此而在中國發生反美運動，則對於現在最需要美援的中國，是並非可喜的現象。

關於這事，蔣帥也在三月間致美國下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書簡中說着：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對世界政策的一種，這比之蔣帥為優先運事是不妥當的。蔣帥並強調：要實行中國國內的改革，必須先使其內戰停止。關於這點，張氏大概會和蔣帥充分交換意見後歸國的。再者，張氏大概也會和日本朝野的有力者會見，觀察日本一般的狀態，以告中國民衆。而在我們，則大大地期待着，中日兩國人民因此能回復為亞洲的友邦，並且為全亞洲的和平與福祉而築成中日合作的鞏固的基礎。」

東京「朝日新聞」，是日本著名的報紙，該報於九月一日以「正當的日華關係的建立」為題，發表社論，以論述張氏訪日，其內容如下：

「前任國府行政院長張軍氏的來訪，頗為內外視聽所集注。張氏已與蔣帥及佔領軍高級官員數度會見，並曾訪重田首相，又曾出席中日文化協會發起的歡迎會，詢求各界的意見，而在研究着戰後的日本與佔領政策。」

張氏的訪日，據說完全以私人的資格，但舉國官民以歡意歡迎着張氏的來訪，這無非由衷地期待着張氏對日本實情作公正的判斷，以轉告中國之故。

張前院長在中日文化協會的招待會席上，指摘着以下諸點：(一)以軍國主義為基礎的富國強兵與海外發展政策，是使日本破滅的根本原因；(二)在中國人中，有對日本的復興與不安與誤解的；(三)關於日本的民主的再建，中國寄與着莫大的關心。張氏強調地主張日本的民主的再建，就兩國必須以國家的或民族的了解，謀文化的交流，努力實現東亞永久的和平與安全。

如果容我們率直說一句，則日華兩國現在在走着非常困難的步子，貿易等經濟的交流固不必說，即使思想的交流也不能順利地實現。這樣，勢所必然地，我們對中國的關心每易成為稀薄，以致關於中國人對日本復興所抱的不安與誤解，也沒有特別去努力加以消除。因此，張前院長的來訪，是求之不得的一個機會。

我對張院長的來訪特別期待着的，最重要的是能充分冷靜地認識日本的現實的姿態與國際的地位。如衆所知，中國對過去的敵國日本，也將容許其保有相當程度的工業水準。但是我們，對於這事，除了想用之於復興我們自己的中國以外，別無他意。再則，在抗戰中作了鉅大犧牲的中國，其對賠償問題具有很大的關心，原是當然的。對現在為止，所實行的不過是臨時賠償，還未有最終的決定，可是因為這樣的情形而說日本會武裝再起，照理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嚴正地宣言了放棄武裝的新憲法，決非裝飾品，這點是我們正以此誇耀於世界的。

但是停戰後時間還不久，雖說已急速地民主化了，但是我們也不想否定，國民中不能說每個人都已體會了民主主義的真髓，農村固不必說，即使都會，在政治及經濟中，也還未把封建的成分完全清算。但是不信這事足以阻止我們走向民主主義。中國人所最担心的「地下政府」業已組織之類，完全是由於誤解所造成。如果有這類事存在，也將是我們自身的敵人，這點，日本國民中無論誰都非常明瞭。

總之，如果日華兩國以友愛的精神，再度鞏固邦交，而能保障兩國的和平與安全，則在東亞也一定會造成永久的和平與安全。這話說來，一切都從日華兩國的協上的了解出發的。秩序紊亂的日本社會及經濟，要加以再建，先須從日本人身心的再建着手。張前院長對這點會率直加以指摘。我們願意告訴中國有識人士，我們自己對這點也將深自反省。」

八月二十三日「朝日新聞」的「天聲人語」欄，關於張軍訪日，會發表了這樣一篇文字：

「二十一日來日的中國前任行政院長張軍氏，是日本

士官學校出身，日語也極好，是明瞭日本的中國政界的一
個巨頭。在辛亥革命時即已投身國民革命運動，以後備會
革命運動的辛勞，可說是與激進奮鬥着而在中國革命的主
流中游過的人。如果說「不辭斗酒」，那就會叫人想像
這人是一個武夫，但是他決不是單純的一個武人，他是個
偉大的政治家。在一九三三年担任湖北省主席時，省人會
曾為張之洞的再來而極力擁護張的政治，即從這一點看，
也可以明瞭上面所說的話。後來担任外交部長，二年後，
發生了日華決裂。在不顧一切要通過中原的，日本軍閥
的強硬政策的目前，雖未能以外交部長的地位防止戰爭，
但在這個期間內顯示的他的政治家的能力，却值得予以
稱道的。張氏此次訪日，說是一完全係私人的觀察旅行，
其目的我們固無從知道，但是，由於他的訪日所得的日
本觀，會對今後的日華關係上發生巨大的影響，這點大概
是確實的。最正當的國際關係的理想，唯有相互間充分融
融及理解之時，才能夠提出。給人家看的，應毫不隱晦地
給人家看。作為練達的政治家的張氏的頭腦，在日本的實
實的姿態中，一定會正確地看透其發展的方向，且唯有在
這個認識之上馬將會築起正當的日華關係吧。

三 對張氏訪日意義的觀測

東京「朝日新聞」以張氏訪日為主題舉行座談
會，中央通訊社東京社社長宋德和，以及法國新聞
社東京分社社長蒲魯都參加，二人對張氏訪日的
使命會這樣說着：

宋德和：關於張氏的使命，外間雖有種種傳說，
但我則除了張氏自己對我所說的以外，不能另外
說什麼。張氏在五月間辭去了行政院長以後，三個
月來，在華北、華中、華南作全國的旅行，在南京
祇住了三天，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在中國的要人之
中，有很多人過去和政府抱着相同的意見，現在却
成了反對派的。尤為是在這樣的時候，所以張氏採

日本觀

感

張 羣

取着極其慎重的態度，竭力避免給人以政府為背景
之感。張氏會留學日本，很知道日本，但在停戰以
後，則祇在由美返國時發了一下日本，住了一二天
，還沒有以多帶留幾天的打算來過日本。在中國，
關於現在日本的狀況，有種種的意見，因此在張氏
，就想親自好好地到日本看一下。得一個結論。張
氏最初是預定到朝鮮去的，因為麥克阿瑟既前往參
加大韓民國政府成立典禮，則中國方面也應派一個
大人物去比較好，而張氏則為最適宜的人物。但這
事因為有技術上的困難，所以就先到日本來了。雖
然有人說張氏是蔣總統的非正式的顧問，或政府的
代表，但據我所知，決不是這樣。關於張氏的訪日
，有二個問題：第一，反共協定的話有沒有根據？
第二，張氏是否想促成麥帥與蔣總統的會見？他絕
未對我說過負有特殊的任務。關於第一個問題，即
使發生了締結這個協定的意思，這也不是應在東京
和南京直接談判的事，而是與華府有關的問題。麥
帥對於這種事，沒有決定權的。關於第二個問題也
是同樣，在還沒有能在華府作根本的商談以前，却
就要談論這兩人的會見，那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張
氏關於這點，會明白地對我說過：「在華府與南京
之間成立諒解以前，無論我幹或任何入幹，都是徒
然的。」那末，麥、蔣會見是不是張氏所希望的？
張氏在和麥帥會見時是不是會提及這事？我以為這
是另外的問題。因為張氏和麥帥說些什麼，這在他
好像是初便沒有一定的計劃的。上面這些話，是張

氏對我所說的話的總括。張氏在日本，和各方面的
人會談着，據他說，和大內兵衛、高橋正雄（按大
內、高橋為日本著名經濟學者，思想較開明）二人
談得最自由。總之，他是想知道：日本人對共產主
義覺得怎樣，美國對日本幹些什麼；並且其結果是
對中國的安定為有利還是不利。這是他的主要任務
和最關心的事。關於日本的再武裝的可能性，以及
由美蘇二國對立而來的有關日本的一般軍事問題，
我想他也是想詳細知道的。

薄魯：反共協定的消息，是根據法國新聞社的
巴黎電訊而發表的，這消息的來源，出自巴黎的外
交界。起初，因為張氏自己對這消息加以否認了之
故，謠言總算歸於平熄了，但是有一部人對他的否
認，却又作了另外的想法。那就是，第一，張氏即
使負有探詢日本政府關於反共協定的意向，和實行
交涉的任務，他在暫時總要作公開的否認的；第二
，他的使命在努力改善中日關係，促進兩國的共同
利益。所謂共同利益，其中包括文化、經濟、政治
三種。中國正在和共產黨作戰，日本政府也正在
和共產主義作戰，所以張氏和麥帥間一定會對這事
交換了意見的。因此，其會提及反共協定的問題，
也是很可能的。麥帥在最近發表的聲明中，會強調
以日本為反共的壁壘的必要。並且會說及大韓民國
及菲律賓。這是他把南韓及菲律賓也認為反共的壁
壘之故。所以在張氏與麥帥會見時，會談及對共產
主義作戰的問題，可說是當然的。

這次赴日本去觀察，國內同胞都很關心，國外
人士也非常注意。在日本的行動與言論，一方面得

到同情和鼓勵，一方面也引起揣測和批評，回國以
來承各界友人的訪問，不能一一答覆，今日特地將

赴日觀察所得的材料，略為整理，並從整個亞洲的
前途和中國應有的努力着眼，提出意見，對全國同

跑作一個概括的報告。希望這一報告，可以供國人對日本問題的認識，以及政府對日本問題決策的一點參考。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八十多年，一方面本於歷史相傳的神道和武士道精神而形成的軍國精神，他方面吸收了近代的科學知識，作為工業和軍備的基礎，這兩種工具，被日本的軍閥財閥政客的集團所利用，以「地狹人多生產不足」為理由，對內刺激國民，對外作為擴大侵略的口實，中國與日本地理接近，便首當其衝。自從甲午戰後五十多年間，中國始終在日本侵略鐵蹄之下，十七年國民革命北伐成功，中國國民革命的力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便從側面轉入正面的衝突。從九一八到七七，這個衝突達到了無可轉圜的地步。我全國同胞毅然決然，奮起抗戰，八年之中，中國生命財產的損失慘重，不可數計。但在此大戰爭之中，軍國主義的日本崩潰了，中國百年累積的國際枷鎖解除了，而亞洲多數的民族，也獲得了獨立自由，這便是此次戰爭得到的成果，也便是中國八年苦戰犧牲對於亞洲和世界的貢獻。

日本投降之後，盟軍進佔日本。負責商討對日管制政策的機關，是設在華盛頓的遠東委員會。而在日本實際執行管政策的，是以麥克阿瑟將軍為統帥的盟軍總部。過去日本在軍閥豈閥政客統治之下，肆行侵略，中國受禍最深，現在日本在盟軍管制之下將成爲怎樣一個國家，中國自然特別關切。不幸戰爭結束已滿三年，因爲世界局勢的複雜。和盟國意見的分歧，對日和會，如同對德和會一樣，還沒有能夠召開。中日之間消息隔障，從中國方面來觀察日本的情形很難得到清楚確實的印象，中國人士，不免從種種關切之中，發生了顧慮和懷疑，

因而感覺不安。究竟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否可能乘著國際局勢的變動而復活？日本的民主政治是否能夠真正建立，將來會不會再回到極權政治的舊路，日本經濟如果復興，是否能使日本重整武裝？或者妨害中國的經濟建設？盟軍總部對日管制政策是否失於寬大？有沒有錯誤？疑問重重，而反美扶日運動，就乘著這種懷疑顧慮和不安的心理，在各地發生了，本人在抗戰以前，已多年沒有到日本，前年從美國就醫回國路過日本，祇住了三天，沒有得及觀察。上述幾個問題，我個人不能提出一個可以自信的答案，也沒有得到一個滿意的答案，爲了想要明瞭戰後日本的真實情形，同時又承亞東協會同人的鼓勵，所以才有此次赴日視察之行。

我從八月廿一日到達日本，九月十三日回國，在日本視察三個星期，與麥克阿瑟將軍會晤四次，並聽取日本朝野各政黨領袖及各界重要人士的報告。總合這些會談報告，與盟軍總部中國駐日代表團各方面所供給的資料及實地見聞所得，我想把戰後日本情形，在下面簡括報告一下。

在軍備上，盟軍佔領日本的時候，日本領土內還有軍人二百七十萬人，在短期內即已解除武裝，歸國的僑俘七百多萬人，在相當時期內，也已經陸續遣歸鄉里，分別安置復員。陸海空軍事機構全部裁撤。軍艦飛機要塞和其他武裝設備，也都沒收或者銷毀了。至於一般所注意的軍港、機場、警察，以及海上保安廳等問題，就我所知道的實際情形來說，日本的軍港，德山軍港在戰後就已經廢棄了，吳軍港現被英國海軍使用，橫須賀佐世保兩軍港，是美國駐日海軍的主要基地，舞鶴和大湊兩軍港是美國海軍次要基地，以上各港的要塞設備，都已經拆毀了。

日本本土的機場原有兩百多處，盟軍佔領日本後，保留了卅三處作為英美空軍使用，其中存少數適應需要曾經擴建，其餘都已經改作耕地墾田，或其他非軍事用途。

說到警察問題，原來日本警察本部屬於國家，由中央機關統一指揮。現在日本全國有治安警十二萬五千人，每五人分配手槍一支，其中不屬於中央的只有三萬人，分屬於地方的自治警察計九萬五千人，都是自願的職業警察，並無服役年限。事務員書記等三萬人，會充軍官的不得轉業爲警員，此外還有由運輸省管轄的鐵道警察約九千名，由經濟檢査廳管轄的經濟警察約五千名，由勞動省管轄的勞動監督官二千名。總計約十七萬人。

至於海上保安廳，現有的保安艇二十九艘，速力十海哩，噸位約一百噸，沒有武裝，此外還有五十噸到兩百噸的拖船十五隻，以及二十噸的小艇六十隻，盟軍總部借用的二千噸供應船兩艘。這些船隻都是救護難民船，防止走私，和有關恢復燈塔，打撈沉船等事項。

從上面所述的各種情形來看，盟軍三年來對於日本武裝的解除工作，可以說辦得徹底。日本現有的警察，保安船艇，以及所用的槍械數量，都是盟軍總部認爲日本維持當前本國海陸秩序最小限度的需要，決不作為日本海陸軍重建的基礎，再就國防軍備的根本條件來看，日本戰敗後，業已喪失其原有領土百分之四十三強，煤鐵資源喪失很多，近代戰爭所必需的物資，如石油橡皮等等也一無所有。日本用了數十年的努力，擴張領土，奪取資源所累積而成的一套國防力量，尙且不足以制勝於第二次的世界戰爭，結局是一敗塗地。今日武裝更加進步了，戰爭形態又有變更了，日本憑現有的資源與

技術，來重建一套足以應付下次戰爭的國防力量，真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情。

談到政治，日本本來自命為神國，天皇賦有神性。自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接受了西方的科學，也接受了議會政治，但這一點神道思想沒有變更。因此日本的憲政，就只能說是日本型的憲政，在其他國家都找不出同樣的模範。天皇既然賦有神性，神道又與政治合為一體，在這種狂妄的信仰和精神之下，日本人民受軍國主義的麻醉，好戰而不怕死。日本的軍閥更與財閥政客相互勾結，使日本國家的經濟力量，儘量集中於國防軍備，而日本軍人在憲法中特殊的地位，又足以使日本內閣的壽命與國策的方向，完全操在軍部的手中。加以日本警察制度的嚴密，使日本人民的自由，完全剝奪，安於最少的工資，和最刻苦的工作，對於軍閥的驅策，財閥的剝削，和政客的愚弄，想也不敢想，說也不敢說。日本五十年來的強盛凶橫，就是建築在這種心理和物質的基礎之上的。到了盟軍佔領了日本之後，日本的立國精神業已有了改革。在日本新憲法上，日皇只有處理國家十項事務的職權，這十項事務，都是禮節和法律程序的事務。一切政務都不在他的職權之內，日皇業已變成國家的象徵，不再賦有神性，現在日本人民對於天皇制度和裕仁遜位問題，可以隨便討論，這是戰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盟軍總部對於日本的神道，雖然還准人民供奉，但已經不准政府利用，政治與宗教是完全分離了。政府對於神社的補助費也完全停止，神職氏子和信徒，也漸漸減少了。在政治路線方面，麥克阿瑟將軍的辦法，是防制兩極端勢力的抬頭，讓「中道政治」得以順利發展。在政治組織方面，盟軍總部更扶植地方分權制度，一反向來中央集權的規模，並給予日本

人民以高度的自由，使他獲得民主的享受，認識民主精神。這些措施，可以說是很正確的，盟軍總部對於日本侵略主義的人員，曾經嚴格整肅，自佔領之日起到最近為止，軍國主義團體的幹部被整肅者在一萬人以上，戰時警察首長及特務警察人員被整肅者六千二百餘名，教育行政人員及教職員被整肅者五千六百餘名，公職人員被整肅者在二十萬人以上，職業軍官，全部放逐，但在日本國內仍然不可諱言，還是有些歷史餘毒存在，這些餘毒是蘊藏在日本人民的思想信仰，社會風俗習慣，以及文藝戲劇之中。這些殘留的歷史餘毒，有妨礙於日本和平民主的建立，自不待言。由此也可見建立民主的制度比較容易，而養成民主心理與民主生活，還是困難。我會曾經為此喚醒盟軍總部的注意，警告日本的領袖，並一再公開提醒日本的人民，必須實行思想革命與心理建設，意思就在為日本的和平民主建立一個精神的基礎。但無論如何，日本的神道政治既已被打倒，天皇既已否認了神性，自不易再行恢復。日本人民既已嘗到了自由的滋味，也不易使其輕於放棄。日本式的神道法西斯的政治，是不容易再抬頭的了的。

其次談到日本的經濟問題。這可分為兩方面來說明，第一是日本的經濟現狀，在投降的初期頗為混亂，生產停頓，民生必需品缺乏，物價暴漲，黑市猖獗，人民的存款被凍結，埋給物品數量很少，一般日本人的生活確是困苦，三年以來，由於盟軍總部的管制，美國的援助，以及日人自身的努力，已經逐漸好轉，日本經濟安定本部，並且將從本年十月起，對於一般人民，增加主食及日用品的配給。可是日本的經濟現狀，離開自給自足，還是很遠，更說不上經濟復興。遠東委員會雖規定日本人民

可以恢復他一九三〇到一九三四年的生活水準，但是盟軍總部對於日本工業，用盡力量，目前尚止能達到那個時期的產數百分之五十五。日本的生產與消費之間，差額很大，現在美國對日本的援助，就在填補這個差額，每年拿出三億與四億美元，每日大約是一百萬美元，幾乎全是糧食和日用品的補給，日本經濟復興的建設工作還談不到，美國爲了想減輕美國納稅人的負擔，盡力鼓勵日本增產。但據一般的判斷，日本由於工資太高，商船損失太大，運費過昂，儲藏的原料業已用完，國外的原料不易補給，至少三四年內，絕對不能達到自給的程度。

第二要談到日本的經濟改革。在這一點上，盟軍總部對於解散財閥和農地改革都在着着進行。關於解散財閥，盟總在進駐日本之初，即下令日本政府廢除東縛自由競爭的法令，制定防止獨佔的法規，並下令解散過去助長日本對外侵略的財閥會社，並應經濟界特權人物。關於農地改革，日本現行的農地調整法，預計由國家收買地主的土地五分之四，分給佃農，去年一年中，已收買的土地，估計總數百分之七十。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只有對內民主，對外才能和平，也只有經濟民主，政治民主纔有確實的基礎。要改造侵略的日本爲和平的日本，必須使他的政治民主化。而要使日本政治民主化，又必須使他的經濟民主化。我們中國對於盟軍總部在這方面的措施，應該特別重視，並期待其積極進行，達成日本經濟民主和平化的目的。

說到這裏，我想提出一點，請大家特別注意。日本人民在戰爭慘敗之後，經濟貧困之中，無不渴望經濟復興，日本爲求經濟復興，曾擬定了一個五年計劃，規定實施時期原定是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

二年，現因計劃還有修改，進行也有延誤，須改從明年起實施，一九五三年完成，原計劃以一九五三年的人口估計八千九百萬為根據，擬定各種供應和需要的數字，據日方的估計，這個計劃的實施，因為日本外匯短絀，必須倚靠外援，日方計算所需要的外援款額共達十六億多美元，每年還需要週轉金兩億到三億美元，用來輸入糧食和棉花羊毛煤鐵木材等等原料，根據我國經濟專家的估計，日本五年計劃中所輸入的物資，百分之四十來自亞洲，百分之五十來自美元區域，查戰前我國包括東北與台灣在內，對日貿易，佔日本全部對外貿易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此次日本所擬經濟復興計劃，就輸入方面看，我國的煤鐵鹽糖大豆棉花飼料等等，都是日本所必需，就輸出方面看，日本的原料取自美元區域的很多，但日本所製成的商品，如棉紗，機器，化學工業品和毛織品的出口，不能希望在美元區域中有多大的銷售量，不得不靠亞洲為主要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就上面所說的情形來分析，我們對於日本軍國主義能否復活的問題，實在不必一味的恐懼與猜疑，日本軍國主義不能復活，主要是看他國防力量能不能重建，日本國防力量是不是能夠重建，主要還要看他經濟條件是不是能夠具備，我們試看一看日本的經濟復興計劃，主要原料大部要取自中國，他的工業成品又要中國購買，日本經濟復興的關鍵，操在中國的手中，中國如不與日本合作，日本的經濟復興計劃便沒有順利實現的可能，姑無論日本神道業已衰微，日本天皇的神性業已消滅，日本大多數人民業已在戰爭經驗中覺悟到好戰精神的無效，日本人民業已在佔領時期嘗到了自由的滋味，中央權力業已分散削弱，全能政治無從再度抬頭，即便撇開這些心理和制度的因素不講，日本

在經濟條件上也不能重建一個足以威脅和平的軍國，而關鍵正是操在我們中國的手裏，我們應該拋棄消極的無益的猜疑，恐懼，批評指摘，我們應該對日本採取積極的態度，建立積極的對日政策。我們要認識，今後世界的建設，將以亞洲為中心，我們可以說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結束，亞洲世紀是開始了，世界最豐富而未開發的資源在亞洲，亞洲有十億人口，生活程度最低的也是亞洲，今後亞洲主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自己開發資源，自己製造商品，自己提高亞洲人民的生活程度，這種工作必須要亞洲各國國家民族，集合起來，依據聯合國憲章關於經濟合作的規定的精神，與遠東經濟委員會的工作相配合，構成一個相輔相成互助互利的亞洲區域經濟集團，在這個亞洲經濟集團中，中國責無旁貸要採取主動，我們如不妄自菲薄，這個區域經濟計劃，應該由中國商量有關各國擬定方案，這個共同建設的工作，應該由中國一馬當先，以前驅自任，而和平民主的日本當然不能摒除在這個圈子之外，也只有從整個亞洲的前途着想，才能够賦予和平民主的日本以其所應有的地位，在日本戰敗之前，日本軍國主義者，曾經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他那個共榮圈，乃是以日本為生人，以其他亞洲民族為奴隸的經濟圈，是具有極端的侵略性，與排他性的經濟圈，正因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存在，亞洲的經濟便無從平衡發展，現在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已經摧毀了，真正互利互助的亞洲區域經濟集團，才開始有建立的可能，因此我們應該一方面防範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使他不再為和平的威脅，一方面應該指導日本經濟民主化的進路，使日本的特長就是日本在五十年來所接受的科學智識和日本勤儉耐勞的國民性，能够在亞洲經濟建設中有充分

的貢獻，因此，我們應該在防止日本重整軍備和配合整個亞洲經濟建設的大原則下，有條件的贊助日本復興，回想在對日戰爭初告結束的時候，我們的總統率先聲明中國對日本不採民族報復主義，日本人民聽到這個聲明，無不衷心感佩，所謂「不報復」，消極的方面，是表現我民族的度量，積極的方面，更須表現於國家的政策，這就是說，當我們處理日本問題的時候，不僅是消極的不予報復，並且要積極的有所作為，我們必須從亞洲各國國家民族合利益與中日永久的關係上，採取遠大的措施，我們應該促成對日和會的召開，我們應該在亞洲全盤計劃之下，確定中日兩國乃至中國至其他各國之間的經濟關係，亞洲的經濟是要發展和繁榮的，但經濟的發展必須是平衡的，繁榮必須是全面的，而亞洲民族的生存與安全是要有保障的，但民族的生存，必須是自主的，安全必須集體的，而經濟的發展和繁榮，與民族的生存和安全這兩個問題，是不可分的，我們必須先行確實獲得亞洲民族共同不虞匱乏的自由，然後才能確實獲得亞洲民族共同免於恐懼的自由，日本問題終竟是一個亞洲問題，在整個亞洲問題之中，來考慮和處理日本問題，一切歷史上的恩怨和戰後的疑慮，便自然得到正確的解答了

這是本人對於當前日本問題的一點見解，特此提出來就正於全國同胞，敬祈關心日本問題的人士，予以指教，並共同研討，實深欣幸。(九月廿八日在中央廣播電台廣播)

x
x
x
x
x

暹羅排華運動之回顧與前瞻

朱作民

泰人建國之初，暹羅並不是一個統一國家，當時所建部落極多，其中較為強大者，在北方為「暹羅」，以遠古台為首府，南部湄公河下游為「羅斛」，國勢較強，兩國時分時合，互相攻伐，且同時入貢於元。至一三三九年，暹人降於羅斛，始有「暹羅」之稱。一三六六年，明太祖賜印，文曰「暹羅國王之印」，暹羅始奉朝命，正其國號為「暹羅」，由此足證暹羅國名係屬中國所冊封，無怪今日主張排華之法西斯領袖，提倡改名「泰國」了。

綜觀暹羅歷史，自遠古台王朝、阿跋陀王朝以至現在之曼谷王朝，不論其國勢強弱，對中國均能始終稱臣納貢從無貳心。暹人最崇拜之英主號稱「三大王」的，敢木丁、丕耶納禮、朱拉隆功三人，都會親詣中國稱臣。明萬曆間倭寇犯朝鮮，明庭擬出兵征討，暹王丕耶納禮自願率兵直揚日本，以牽其後。旋寇兵遞去，事未果行。

暹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一七六七年），緬軍進犯暹京，暹王伊克達兵敗，落荒而死，王族被俘，王城焚毀，其時有在暹服官之華人鄭昭，應時崛起，號召暹人復國，大破緬軍，光復舊京，暹人舉國狂歡，遂尊此華僑為暹羅王。鄭昭在位十五年，因內訌，被暹人所殺，繼位者為丕耶納禮、拉馬第一，正式建都曼谷，史稱卻克里王朝（即曼谷王朝），為今日暹王之祖。卻克里即位後，仍遣使至清廷入貢，上表自稱鄭華，冒充鄭昭之子。却克里之子拉馬第二即位後亦入貢中國，華稱鄭福，清廷並冊封鄭福為「暹羅王」，福跪接聖諭，禮儀甚盛。

至拉馬第三以後，暹人因恐懼外人勢力，抱閉關主義，禁止外人收買暹人土地，及外人自由旅行，但對於中國僑民，仍予特別優待。直至拉馬第五第六父子被刺歐化，力圖自強，於參加第一次大戰後，更與列強改訂新約，於是暹羅一躍而為東方完全獨立之國家。而此時我國正值軍閥割據，政局紊亂，當局漠視僑民利益，未與暹羅訂約，於是暹人遂起輕視華人心態，再由國際野心家之惡意挑撥，中暹關係，遂從此日起惡化，一反傳統之親睦而演變如火如茶之排華運動了。

旅暹華僑概況

我國旅外僑民，如以國別為單位，暹羅實占首位。而華僑人數之多，為中暹關係複雜之癥結所在。暹羅全國總人口據一九三八年官方統計為一千五百五十三萬人，其中華僑至少在三百萬人以上，（一九四五年我國僑務委員會發表為二百五十萬人，據南洋研究所統計，此數遠較實際數字為少）。約占暹國人口百分之二十強。一說暹羅華僑人數，已至無法統計之境，所有暹羅人夫都是馬來亞人、印度人、中國人的混血種，今日掌握暹羅軍政大權的人物，更多是此輩混血兒，就是拉馬王族也公開承認其身上具有中國人的血液。例如國民黨已故元老蕭佛成先生，即五代世居暹羅，其婿叨威勳氏，戰時曾任暹政府宣傳部長，素主親華。所以純粹「泰人」為數固已不多，而且都是苦力農民，原無社會地位可言。據旅暹某僑領估計，目前在暹羅自稱

為中國人的至少在五百萬人以上，約計可占總人口之半。

華僑初入暹羅，據史籍記載，約始於元明之際。元成宗大德四年（公元一三〇〇年）暹王敢木丁再度入朝，隨行時帶去中國藝術工人數名，傳入中國陶瓷之製法，馳名之「宋家綠」瓷器，至今為人珍貴。以後海運日漸發達，閩廣潮汕一帶人士，紛紛登陸印度支那半島。當時泰人為數不多，文化程度低落，而原住半島之土著民族已趨衰落，見華僑善於經營，非但不加嫉妬，而且延為上賓，優禮有加。於是僑胞中頗有出任暹羅政府之朝中重臣，地方疆吏者，因為環境優良，自然呼朋引類，生銖日繁。尤以一九二〇年後增加更為激劇。

自鄭昭以後，華僑漸漸退出政治圈外，而以全力經營工商業，他們披荆斬棘，含辛茹苦的結果，將荒涼的半島變成了今日這一片繁榮的樂土，其擁有經濟上的實權，實在也不是倖致的。據戰前統計，華僑在暹羅投資總額達二六九、二八〇、〇〇〇美元之鉅，其經營項目如下：

- 潮汕人 約一百七十萬人 商業、木材業、碾米業
 - 福建人 五十五萬人 礦業、橡膠業、園藝
 - 海南人 二十五萬人 漁業、木材業、食品業
 - 廣州人 四十萬人 碾米業、技術工人
 - 客家人 五萬人 貿易、商業
 - 上海及華北人 五萬人 家具製造技工
- 上開業務項目，事實上包括了所有暹羅可以經營的事業，一九二九年暹政府舉行全國職業調查，

從事商業者，華僑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要用文字來說明華僑在暹羅經濟社會中的潛在勢力，廣言之，暹羅除官吏及農民外，可謂一切屬於華僑。暹京曼谷為半島上數一數二的貿易都市，全市八十萬人口，華僑即占五十萬人，其中最繁盛的耀華力路，滿街懸掛華僑商舖招牌，徘徊其境，幾疑置身廣州市區。總計華僑在市內擁有碾米廠八十三家，每年出米約一百六十萬噸，散布各地的小型米廠約八百家，年出米三百噸，其他如火柴廠、皮革廠、肥皂廠等華僑投資約占百分之九十。商業計有米商一百一十家，出入口商八十四家，銀行三家，匯兌局四十家，木材商二十多家，機器商四十多家，木器商二十多家，典舖七十多家，零售商一千五百多家，如此陣容，在一個還是農業國家的暹羅，自然足以掌握一切了。

然而因為華僑在暹羅有經濟上霸權的緣故，其結果雖使華僑本身奠定了經濟的基礎，但亦因此繁榮了整個的暹羅，這與戰前洋商之壟斷中國市場，實行經濟掠奪的情形，絕不能混為一談。中國歷史上無論對藩屬、友邦，均無侵略性的政治野心，華僑在海外貿易，更未嘗稍有假借政治力量以取得特權的事實。華僑之有今日的成就，可以說完全是血汗努力點滴積聚而成的。而且以事實證明，華僑實可告無罪於暹羅，世人皆知，暹羅以產米、錫、樹膠、柚木四大物資著名，但這些自然產物，如無華僑之慘淡經營，何能輸出於國際市場，而使今日暹羅人得以家給戶足。古代暹人種稻，僅知將種籽撒於地上，任其自行生長，及成熟而收穫之。迨至華僑登陸半島，始能以播種插秧耘田施肥等耕種技術，於是產量大增。以後華僑又設計經營新式碾米廠大小數百家，收集全國穀類，製成白米運銷國外。

據暹政府統計，一九三九年暹米除供國內食用外，全年輸出達三一、二四九、九〇三担，價值一、二二〇、四四、九四八銖（暹幣名，約四銖合一英鎊）佔全暹輸出總額為百分之四十四。暹米外銷，直接有力地支持着暹政府的財政收支，同時促使價值提高，而暹羅之農村經濟亦得賴以繁榮。除如錫塊、樹膠、柚木三項，每年外銷共佔輸出總額約百分之四十二，無論資金、技工及出口貿易，均操在華僑之手。據一九四〇年暹政府公佈之一九三八年對外貿易：計全年輸出總額為二〇、四、四二二、〇八八銖，上述四項特產即佔一五八、八五〇、八九五銖，為全額之百分之七十八。同年輸入總額為一二九、六三〇、七三一銖，全年出超達七四、七九一、三五七銖，如此鉅大出超，實為暹羅繁榮與進步之根源所在，而華僑對於暹羅的豐功偉績，亦於此可見一斑了。

我國抗戰軍興，華僑處境困難，英法資本主義勢力侵入暹羅經濟社會，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暹羅全局在日本掌握中，暹法西斯領袖的官僚資本因與帝國主義勾結而抬頭，迨至抗戰勝利美國資本復扶其雷霆萬鈞之力，滲入暹羅，席捲一切，於是華僑經濟已達空前窘境，但數百年來辛勤築成的堅強基礎，一時向難完全予以摧毀，其中為進出口業和中國工商業，至今仍握在華僑手中。

旅暹華僑常有世居暹羅十餘代而仍不願放棄其祖國國籍者，因此稍有成就的華僑到晚年大都熱心於僑教的建立。他們認為教育是給「僑生」保留國家觀念唯一的途徑。同時早期出國華僑，文盲達百分之六十以上，以後暹人教育漸趨普及，僑胞如非推廣教育，急起直追，勢難與其競爭。清季戊戌時康有為亡命南洋，提倡僑教，華僑深受感動，乃創辦

新式學校。曼谷之新民學校，至今已四十餘年歷史，至「一九一八」前後，僑教最為發達，全盛時期，暹羅僑校達二百六十九所，內中學六所，小學一百六十三所，肄業學生共計七、七二八人。（以上數字根據「南洋年鑑」及僑委會編印之「僑務十三年」）以後即遭暹政府無理限制，未能繼續發展，至抗戰時期，僑校幾全部停頓，僑生失學。有少數子弟被迫投入暹人學校攻讀。勝利後雖逐漸恢復，但因新的排華運動接着開始，於是「華僑教育」又為遭到空前的危運。

八一三前，暹羅僑胞復辦有華報紙十餘種，為華僑福利之喉舌，其論暹政，亦多為暹羅當局所注意。戰時受物質條件之限制，同時復遭日人摧殘，最後僅存中原報一家。日寇投降後華僑報紙一時又風起雲湧。現已復刊及新辦者計有十餘家，但多為黨團派系所操縱，自相攻訐，似已遠離其創辦僑報之原旨。

排華始末

暹清末年，暹王拉馬第六父子先後留歐歸來，繼承王位，接着推行新政，變法圖強。這是任何落後國家應為之事，華僑當至樂予贊助。但是不幸暹羅因中國帝國主義之離間，開始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以為阻礙暹羅發展的是華僑在暹羅大的權力，這一念之差，造成了旅暹僑胞此後日趨不振的命運。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僑商為爭取納稅平等，在曼谷舉行總罷工、罷市，因此暹羅全國市場一度陷於停頓，充分暴露了暹羅在貿易上對華僑的依賴性，同時英法日等國又從中挑撥，激進人排華情緒，更形高漲。民國三年，在暹發現「遠東猶太人」一書，對華僑竭盡侮辱之能事，其時暹政府雖未公然

排華，但一般相信，此書確係受暹羅當局之暗示而刊行者（見英人藍頓教授所著「轉變中的暹羅」一書）。自此排華運動逐漸由意識而見諸事實。

民國十七年，暹政府設立「移民局」，頒布華人入境新條例，從此華人不得自由進入暹境，華僑移民人數為之銳減，然其時猶知持重，不敢暢所欲言。至抗戰軍興，日寇加緊挑撥，排華運動始見露骨。

「八一三」滬戰起後，華僑紛紛募款捐寄祖國，暹政府在日寇指使之下，頒佈「統制募捐條例」，藉口妨害暹羅邦交，所有捐募，一律禁絕。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曼谷警長亞倫（為親日排華之健將，華僑畏之如虎，有「警察上將」之稱）下令逮捕我僑領二十二名，罪名為「共黨嫌疑」審訊後，大部被放逐出境，此為暹羅排華之首次逮捕事件。同年七月十五日，暹政務委員兼藝術廳長曼威集（其人為暹華混血種，華名金良，為詩人及歷史家，又為暹羅法西斯之理論家）在朱刺隆功大學演講，德具合併問題，公開侮辱中國謂「猶太人貪財而奪他人之業，以達到其聚財目的，故有人以華人之比之猶太人者，其實不然。猶太人無祖國權利雖豐而外匯，其積聚之財，尚係就地消費，無款匯出。若中國人者，常將所蓄財富，寄回祖國，為害實更甚於猶太人」辭畢，全體譁然，不論暹華各報，一致加以猛烈抨擊，暹人民代表乃亞倫等更認此項謬論違反暹羅建國策，向政府提出質問，但因中國政府未嘗正式抗議，故亦不了了之。當時有日人出資之「暹民報」竟獨排衆議，著論贊揚曼氏，文中

有謂：「暹羅有猶太人，似暹羅亦自應有希特拉」等語，由此可見暹羅之排華政策實與暹羅之法西斯獨裁政治不可分割。同年八月，暹僑舉行「八一三」滬戰週年紀念日，警長曼威倫藉口搜查雅片，又下令逮捕華僑五千二百二十三人，此為排華史上最

大規模之逮捕案。結果被逐返國者三千三百五十四人，從此華僑生命財產已至毫無保障之境。隨時均有被捕放逐之虞。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暹國務院長曼披汶（為暹羅法西斯首腦，戰時領導暹羅抗日，戰後一度下獄，旋即獲釋，政變後又登台執政）。致函各人民代表，徵詢改國號意見，後得多數同意，乃宣佈改為「泰國」，於是曼威集又乘機作荒謬演說。除違反歷史，痛詆「暹羅」舊名外，更特別強調暹羅之民族問題。其中有謂：「暹羅係少數民族名稱，不能代表整個民族，今使國號與民族統一計，改稱曰「泰」。

暹羅民族不僅在暹羅境內有泰族一千三百萬，並在廣東約有七十萬，廣西約有八百萬，貴州約有四百萬，雲南約有六百萬，四川約有五十萬，海南島約有三十萬，越南之東京老，約有二百萬，緬甸約有二百萬也。一又稱「居留中國之泰族，與漢族比較陳遠，不受任何方面統治。」最後更大放厥詞，謂「漢，黔，桂，粵及越，緬各地之泰族，聞暹羅亦有泰族而喜，故吾人須喚起泰族團結合作，領導泰族近於繁榮。」察其用意，實不僅「排華」而簡直企圖「侵華」。從此所謂「大泰主義」其理論上已經確定，故排華運動更形熾烈。

暹羅對付華僑的手段，除以種種苛律限制華僑入境外，同時並圖同化所有舊居之華僑，消滅祖國觀念，以補其人口之不足，因而訂有「僑居十年以上之外僑得視為暹羅公民」之國籍法。但海外華僑之國族觀念遠較國內人民為濃厚，即世居暹羅數百年華僑，亦不甘放棄其中國國籍。暹政府于無法之中，乃遷怒於華僑教育，認為消滅僑教，即可逐其同化目的。一九三三年藉口實施「強迫教育」，限

僑校每週教授暹文九小時半，華僑勉予接受。至一九三六年暹政府又頒佈新學校律，規定在暹學校，授課均須用暹文，後經僑胞請願，得稍予通融。但至民國二十八年曼披汶之軍人內閣組成後，對華政策，益形強化，暹教部重申不得教授華語前令，各僑領再三聯名請願，結果仍屬徒然，是年五月起，當局即着手查封華校，至八月，曼谷著名之新民及中華兩中學均遭封閉，延至二十九年六月，全暹僑校在「辦理不善」的罪名下已無一倖存。而且學校查封後，即以原校舍改辦暹文學校，又須僑胞負擔其經費，天地間不平之事，可謂無出其右。僑教消滅後，其暴行箭頭又指向另一目標——僑報。暹政府於「七七」二週年紀念時取締駐曼谷國民黨部為華僑銀行後，即發動對華文報紙之攻擊。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煽動華僑抵制日貨罪名，勒令曼谷日報停刊，國民日報及新時報因與曼谷日報為經營上之同支關係，亦於同日被株連停刊，八月一日以妨害暹羅邦交罪名勒令中國報、華僑日報、華僑日報、華僑日報四報停刊，至八月十日，中華日報與中國日報因其所刊商業廣告有妨民衆道德之罪，亦遭封閉，總計十二日中，封報九家，除碩果僅存之中原日報得勾延至勝利後外，所有華僑報紙，均被一網打盡。

摧毀華僑之工商經濟，為排華運動之主要課題，其狠毒之處，更有甚於消滅僑教與僑報。茲將專數端於后：抗戰軍興後，華僑捐輸祖國，與僑界狂，暹政府受日人指使，驟頒「外幣運入暹境條例」，於是國幣在暹，交易中斷，捐輸告竭。一九三八年曼披汶內閣之財長曼巴主，頒佈「外僑隨身費徵收條例」，規定每一族運僑胞，年須納費四鎊，此為變相之人頭稅（按華僑入暹時，已納有進口稅二

百餘。一九三九年四月，頒行國稅法，其中營業稅中並招轉捐，統為「排華」而設，規定無通文之商店照牌，面積每五百公分徵稅一餘，全暹文之招牌，則僅收十士丁（一餘合一百士丁）此稅實施後，華文招牌絕跡，全暹市容為之一變。同年又頒佈「統制印紙條例」，僑商經營之印業，均被迫停辦，所有印機均以低價轉讓暹政府。其餘「統制煙草條例」、「統制食鹽條例」均以推毀僑商為目的。對僑商打擊最重者，為暹政府官商合股之碾米廠，因正當營業無法與華僑競爭，乃用政治力量統制內地穀源，令飭鐵道阻絕華僑米商之發運，於是官營米廠，日見發達，華僑經營者一落千丈。並以同樣手段打擊華僑木業，結果亦同。又有「暹羅漁區捕魚條例」，規定外人無權捕魚，我海南島僑民生計全斷。「船舶條例」取締外籍船舶航行暹境內河，船主船員均不得僱用暹人。至此，華僑在暹羅之生路，均被堵絕。

戰後中國為主要勝利國之一，華僑方國稍獲喘息，不幸意於日寇投降後三十五天中，發生空前之排華血案，大小衝突案件達五一五起，總計華僑財物損失達八、二〇五、四七五餘，死二十六人，傷一三二人，失蹤者八十七人。如此鉅大慘案，終於在外交詞令的往返中，不了了之。後因李鐵鈺大使赴任，排華運動由公開而轉入地下活動，實際情形未獲改善。去年底曼谷改變，變被汶又告抬頭。所謂排華運動又為暹羅法西斯政權的「既定國策」，今後當然仍須求其「貫徹」，於是入境人數及僑教問題又起糾紛。華僑之被逮捕放逐，屢見不鮮。詳情已載「亞洲世紀」三卷一期「暹羅排華的真相」，茲不再贅述。

處理暹羅僑務應注意之事項

我們於詳細研究暹羅之華僑問題後，深覺在目前暹羅國內外的政治情勢的現狀下，這一問題是頗難獲得改善或解決的。就暹羅的地理環境及過去史實而論，暹羅本質上實無排斥華僑的理由。暹羅人口密度，每方哩僅五三人，較其他南洋各地為疏，華僑移殖其地，無論如何亦不妨害暹人之正常發展。過去數百年來，華僑之對於暹羅社會，義務多於權利，貢獻大於收穫，歐美各國研究南洋問題之學者無不贊美華僑對於開發南洋之功績，而尤以暹羅為更甚。無論就事理與道義上論，暹人實不應亦不必排華。而且絕大多數之暹民與華僑之間，至今仍有歷史傳統的友誼，每當暹政府頒一排華法令，暹人及其人民代表常與華僑聯合的當局抗議或請願，變成集議或發表辱華演說，同遭暹人痛斥。凡此均足以證明暹羅廣大之人民，仍切望繼續與華僑合作而致力於暹羅之繁榮。而所謂排華運動實為國內法西斯人物與國際野心家策動下的一個不自然的產物。

在日本卵翼下的暹羅，僑校全閉，僑報全停，僑商經營的事業大部轉入暹羅官僚資本之手，這是暹羅發動排華以來的最大的「勝利」。改變後，當年的餉子手大都復了位，自然不免想入非非，企圖重溫「一網打盡」的舊夢。所以今日一切措施，可以說都是戰時的翻版，其目的既同，手段步驟亦必一致。這是排華運動所以連續不已的內在因素。其次是暹羅的國際因素：排華起於清末暹王拉馬第五父子醉心歐化之時，英法兩大勢力從中挑撥已無疑義，至日本控制暹羅政局以後，排華運動發展至

最高潮，戰後又故態復萌，特別在變被汶登台之後，更趨雷厲風行。因此暹羅之排華運動，同時亦為帝國主義策動支持的結果。
綜上所述，我們覺得今後政府在處理暹羅僑務時，尤應注意下列諸端：

一、暹羅之排華，既與法西斯政權及國際帝國主義不可分，要徹底改善僑胞現狀，惟有期待一個民主暹羅建立之後。所以今後對暹羅國內政局之發展，實應加以密切之注意。戰後暹羅之不被列入戰敗國，變被汶不列入戰犯，實為重大關鍵，我政府對此宜毫無表示，實為外交上嚴重無比的錯誤，以後萬不能再蹈覆轍。

二、僑務當局之一切措施，均應以僑民福利為前提，國內黨團派系切不可參與活動，以啓暹人離間分化之機。據若干曼谷通訊之報導，暹羅華僑社會左右派之鬥爭甚烈，暹政府人員平時對左派僑民常顯親善，戰使其抨擊祖國政府及我駐外使領，以前謂政府在外威信，然而一旦將採取行動，逮捕放逐時，則必從左派僑民始，因藉口「防共」，可避免我政府之強硬抗議。結果在「赤色嫌疑」的罪名下，即傾向國民黨的僑領，亦常為其逮捕之對象。暹政府用心之險，無與倫比。所以暹政府之任何藉口及外交辭令，事實上都是美麗的謊言，政府應以嚴正之立場，沉着應付，不為陰謀所乘。

三、旅暹華僑，文盲達百分之六十以上，久居海外，自不免有日趨老大落後之勢。唯教育始能補救之。故今後對於華僑教育，當局應專設機構，加以督導。對暹交涉時，關於教育部份，尤不可稍予讓步，否則物競天存，優勝劣敗，暹羅即停止排華，我僑胞之前途亦未可樂觀。

本刊經中華郵政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報專賣金銀